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重返西門町—青少年與男同志再現空間的政治經濟分
析（1994-2010）

Access to Ximending: toward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of
Teenagers and Gay Men (1994-2010)

吳佳盈

Chia-ying Wu

指導教授：陳東升 博士

Advisor: Dung-sheng Chen, Ph.D.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July, 2010

謝誌

這本論文的完成，首先絕對是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陳東升。在長達兩年的指導過程，對於狀況起伏不定，時常迷失在資料或是陷入思考膠著的我，有著無比過人的耐性。即便老師事務繁忙，卻總是永遠在我需要的時候在辦公室等著我。面對西門町迷人而蜿蜒複雜的歷史，被不同的故事吸引而不斷改變觀看、詮釋的角度是很難避免的事，但是老師總是可以以不變應萬變，每次為我抓回討論的主軸，並且以豐富的理論學識與研究經驗，為我的論文扮演守門人的角色，在我對自己論點沒有自信慌亂的時候確認我的想法可行，也在我的論證輕忽簡略提醒我學術作品應該有的要求。總之，沒有老師長久以來的鼓勵跟鞭策，就算我有再多的熱情跟想法也會因為怯懦而無法化為這本論文。蘇碩斌老師與黃麗玲老師在論文寫作的後期，也給予我相當大的幫助。兩位老師遠遠超過口試委員的職責，蘇老師在清楚直接的批評以外總是給我十分具體而務實的建議，而一次回信中的「務必堅持完成」是我在最後階段貼在書桌上方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話。黃麗玲老師不像初見時的女王氣勢不但很親切的寄給我參考文章，在論文修改階段還願意提醒我寫作的眉角。陳東升老師與兩位口委老師願意超越我文字表達的障礙，理解我的論文，是我最不敢奢求卻有幸發生之事。自己的作品能夠被瞭解而且被肯定，對一個沒有自信的作者來說是最高興的事情。也是漫長煎熬的論文完成後，最期待的事情。我也特別感謝在社會系的吳嘉苓老師、柯志哲老師、曾熾芬老師、劉華真老師、孫中興老師，在知識學習以外，社會系寬容又自省的氛圍是台大最好的環境。特別感謝賴曉黎老師，在我萌生休學意念時，老師的一席話讓我明白自己人生需要克服的難題不能老是閃避，這是我後來得以面對論文寫作以及更需要耐性跟毅力的人生關卡所支撐的力量。

碩士班同學是研究所唸書、生產論文過程彼此打氣扶持的同伴，尤其 212 的同學雖然後來大家各自在家拼鬥，但是 212 夜晚郁彥、人皇、怡婷在書桌的身影是不會忘記的一段歲月印象。因緣際會陳雨君成了我論文寫作最親密的夥伴，即便研究領域差異甚大，在論文寫作過程卻常常出現類似的心路歷程在每晚的 MSN、幾乎每週碰面吃飯的日子，一起撐到了最後。去年秋天兩個人跑到九份山區在毫無人跡的貂山古道遠望著山上的涼亭將之比擬為論文，最後涼亭竟不可尋但是從牡丹一路走到九份的滿足的奇妙經歷，果真是寫作論文最貼切的隱喻。遠在愛丁堡的李宜修對台北的熱情與知識，為我提供非常多的資料跟剛開始認識台北的圖像，跟李宜修初識時帶我在大稻埕、大龍峒的漫步也成為我日後認識台北最喜愛的方式。有幾個月的時間，陳馨傑幾乎每日與我在多鬆碰面，很容易分心的兩個人卻也因為彼此的存在而每天前往多鬆報到孵育論文。最要感謝西門市場的黃永銓會長，不但提供非常關鍵的資訊，黃會長對西門市場的熱情跟我對西門市場殖

民時期身世的憧憬感概以及日後的失落有很大的共鳴。

碩士論文的完成對我而言並不單單只是碩士論文的完成。在台大漫長的求學與成長過程，一路上有太多的朋友相伴。周馥儀是我永遠的學姐，永遠忙不完卻又永遠溫暖的關心支持。清全是我論文寫作初期最好的讀者。社會學會社的朋友總是在許多易於常人而十分包容有彈性又十分有趣的互動中，奠定了深刻而穩固的歸屬感情，蕭民岳、何思瑩、何經懋、涂豐恩、黃怡寧、陳俊求、林意淳、小慧、李沐恩、李松霖、王祥維、栗子，是我最重要的智識來源也是不斷探索人生可能性的朋友。這一年來的新室友許茨閱與我從馬來西亞到外星球天南地北的聊天為我在最後苦悶的寫作日子增添不少溫馨小窩的感受。大姐跟二姐雖然離學校很遙遠，卻也加入守候我寫完論文畢業的行列，大姐不但為我的論文提供不少訊息最後口試階段也不忘現身支持讓我總是有被照顧的感覺。與我相識十年的黃彥禎，雖然等不到我畢業遠去玉里工作，但是黃彥禎在關鍵時刻給我關鍵的建議，解決了論文最後差點難產的危機。賴穎臻則從花蓮到了台北工作，是我最佳酒友。辛亥路側門早餐攤不但早餐好吃，叔叔跟阿姨也不管我只有短暫的打工一年，到現在都還招待我免費奶茶以及每次對我的關心跟打氣，是我往返宿舍跟系館之間心情最好的來源。還有太多的感謝無法備載。

最後，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給我無盡的包容，不論爸爸媽媽、阿公阿嬤或是弟弟。爸爸跟媽媽在對我的驕傲跟失望中，在包容跟不諒解的交替中，雖然心急，卻總還是願意給我支持。家人是我不管做什麼難以被理解的抉擇、大膽的冒險、錯誤的嘗試種種過程傷害最大卻也是永遠不會背離的港灣。除了虧欠跟感謝我只能暫時以這論文做為最微薄的回報。剛開始構思論文時候認識的林彥廷也加入了為我擔憂、高興、包容又等待的行列，穩定了我一直都不穩定的生活跟情感。

特別要感謝蕭民岳跟我的 IBM Think Pad X32！蕭民岳在口試前幫我潤飾難以閱讀的文字，在那幾天如地獄般的夜晚支持我完成論文的修改。小黑我只能說雖然已經年邁卻依舊維持它那穩定的性能完全不當機又耐操，真的是研究生最好的幫手跟最忠實的伴侶！

本論文獻給我的摯友李沐恩，以及我在天上的愛貓。

吳佳盈 2010/8/17

摘要

本文嘗試解釋 1990 年代晚期以降，台北市舊市中心西門町的公共空間重塑過程的特殊現象—青少年與男同志地景的異軍突起。本文認為台北市 1990 年代晚期以後的文化政治結構變遷，是在地產經濟之外解釋西門町公共空間變遷的重要動力。因此本文從經濟資本、政治與文化主體三個角度切入觀看西門町 1994-2010 年的公共空間轉化。Henri Lefebvre 的「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概念是本文理論視角的起點，並且從美國晚近都市更新理論中，借用 Sharon Zukin 與 Don Mitchell 由 Lefebvre 的理論基礎所延伸對行動者的分類以及對公共空間的重新概念化，提出一個適合討論當代公共空間的分析架構。本文也採取 Mitchell 指出從邊緣群體佔用公共空間的政治可能性的角度，做為檢驗公共空間的公共性的判準。

本文對照青少年與男同志兩種邊緣群體各自面臨的政治經濟條件、組織策略以及在西門町公共空間重塑過程的歷史軌跡。本文除了從青少年徒步區的例子剖析當代後威權台北市公共空間迪士尼化的發展脈絡，也從男同志重返紅樓的過程提供一條邊緣群體爭取在公共空間自我再現、發聲的可能路徑。

關鍵詞：西門町、青少年空間、男同志空間、再現空間、公共空間、同志運動

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at explaining the production of teenagers' and gay scene (1994-2010) in Ximending, the old CBD developed in colonial Taipei. Political changes in late 1990s are crucial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aces in Taipei.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principles like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Space Liberation', cultural politics are pushed to the frontline of restructuring public space in Taipei, especially in the old political-economical-cultural core in west Taipei. Du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distinct political condition, I propos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different from the neo-liberalism explanations of urban redevelopment in the U.S. agenda. The contrast concepts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that Henri Lefebvre proposed are the standpoint of my approach. Brilliant works of Sharon Zukin and Don Mitchell help clarify the characters of contemporary 'public space' and offer adequate and critic ways to see public space.

Through comparison of teenagers and gay men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strategies to organize and negotiation, this thesis offers two different routes of marginal groups to access public space. While displaying the distinct trajectory of 'Disneyfication'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Ximending teenager pedestrian district, this study also discovers a different process through gay right movement in the struggle and negotiation of public space in Red House Square.

Keywords:

Ximending, space of teenagers, gay spac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public space, gay movement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西門町再造與台北市政治變遷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3
第三節 當代公共空間的分析架構	11
第四節 研究提問	16
第五節 研究方法	18
第二章 1980 年代：邊緣的中心	20
第一節 中心的轉移	21
第二節 另一種中心的形成：沒落鬧區西門町	30
第三節 再發展的前奏：拯救西門町	41
本章小結	45
第三章 「佔領西門町」？—青少年與徒步區的舞台化	46
第一節 青少年飆舞與空間解嚴	47
第二節 舞到西門町：從空間解嚴到公共空間整頓	51
第三節 走向迪士尼	59
本章小結	68
第四章 同志重返紅樓—公共空間的競逐	71
第一節 離開紅樓：同志運動與公共空間	72
第二節 重返紅樓：同志的經濟機會	82
第三節 重塑公共性	96
本章小結	100
第五章 結論	102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02
第二節 對公共空間理論的一些思考	105
第三節 研究限制	107
參考文獻	10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西門町再造與台北市政治變遷

經過整天的眩目活動，晚會主舞台前萬頭鑽動，馬英九興奮地向大家宣布：「閃耀的西門町已經重返台北市。」

馬英九在昨日的晚會中再次強調，要讓西門町活化，「翻轉軸線，再造西門」，今後不再是市民看市長演出，而是「市民當主角，大家同遊戲」，讓西門町再發出卅年前的光芒，東、西區同步均衡發展。

（中國時報，1999/05/23）

1999年五月，台北市西門町徒步區的更新工程落成，台北市政府以籌備多時的「台北·西門·慶」為其揭幕，宣告一個舊市中心將再度成為被台北市民使用的重要公共空間。回溯西門町徒步區更新工程的規劃，前任市長陳水扁宣稱以「打造青春國」為新版本徒步區的主題，西門町藉著打造青少年主題空間擺脫老舊的印象而得以閃耀登場。¹十年後，西門町紅樓舉辦了一場宣稱與台北一〇一煙火秀足以互別苗頭的亞洲最大同志戶外跨年派對，吸引來自亞洲各國的同志觀光人潮，將西門町紅樓推向國際觀光舞台。²我們可以看到1999年以後西門町的再發展，透過青少年與男同志的消費休閒空間的形成，接合全球觀光旅遊與商品消費，從而讓西門町在全球化台北市重新佔有一席之地。

「西門町」是台北市自十九世紀末期殖民統治開闢迄今，發展百餘年歷史悠久的商業區。經歷了戰後人口的變化，本省、外省移民移入，以及政治經濟的投資，在1960年代中華商場建成後，城鄉移民的都市經驗以及消費的中心性，發展為台北市甚至全國的中心商業區。一直到1980年代，國家與資本移往東區，新興白領階級與東區的跨國金融、消費地景構成新的都市中心，西門町則成為台北市在追逐全球化過程脫落的都市邊緣，也成為青少年、老人、勞工、同性戀等邊緣群體同在的另類中心。199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的都市計畫重返西門町，陸續加入大型商業資本與房地產資本的投資，然而從「青少年徒步區」開始，十幾年後在公部門戮力發展的「西門紅樓」廣場也形成男同志酒吧聚落。

檢視西門町發展的歷史，青少年與男同志空間的成型並非偶然。從戰後到1980年代國家力量與經濟資本從西門町離去，青少年成為西門町顯著的使用族群，男

¹ 參考：中國時報，1998/9/8，〈打造青春國 西門徒步區換妝〉。

² 出自紅樓同志跨年 REDay 官網 <http://reday-taipei.blogspot.com/>。

同志從戰後可辨的歷史，也一直在新公園、西門町活動。1990 年代初期的西門町，對照東區顯得破敗邊緣，卻仍舊是青少年與男同志活動的中心地。令人不禁好奇，當國家與資本的力量在 1990 年代晚期重返西門町以後，是否改變西門町的青少年與男同志的地景，而青少年與男同志地景為什麼成為西門町再發展的突出的角色？

在既有研究西門町再發展的文獻中，多數以消費空間的轉型看待西門町的再發展，然而本文從西門町在 1990 年代晚期以後青少年與男同志邊緣群體地位的突出，認為不可忽視的是台北市 1990 年代晚期重要的政治變遷。也就是 1994 年底台北市長選舉後，由在野黨市長陳水扁發起的一連串「空間解嚴」政策，本文認為是理解西門町 1990 年代晚期以降公共空間轉化以及再發展軌跡的重要脈絡。陳水扁市府（1994-1998 年）上任後以「市民主義」的參與式規劃進行台北市西區舊中心的公共空間重塑。透過賦予市民參與的權力、平反過去威權統治下被壓抑的多重都市主體經驗，進行公共空間符號再現與使用方式的重整。³「空間」與「文化」成為 1990 年代晚期打造「後解嚴台北」的重要戰場。1995 年以後，台北市政府重返對西門町的再造，便是具體坐落在公共空間解嚴，重塑台北市公共空間與文化的脈絡。

因此，本文對於西門町 1990 年代晚期以來的再發展軌跡，提出必須放置在台北市解嚴後不同的都市主體浮現、公共文化重塑的文化政治過程來理解。然而西門町再造也一直都需要回應經濟再發展的壓力，在西門町透過公共空間重塑產生激烈交鋒的主體再現，也逐步編整入西門町近年邁向國際觀光商圈的形象再造以及商圈地產投資的複雜力量中。西門町 1990 年代晚期以後的再發展公共空間的重塑，青少年與男同志對公共空間的接近使用（access）的動態過程，不但發生於台北市文化政治結構的變遷，也發生於逐漸浮現的文化經濟結構中。國家與資本的重返後與青少年、男同志不同的結盟或排除關係，正是造成西門町公共空間與公共文化轉化的原因。本文即是想要抓住歷史的線索，回溯 1980 年代以前青少年與同志在西門町的活動蹤跡，瞭解在 1980 年代國家離去、1990 年代國家又回首的去返，如何影響青少年與同志的空間使用，青少年與同志如何影響國家的再發展政策？⁴

³ 參考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委託，淡江大學建築系淡水社區工作室執行，1996，《首都核心區歷史保存特定區計畫》。

⁴ 必須說明的是，西門町還有其他可見與不可見的群體，在 1990 年代再發展受到影響，已經被其他研究者標示出來的「老人」、性工作者、男同志女同志，除了老人以外還缺乏研究，西門市場的更新也驅逐了原來的攤商跟西門市場老人茶室的使用者，這部份除了紀錄片以外也缺乏經驗研究與分析性的探討。不同群體對空間接近使用的方式受到不同條件的限制。本研究只挑選青少年與男同志（女同志有不同的條件），做為徒步區與西門市場再發展的兩個不同軌跡的案例，對比出不同族群與國家計畫的參與回應方式。在後者的案例也處理西門市場攤商的回應方式。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1990 年代西門町轉型的相關研究

關於西門町空間意義的轉化，累積了不少經驗研究論文。特別在 1999 年西門町徒步區更新落成、捷運通車後，針對西門町徒步區這項重要的公共空間改造工程，被研究者視為是西門町轉化的重要事件⁵。由於處在 1994 年底台北市長民選後的政治背景，以及 1996 年日本影視產品解禁後帶來新一波的跨文化消費，因此西門町在 1995 年以後的變化，引起研究者更多視為國家與資本對於「空間再現」的空間實踐，空間意義的重寫、被誰重寫；而徒步區計畫落成之後改變了西門町的空間氛圍，也有研究者以次文化群體的研究，來探索西門町的「再現空間」，例如老人、滑板族、塗鴉族如何使用西門町的空間。

相較於西門町徒步區的改造的研究的觀點多樣性，同一時期的西門市場更新過程，既有的研究觀點則集中在歷史空間再發展的行銷、以及公私合夥經營的效率、整合空間意義的效率上。西門市場拆遷事件以及西門市場更新利用的吸納與排除問題，只有兩支紀錄片《西門市場百年滄桑》、《老西門》加以著墨。推測這與 1999 年台北市文化局成立以後強力發展「紅樓劇場」、「西門紅樓」文化創意產業中心、西門市場攤商並未形成抗爭事件可能有關。而西門市場歷史意義轉化的問題，只有江宗霖（2005）視為是歷史空間的失落，紅樓的文化產業發展則尚未被問題化。西門市場在台北市文化局發展活化歷史空間，漫長以及不斷改變的過程，2005 年以後紅樓第一賣店後段逐漸形成的同志商圈，也尚未進入研究視野。

針對西門町徒步區造成的空間轉化，主要分為兩類研究，第一部份是把西門町徒步區的改造視為「空間再現」的實踐，解釋徒步區之後青少年消費空間的形成（「娛樂次文化空間」、「青少年流行意象中心」、「哈日之城」、「擬東京地景」）的動力。第二類則是探索在國家規劃而成的青少年空間的表象下，豐富的都市社會生活，不同群體對空間使用方式的「再現空間」，例如陳懿欣（2000）以尋找西門町的精神性挖掘在都市規劃下賦予西門町的新型賣場，在其中有自己生活節奏的老人族群，以及屹立不搖的舊式賣場；張曉婷（2004）指出青少年徒步區建構過程對老人族群的排除以及污名化，並且以民族誌的方式描繪了西門町老人族群的面貌以及對西門町的生活經驗詮釋；另外還有黃柏堯（2006）分析西門町的塗鴉次文化、陳宏銘（2003）的滑板空間、蘇淑冠（2005）以西門町再造後以消費構

⁵ 在這之前的研究者，例如李剛傑（1996）、楊秀芝（1988）、吳美珍（1991）對於西門町在八零年代轉化為青少年主要聚集的公共空間，並沒有解釋「西門町意義為何轉變」的問題意識，但是在 1999 年以後的研究，皆注意到西門町再發展的青少年空間的建構，國家與資本的參與是重要的動力，也對西門町的空間使用產生了系統性的排除作用。

築的主流舞台性質與既有的西門町邊緣身份群體的空間，形成西門町既主流又邊緣的雙重想像位置，這個空間條件發展出不同於 T 吧的青少年 T、婆次文化。針對本論文的主旨，第一類的經驗研究是我所討論的基礎。

潘瑾怡（2001）以全球化的結構力量做為解釋西門町 1990 年代轉化的因素。她認為全球化是導致 1980 年代台北市都市空間重構的主要力量。「全球化把整個台北市財富及發展由西區帶往東區（3-21）」，中斷了西門町戰後的空間文化與消費活動。也因此使得西門町受到電玩、色情行業入侵。面臨西門町的空間文化解構與經濟危機，國家以及解嚴後萌發的地方社群，合作以國家挹注大量的公共工程經費，地方社群以及非營利組織也以各種軟體活動扭轉西門町色情、犯罪、藏污納垢的負面印象，進行西門町的改造工程。

改造後的西門町，形成「流動空間」的物質基礎。租金提高、青少年人口因捷運而聚集的後果，新的空間條件吸引了大型零售資本的進駐，小型零售商家為了吸引青少年的高度競爭也形成「求新求變」為存活關鍵的商品流動機制（5-10）。商品與符號的快速流動具體展現在小型零售商家的商品汰換率上。這些在西門町改造後，由大小零售資本與商品形成的「流動空間」支配了西門町九零年代中期以後的空間文化形式。「青少年流行意象中心」便是由這些高度流動的符號與商品所構成。

潘瑾怡以「全球化」做為最上位的結構力量，國家計畫以及地方社群組織只是迫使西門町物質空間轉化為適合全球商品與資本、符號快速流通的空間。雖然這樣的確可以解釋西門町從破舊的舊市區，搖身變成以快速變化的青少年消費中心，然而將西門町的轉變視為全球化力量改變地方空間的必然性，對於青少年與西門町的關聯卻太機械化。國家或是地方組織的角色，也只是受迫全球化壓力，是全球化力量改變都市空間的中介。

李明璫（2010）則從消費的歷史與文化的角度，說明西門町 1990 年代晚期改造的文化根源。李明璫追溯了西門町對於「日本」的想像與消費歷史。由想像與跨文化消費生產出彷彿置身日本的商品地景。他指出西門町對日本商品的消費由來已久，1980 年代以前便有攜帶日本商品販售的「單幫客」在西門町出現。在 1980 年代資本流向東區的縫隙中，單幫客與消費者在衰敗的西門町蓬勃發展。甚至影響國家對西門町改造計畫的想像，打造一個像在日本一樣的消費空間。

李明璫為西門町的轉化，提供了經濟的文化基礎的分析。全球化的文化流動，尤其是影視商品，如日劇，造成的跨文化想像。這個跨文化想像的社群，在西門町實踐出一個「日本化的消費地景」。

認識到西門町經濟再發展的基礎在於跨文化的想像，才能指認出之後再生產西門町地景的重要媒介—生活風格雜誌。李明璁指出像《Here!》、《Taipei Walker》這種「日系台產」的生活雜誌，與西門町的空間生產形成相互辯證的關係。雜誌介紹西門町的日本化商店提供消費者指認，而新開設的商店則會設計為符合雜誌所要找尋的風格。次文化群體打造的消費地景，由下而上間接而顯著地影響了國家的再發展計畫。當官員致詞要讓在西門町逛街「像在日本一樣」，徒步區的空間設計跟大道兩旁的商店，入口的光塔跟電視牆，徒步區彷彿是以日本青少年流行商品為主題的消費空間。因為「想像」而實踐出來的文化地景，透過國家的計畫與資本投資生產相應的空間符號，成為沒落西門町的新主題，發動後續的空間生產。

李明璁分析了空間改造與經濟發展的文化基礎。然而對於文化元素如何被挑選為經濟發展或空間改造的基礎，尚缺乏對台北市 1990 年代特殊的文化政治情境的理解。因為這並無法解釋，何以 1990 年代晚期的再造西門町計畫，可以跨越地方商業組織對青少年化的擔憂，打造一個「擬東京」地景。

遲恆昌（2001）從另外一面解釋西門町如何建構為「哈日之城」。遲恆昌認為西門町的再發展是國家的政績。政治與經濟的力量要重新打造西門町尋求利益。方便行事便是利用西門町的主要群體青少年。他指出西門町的再發展政策符合當時台北市長馬英九軸線翻轉的政治論述，從面臨色情、電玩威脅的沒落市中心，青春活力的形象是挽救商圈危機的方式。建立風格、扭轉西門町在 1980 年代末衰敗的形象對於西門町的改造是必要的。以星光大道的鋪面、西門慶等活動吸引青少年，青少年做為西門町的「風格」，正是國家與資本以文化或象徵經濟進行資本積累，以達成「建立形象商圈」的目的（遲恆昌，2001：54-6）。

國家透過都市計畫把青少年拱上舞台的同時，資本也在後方蓄勢待發，鼓勵青少年表現自我的同時召喚更多青少年消費者。因此西門町的徒步區改造計畫，是國家與資本攜手合作所打造的象徵經濟，鼓舞壯大源自 1980 年代中期的青少年消費文化做為西門町象徵經濟的基礎，達到西門町經濟再發展的目的。陳倩菱（2004）後續的研究也證實了西門町空間的符號以及西門町本身做為符號，對青少年的吸引力。街道的廣告看板、簽唱會活動的密集，西門町吸引特定年齡層的族群前來尋找認同。鄭建科（2003）則從西門町徒步區做為青少年交流互動最重要的公共空間「圓環」座椅的拆除，檢視西門町公共空間事實上根據地方商家的利益規劃，目的在於維持一個「易於交易的空間」而非「易於公眾交流」的公共空間。

至於西門町市場在 1990 年代後轉化的研究焦點，主要置於紅樓歷史空間再利用，從文化治理的角度分析紅樓空間意義的單向建構，朝向一個聚合的空間意義

的建構，討論不成功的原因以及分析建構過程。這些研究多是在檢討西門市場轉型成紅樓的成敗，以及事權、如何處理地方關係，尚未出現如同討論西門町徒步區從政治、經濟與文化、社會動員角度發展的分析架構。

近年來形成的同志聚落，衝擊了文化局主導的計畫，凸顯古蹟建構過程意義的競逐。紅樓與同志的歷史，在紅樓古蹟意義建構時被忽略，卻在外圍發展起來影響了國家的詮釋。既有的研究觀點並未將空間意義的建構過程的焦點放在國家以外的行動者的能動性，而只關注國家介入主導空間時，對於市場攤商的賠償或安置問題，以及公私合夥關係的檢討。對於近年來發展的同志店家聯合攤商打造南廣場同志聚落，缺乏經驗現象上的關注。吳芳瑜（2008）雖然把紅樓廣場整體視為一個特區並放入討論的內容，但是主要針對同志特區對公部門的規劃環境造成的影響以及該如何管理的問題，同樣欠缺從社會行動者的角度看待同志聚落對紅樓建構的主動性。

研究西門町 1999 年轉化的幾種觀點：

- 全球化及其地域回應（潘瑾怡，2001）
- 跨文化消費的地景生產（李明璁，2010）
- 再發展的政治經濟力量（遲恆昌，2001）
- 官僚體系與政策矛盾（江宗霖，2005 等）

徒步區跟西門紅樓的改造，完全被置於不同的分析範疇。一方面也是因為對於紅樓的研究，皆尚未將男同志酒吧聚落的成型放入研究視野。對於西門町再造的「面貌」、文化內容，卻不夠有坐落於台北市政治經濟脈絡的動態分析。也就是說，我們還想要進一步理解，青少年跟同志是巧合嗎？是偶然嗎？例如遲恆昌指出青少年徒步區，是國家與資本的建構物，但這並沒有解釋，為什麼要在地方組織力圖更新西門町，把青少年拱上舞台。選擇青少年是一開始的合謀嗎？沒有矛盾嗎？而男同志在西門紅樓離去又重返，1990 年代初期以前備受污名，與紅樓戲院的老舊破敗被連結在一起，成為紅樓邊緣化的指標，2005 年以後卻是紅樓廣場轉型失敗的救星。這十年間「同志」發生了什麼變化？同志出現在紅樓歷史空間轉型中決非偶然。

然而以上的研究，對西門町的再造，多半只視之為國家與資本尋求經濟利益的結果。尤其潘瑾怡以及對西門市場更新的研究，皆著重於經濟或官僚的力量。相對而言，遲恆昌與李明璁已有文化分析的架構。李明璁分析文化基礎的演進，文化與空間生產的機制；遲恆昌指出了政治經濟力量，挪用西門町既有的文化元素—青少年，來扭轉西門町的負面形象。李明璁跟遲恆昌都指向「文化」與國家發動、資本配合的「經濟再發展」計畫有關。但是如何有關？

以上對於既有研究所無法涵蓋的問題，都可以回到本文對於西門町再造提出的觀看角度，也就是光把西門町的再造置於全球化趨勢下經濟結構的影響是不足的。台北市 1990 年代晚期的政治變遷所出現的公共空間重塑與邊緣群體的主體性浮現，是西門町空間變遷的重要脈絡。因此本文提出以都市更新過程公共空間型塑的觀點，方可對於複雜的政治、社會文化以及商業資本、地產資本的經濟因素給予適當的考慮。

接下來我將回顧美國都市更新與文化政策發展的相關研究，以更深化這部份的問題。

二、象徵經濟與公共空間私營化

如何理解都市更新的公共空間政策跟文化政治經濟的關係？當代都市空間的變遷，不論西方去工業化，或是亞洲城市如新加坡加入全球城市競爭得塑造形象的都市發展，或是上海，研究者關注公共空間重構下的空間意義變化，以及產生的社會不平等後果。

西門町再發展以來的公共空間改造，實則處於 1990 年代以來台北市政治變遷以及文化經濟變遷的脈絡中，北美 1970 年代以後對都市空間變遷的政治經濟學討論，提供了晚近全球都市競爭的趨勢一個理解的切入點，也是本文看待 1990 年代以後公共空間的基本框架。台北市 1990 年代以來的公共空間改造雖然有其解嚴後追求主體、臺灣新國族工程的政治社會脈絡，可是並非孤立在全球城市競爭之外。「國際化」的程度更是做為一個城市背離威權邁向進步的價值。因此，英美的都市發展，是有助於我們理解上述問題的重要參照對象。

Sharon Zukin 在 1995 年《城市文化》一書，指出 1990 年代都市公共空間與公共文化正在發生改變。後工業國家的都市情境，經濟結構發生改變，觀光旅遊、生活風格或是藝術品博物館日益發展為重要的經濟發展的基礎。本來應該扮演斡旋社會差異與文化衝突角色的文化政治，卻因為做為經濟發展的基礎，由公眾退位到私人企業。對城市的公共性的協商與斡旋，轉移到經濟發展的邏輯。弔詭的是，類似像美國紐約的大都市，由於移民或是觀光客導致極高人口流動性與異質性帶來多元文化與衝突，什麼是「公共文化」的內涵正面臨莫大的挑戰。對於社會差異與文化衝突在政治領域爭論難休，卻轉進經濟領域，由文化消費進行整合。

但隨著公眾的流動性變得越來越大，成份變得越來越多樣，傳統的機構—包括政黨、也包括社會階層—在表達個人認同方面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而創

造城市形象、定格城市畫面的文化力量，正變得越來越重要。那些創造形象的人，也塑造了一種集體的認同。不管是像迪士尼那樣的媒體公司，還是藝術博物館或政客都發展了公共文化的新空間。

(Zukin, 1995: 3, 粗體爲本文強調)

象徵經濟對公共文化的影響，更是展現在公共空間的變遷上。在象徵經濟發展的結構下，都市公共空間與文化都被捲入象徵經濟的生產與消費中 (Zukin, 1995: 23-4)。城市意象、旅遊，變成都市空間改造的主要依據。

當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危機，將公共空間讓渡給私人企業認養，企業對公共空間的安排與再現，塑造公共空間改造爲吸引觀光客增加城市收益的消費空間，公部門退出公共空間的責任讓渡給私人企業。Zukin 指出，最大的危險就在於型塑都市男女老少都市生活經驗與認同的公共空間的文化再現，變成都市經濟發展的工具，私人企業的單一視野掌控了都市人的慾望、想像。

布萊恩公園、迪士尼世界、索尼廣場主導著公眾的想像力，它們通過對空間的控制以及對時間的殖民，佔據著主導地位。它們絞盡腦汁想像一種局限於商業消費的文明景觀的公共空間想像。(ibid.: 262)

布萊恩公園、時報廣場、索尼廣場的**新公共空間**，它們體現了一種新型空間：全社會私有化的樣板，一種民主權利與社會控制相結合的嘗試。

(ibid.: 293, 粗體爲本文強調)

當商業文化主導了空間生產以及使用的邏輯與規範，社會控制以及重新階層化規制社會群體。以文化消費活動整頓爲安全的都市公共空間，由企業掌握都市公共空間的象徵再現，Zukin 認爲以文化之名，實則以中產階級秩序恢復舊市中心的失序，型塑公共性。

文化策略甚至還讓人想到處理社會差異的新政治策略。文化策略如同歷史短暫的文化多元主義一樣具有挑戰性和被挑戰性。文化策略允許精英人士用折衷的辦法，把城市或地方的視覺表現的一部分簡單易行地分配給每一個群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避免了從各群體的要求的公正性的角度進行等級區分「每個人擁有一種文化，所以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每一群體都得到認可，甚至是對她過去壓抑的承認。過去的「壓抑」被強調了，因為建立起一種文化霸權的視覺秩序似乎是借助於承認以前「看不見的」社會團體並使這些團體變得可見，從而使之平等。...依賴視覺再現的文化策略試圖營造新型的公共文化，雖沒有等級，卻不平等。即使這些視覺再現都運用於平民區，如商業大街、工人階級居住區、公園和市中心等地方，文化策略仍運用視覺

美學來喚回已消失或至少以改頭換面了的中產階級的城市秩序。(ibid.: 274)

因此，文化不再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如果存在有公共文化，那麼也不再是十九世紀階級區分嚴明而可以有的單一公共文化想像；而是在眾生喧嘩的聲音中，這些大大小小聲音的對話，受到商業文化的強勢影響。公共空間的視野與再現，因為經濟發展的文化策略，所以從公眾看守讓渡到私人企業手中，因為具有優越的符號架構能力的企業，文化產業，有能力運用符號來進行經濟發展。因此當都市發展倚賴運作符號的企業，都市公共文化的型塑，也就掌握在這些構設者（framer）手中。

紐約 1990 年代的商業促進區便是一個具體的例子。由於地方政府財政危機，將社區交由地方商業組織認養，給予負責公共空間環境安全、整潔的責任以及徵稅的權力。Zukin 將商業促進區比擬為向迪士尼世界學習的公共空間。她指出北美學者對太過真實的迪士尼世界諸多批評，迪士尼世界被理解為對公共文化強大的視覺與空間的重組 (ibid.: 53)。迪士尼理想化了都市公共空間。將地區的公共空間交由房地產商、零售商組成的地方商業組織管理，正是學習迪士尼世界的空間管理。提供大眾一個安全又乾淨的公共空間，整頓安排空間內的視覺元素，將斷裂的令人不悅的元素排除，虛構出一致性的歷史。迪士尼不但藉由房地產的擴張逐漸佔據市中心，也影響了紐約商業促進區淨化、用私人保全維護公共空間安全。

視覺文化、空間控制與私人經營使得迪士尼成為新公共空間的理想型。從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通常在郊區的購物中心可以發現這樣的空間，但是 1970 年代以後，當保守派政府縮減都市更新的預算、競爭私部門投資，阻卻了地方政府近行都市規劃。一方面受到房地產開發商的擴張策略以及地方政府對空間規劃的退位，導致這個新公共空間逐漸地佔據了市中心。可以說是對福利國家的重組。(ibid.: 54)

紐約市布萊恩特 (Bryant) 公園的整頓轉化，就是一個例子，集中了關於文化策略、公共空間以及社會排除的問題 (ibid.: 285)。私人商業組織從公部門手中認養了布萊恩特公園，並且運用文化活動的安排、消費空間的設計以及警衛巡邏，把公園從遊民與販毒者手中搶奪回來，轉變為一個白領階級中午用餐的安全的、時尚的去處。這樣的公共空間形象也滿足了周圍房地產價值的提高需要。可以看到被選來「活化」公園的文化策略，「在再創造一個可消費的文明形象的同時，也控制著它的多樣性。(ibid.: 31)」。

因此，以 Zukin 的觀察，在美國都市面臨地方政府財政危機、美國公共空間的私營化的趨勢。這樣的意義非但是經濟上的變化，也是關於都市政治的變化。地理學家 Neil Smith (1996) 明言 1990 年代由地方政府所主導、更大規模的都市更

新，即是第三波縉紳化；日本地理學者森正人（2006）則認為 Smith 所講的第三波縉紳化，即是都市空間迪士尼化的內涵。當代公共空間最重要的趨勢，便是公共空間私營化，並且進行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控制，確保公共空間的安全與秩序。

美國經驗的公共空間與政治經濟力量的理論，是否適用於 1990 年代晚期台北市的都市公共空間變遷？接下來從台北市 1990 年代晚期的相關研究，先理解台北市的特質與政治經濟脈絡。

三、1990 年代晚期以降的台北市公共空間

台北市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也經歷了公共空間的變化。1994 年台北市長選舉，累積匯聚了 1980 年代以來各種社會運動，對民主價值的要求，都市中產階級對於集體消費的不滿的社會動員。Huang（2005）分析 1990 年代晚期台北市的政治變遷，1994 年底的台北市長選舉反映了中產階級對都市生活品質以及民主價值的追求，不同社會團體反對國民黨的力量結盟。台北市的空間規劃不再有中央的背書，對「市民參與」的強調是陳水扁當選後開啓的新治理風格（ibid.: 86）。

陳水扁當選以後的台北市，即刻以「空間解嚴」，要恢復城市公共空間的公共性，重塑殖民時期以來的「偽公共空間」。是以公共空間的重塑，成為台北市 1990 年代晚期後威權時期重要的實踐方式。同時重整公共空間的文化元素打造新台北人的經驗與認同。同時由於跟中央的對立關係，陳水扁的治理，也致力於「台北」城市地位的浮現。例如強調台北市獨有的政策，提供台北人優越感（黃孫權，1997；彭揚凱，1998）。

王志弘（2003）用文化治理的概念理解都市治理在文化場域的實作。注意到台北市 1990 年代在文化場域的都市治理的幾種特質，首先是陳水扁的當選，要回應各種反威權的力量，強調庶民記憶、空間解嚴、族群多元平等，平反恢復過去遭受威權所禁錮的主體。除了官方治理，社會群體爭取權益的手法也日益接合文化場域。因此 1990 年代的在「文化」成為不論都市治理或是社會運動新興且十分重要的場域。馬英九重新拿回國民黨執政後，大體遵循市民參與、多元文化主義的治理機制，1999 年文化局成立後更擴大強度與範圍。王志弘並指出，少數群體與多元族群被納入治理的範圍，也成為台北市官方標榜國際城市的指標（ibid.: 156）。這些朝向多元以及邊緣群體的開放，事實上是官方「挪用了這些「文化資源」來作為以文化產業和象徵經濟冀求都市成長的法門；資本的偉岸身形在文化治理的背後升起。」（ibid.: 164）

因此除了塑造集體認同，也有研究者認為空間解嚴追求的公共性，實際上是

整頓為中產階級價值的公共空間。彭揚凱（1998）便批評，陳水扁的再造領導權計畫，是「『以公共之名』給予私有化/市場化一個超乎私利的稱謂」（ibid.: 66-7），認為公共化背後的邏輯其實是自由化，如同市民社會論述的另一面——市場決定論。因此彭揚凱直指「**此處的公共性，是私人資本與市府政策接合的必要語彙**」（ibid.: 67，粗體為本文強調）。

莊雅涵、王奕婷、吳偉立（2004）則是比較了陳水扁、馬英九對基於不同歷史想像不同市民主體的召喚。莊雅涵、王奕婷、吳偉立同樣認為陳水扁舉辦節慶消解威權符號與族群結構的內在緊張，但也同時「藉由犧牲底層人民換取更精緻生活品質以迎合中產階級之城市生活品味」而馬英九「在陳水扁所整頓的基礎上「繼續」打造布爾喬亞之城（ibid.: 57）」。誠品書店早官方一步，在消費空間的塑造上，提供台北的知識精英的全球想像。並被挪用為台北市打造城市形象的文化資本。陳水扁曾經表示「他（陳水扁）上任市長來，唯一的『關說』案就是代誠品書店向新光集團說項，請他們把原先計劃作新光三越百貨的場地割愛出租給誠品。他（陳水扁）說，台北如果多出一個百貨公司，大家的生活品質不會有太大改變，但是，如果『誠品』存在，會對台北人文新形象有幫助。」（蔣文德，1999：92）

關於台北市文化經濟的軌跡，目前還缺乏整體的研究。王志弘從治理面的論述跟再現分析「文化」角色的日漸重要，另外只有零星的例如黃仁志（2005）分析 1990 年代中期以後文化消費空間興起、張立本（2005）從寶藏巖聚落保存運動分析 1990 年代以後運動策略的文化轉、蕭民岳（2008）從 1994 年以後官辦節慶逐漸做為都市治理與經濟發展的核心。這些研究也顯示出「文化」對於台北市都市治理突出的重要角色。這些對文化經濟的興起，只有經驗性的描述，但是目前還缺乏整體結構的解釋。

第三節 當代公共空間的分析架構

從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看到既有的都市更新理論側重國家與地產資本的力量對型塑當代公共空間的影響。但是本文也已經指出在台北市的特殊脈絡中，西門町 1990 年代晚期以降的公共空間再造有著突出的社會群體的主體性鬥爭的經驗現象。以下我將從 Henri Lefebvre 的空間理論出發，在 Lefebvre 討論資本主義都市空間生產的基礎上，Zukin 以及 Don Mitchell（1995）進一步提出當代公共空間的實質意義與生產機制。

Henri Lefebvre（1991）提出空間的三元概念：空間實作（spatial practice）、

空間的再現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以及再現空間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或 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空間實作」指涉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例行、習慣的活動，是感知的，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則壓縮為視覺的。「空間的再現」是科學家、都市規劃專業者、社會工程師所認知到的空間，主宰了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體現國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秩序。「再現空間」則是透過影像與符號直接活出來的 (lived)。因此是屬於「居民」與「使用者」的空間，也是一些藝術家、或少數僅止於作描述的作家、哲學家的空間；這是被支配的空間，卻可透過「想像」來改變空間、使用 (appropriate) 空間。(ibid.: 39)

也就是說，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空間的再現」指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所控制、納入資本主義生產的體系；「再現空間」可理解為便是一般人基於生活、想像、記憶等具有顛覆可能的「文化」。

Lefebvre 敏感於日常生活的批判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空間的使用方式，他藉由旅遊產業的發展指出，在新資本主義的空間實作裡，空間的再現（旅遊業者的規劃）已經對再現空間（太陽、海、節慶、消耗品、花用）進行操弄 (ibid.: 59)。

雖然空間的再現支配了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再現空間是具有顛覆的可能性的。Lefebvre 舉出貧民窟的做為再現空間的例子，顯示外於國家與資本支配體系對空間的差別性使用。Lefebvre 也舉了 1968 年五月革命後，學生運動佔據大學校園的例子 (ibid.: 56)。當學生佔據並且管理自己的空間，要求空間解嚴、平等參與，改變了原來校園空間的使用意義，學生運動隨後引發工人運動、教師、中產階級百萬人上街頭示威，打破了空間的隔閡，不同社會背景的人走出私人空間進入街道等公共空間，改變了大學校園、政府建築以及街道規劃的空間意義。這是從缺乏反思的日常力行活動、空間的再現，轉化為鬆動、顛覆既定秩序的再現空間。⁶

文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架構：

在前一節回顧美國晚近都市更新理論的時候，我已經說明了 Zukin 對美國城市的象徵經濟體制興起、運作所作的分析。Zukin 從房地產與藝術市場的交疊，指出市場運作深深地進入了文化領域。對於公共空間文化元素的佈署、再現，已經不是單純判斷是誰在生產這些符號就可以掌握。這些正在改變公共空間的文化策略，需要警覺於物質權力操弄文化的能力。也就是上述 Lefebvre 所言「空間的再現」幾乎壓倒性的入侵了再現空間。

⁶ 參考陳東升，2010.3 都市社會學講義。

Zukin 提出了「構設者 (framer)」的概念，以區別文化符號的生產者以及真正握有空間安排權力者。藉此概念理解對都市空間生產的實踐，既是象徵權力，又是一種物質權力 (Zukin, 1995: 292)。

構設者比生產者有更大權力。那些分配符號的機構，如迪士尼公司、商業促進區、博物館，有著控制權。多數人忘記了權力有大小之分，把文化符號等同於物質權力。但是對符號權力的要求，並非不依靠對政治權力跟經濟權力的要求。(ibid.)

Mele (2000) 也是進一步把文化視為房地產商與國家操弄的對象。他把行動者分為三類：房地產商、國家、居民，這些行動者形成「再現體制」(ibid.: 16)，這些行動者為了本身的利益或議程、合法化他們自己，如何操弄或是挪用什麼樣的再現。在 Mele 對紐約下東區的研究裡，房地產商把文化差異轉化為經濟價值，吸引中產階級，現在跟過去的關於貧窮、住屋、異教、性別、族群的鬥爭並「沒有」被排除在這些再現中，反而循著可以行銷的差異的織理，符號地被包含進來 (ibid.: 3)。這個地方的脈絡發展出來的前衛藝術，被房地產商轉化為商品，納入文化的循環，可是當地的經濟不平等、住屋問題都沒解決。居民的抗爭、次文化變成可操弄因此可消費的文化素材。從都市衰退所發展出來的次文化 (美國龐克)，形成音樂、藝術上的影響力，然後被房地產商拿來做為符號，形成下東區的地方感跟新認同。

地理學家 Larry Knopp 對情慾空間的分析也是同樣的角度。他指出晚期資本主義對「他者地方性」的敏感，而「情慾」更是其存活的關鍵 (Knopp, 1992)。晚期資本主義的彈性生產，對於地方之間微小的差異性特別敏感，尋找、建構「他者地方性」。資本在尋找新的、更多的獲利投資形式中，所找出的人類能力跟經驗的多樣性，透過空間建構為「差異」或「他者」。這些透過空間地建構起來的他者，以地方認同的形式 (in the form of place-based identities)，變成社會與政治鬥爭的部份物質基礎；其中一些可能變成反霸權的 (Knopp, 1992: 661)。

因此 Knopp 提出對於情慾空間的分析架構，應該把情慾 (sexuality) 視為資本主義發展都市化過程建構起來的面向，如同階級。都市空間的安排反應的是包含了階級、情慾的霸權。

我想強調的是，城市各種性別編碼是多元的鬥爭與衝突所在，同時也是生產、再製、改變社會關係與空間的工具。...文化或情慾的編碼，已經變成資本積累或是階級關係再生產的中心。(ibid.: 153)

他把情慾建構置於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軌跡來解釋，都市化與情慾實踐、認

同，是互相交織的過程，因此，都市非傳統（uncomformist）的次文化空間，也要隨時注意資本的作用。例如男同志酒吧是一種再現鬥爭的勝利，對於空間的再編碼；但要注意的是這也是符合資本主義找尋可以獲利的市場。

例如同志社區，不單單只是對生活風格的追求或政治權力，就會形成了，他研究紐奧良，由同志房地產經濟、房地產商，還有歷史資產保存的運動，運用策略，有成功也有失敗，才形成的。過程中，是不同行動者有不同的利益，不同利益的結盟，對於同志議題低調、瞄準不同階級同志的策略等等。他以彈性積累的立場，指出地方微細的差異性，都變成晚期資本主義操弄的對象，同志空間這種異質空間當然也躲不過，階級利益也不是在邊緣空間就不會存在。

Binnie 同樣極具批判性的研究同志空間，比較倫敦跟阿姆斯特丹以法律上的寬容性以及政府對於同志空間再現的支持所形成同志首都，以及倫敦在法律上保守卻因為消費空間的形式也成為同志首都，所可能具有的去政治的危險性—同志消費空間也許脆弱的很容易被異性戀資本所取代（Binnie, 1995）。Bell and Binnie（2004）更指出，男同志空間的存在，已經成為全球大都市文化資本的重要指標，甚至成為都市發展政策支持的空間生產。他們以倫敦的同志村落為例，批評整合進都市改造政策所打造出來的同志空間，出現「同性戀正常化（homonormativity）」的結果，對於異質的情慾表現，更加邊緣化或污名化。

相較王志弘（1996）⁷、賴正哲（1998）⁸、吳文煜（2003）⁹以身體展演構成「再現空間」來分析情慾地景，呂錦媛（2003）¹⁰對臺灣女同志酒吧如何生存、謝佩娟（1998）¹¹對於新公園同志陣線抗爭事件的分析、許雯娟（2007）¹²分析同玩節、邱珍瑤（2004）¹³對彩虹社區的分析，都從身體展演、再現，擴大到與社區的互動、與警察權力、與地方政府權力、社會運動介入政策的面向。

紀大偉（2002）殷切提出的，關於同志的認同與消費，應著眼於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他直接的看法：「流動的元素不是語碼，不是慾望，而是錢。」從臺灣的同志空間的文獻，社會空間打造史，以及 1990 年代同志運動發展跟國家機器的對抗，研究問題較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發問。

⁷ 王志弘，1996，〈台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 195-218。

⁸ 賴正哲，1998，在公司上班：新公園作為男同志演出地景之研究。淡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

⁹ 吳文煜，2003，河邊春夢：台灣高雄愛河畔男性間性慾地景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台灣大學城鄉所碩士論文。

¹⁰ 呂錦媛，2003，金錢與探戈：台灣女同志酒吧之研究。臺灣大學社會系碩士論文。

¹¹ 謝佩娟，1998，台北新公園同志運動--情慾主體的社會實踐。台灣大學城鄉所碩士論文。

¹² 許雯娟，2007，台北非常同志：台北同玩節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台灣大學城鄉所碩士論文。

¹³ 邱珍瑤，2004，消費空間與同志身份之研究。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再現空間的政治性、顛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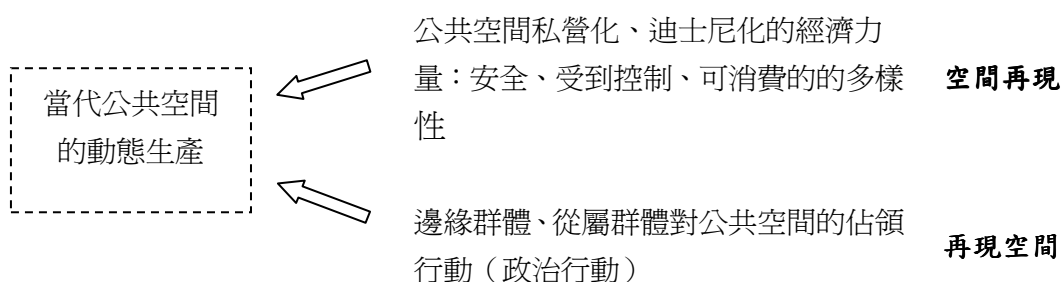
Mitchell (1995) 則是從舊金山人民公園的抗爭事件，指出了當代公共空間的動態性生產，總是處於「空間的再現」跟「再現空間」兩種概念的張力中 (115)。Mitchell 歸類兩種對公共空間的概念，一種是認為公共空間應該是要提供給各種群體自由互動的場合；另一種則是認為公共空間是要提供安全的環境讓公眾使用。公共空間的公共性，一直處於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中。因此，具體的公共空間生產，乃是在公共空間迪士尼化這個趨勢，以及來自邊緣群體對於公共空間近用權的鬥爭下發生。也就是說公共空間是一個不斷受到控制的力量，以及邊緣群體不斷爭取被吸納的鬥爭過程在發生變化。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公共空間也是**為了再現的空間 (spaces for representation)**。意思是公共空間是政治運動可以佔有 (stake out) 這個空間而讓它可以被看見。在公共空間裡，政治組織可以將他們自己再現給更廣大的公眾。藉著公開地宣稱佔有 (claim) 空間、藉著打造公共空間，社會群體變成公眾。舉例來說，只有在公共空間裡遊民才具有成為公眾的一部分的正當性。既然遊民或其他邊緣群體至今仍是不被社會看見的，他們無法被政策所考慮進去。從這點來說，公共空間對於民主政治來說是絕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公共空間使得**政治行動**得以可能。

(Mitchell, 1995: 115, 粗體為本文強調)

在這樣的意義下，當代公共空間的公共性，便可以從這兩種力量的對抗中來檢視。邊緣或弱勢群體是否可以藉由**佔領**公共空間，讓自己變得可見、能進入公眾的視野，被吸納成為公眾的一份子 (124)，是一個用來檢視當代公共空間的角度。

當代公共空間生產的兩股力量：



第四節 研究提問

回到台北的脈絡，「空間解嚴」是後威權台北市要從「威權空間」（也是一種空間的再現）恢復、平反都市居民生活經驗與記憶的再現空間。這是一項社會—文化—空間工程。首都核心圈規劃即是透過公共空間改造塑造台北市新的及體認同。所要做的工作，是在消解威權的符號以後，必須在空間填入新的符號（蕭民岳，2008：92）。本文採用「文化政治」較為廣泛的概念，包含政權的轉變以及社會群體的動員，看待 1994 年以後的公共空間轉化。

1990 年代中期，陳其南的「社區總體營造」理念變成文建會的重要政策。陳水扁在台北市的公共空間改造計畫，處於「空間解嚴」以及「社區營造」的脈絡。主要的目的乃是將博愛特區等戒嚴的空間，回歸到「公共」的性質。（1）以市民的日常生活取代威權符號。從威權解放出來，建立台北市的新城市認同。除了回歸常民的文化，與社區營造，另外，台北市國際化的危機感，生活品質，新的城市形象：（2）內部生活品質，以及追趕亞太營運中心的（3）全球城市形象。

1990 年代中期台北市的公共空間再造，主要是以上三個動力。在此要回到西門町進行再造的脈絡。西門町的再造很大一部份原因是受到市中心東移的影響，當時西門町的內部經濟危機，已經讓地方組織催促硬體的更新，以及如何重回中心地位。也關係到城市新門面或是民選首長的政績。西門町失去中心地位，面臨形象與認同危機。例如跟東區相較，西門町顯得老舊、落後、色牛問題也令人感到治安不佳等負面形象。因此給西門町一張新的臉，是超越光是就道路硬體進行更新的更核心的層面。包含在台北市公共空間改造首都核心區歷史保存區計畫。建立台北市門面、形象以及重塑城市認同以及再現集體記憶。對台北市政府來說，是要如何重塑台北門面。因此台北市政府回應西門町內部的更新需求時，雖然以社區營造的模式強調市民的參與式規劃，但是從台北市政府對提案的選擇，事後可以說，選擇以「青少年城市空間」為主題，顯然超越地方社區的層次，而做為台北市政府的公共空間重塑與都市治理的對象。一方面也是因為西門町是舊市中心，屬於集體記憶的空間，受到多方的期待（例如電影產業界）。

為什麼從「再現公共文化」的角度來談？我們看到台北新故鄉的打造，在西區的第一步便是從威權解放，要填入市民文化元素。這些元素包括了本來被壓制的多元歷史記憶，也包括台北市「多元主體」的展現。（多元尊重平等的政見）這樣的再造台北政策，同時也暴露文化政策的貧乏以及不合時宜。因此，民選以後的台北市城市重塑，涉及到「公共文化的再現」。多元主體（性工作、原住民、客家、同志）的浮現以及對公共性的質疑發聲、反污名行動（謝佩娟，1998），這種解嚴後對「多元」價值的追求，到馬英九時期更加強調。

西門町的再造，涉及台北市重塑或再現公共文化的過程。西門町公共空間的改造，正是台北市 90 中期以後公共文化再現的映照。這也是為什麼本文從「再現公共文化」的角度來思考西門町再造核心關於文化再現的重組。

在說明本文發問的角度與脈絡後，接下來要釐清討論的取徑座落於什麼範疇。民選市長陳水扁與馬英九對「多元」的競爭，以及從文化局成立初期，多元主體的再現政治，跟政權的親近關係，陳水扁跟馬英九在執政期間分別鮮明的選了兩個都市群體青少年跟同志來標誌政權的多元開放性，因此，從都市政治的角度來談多元主體的文化再現是毋庸置疑的。

青少年跟同志兩種主體的提昇（去污名）跟西門町公共空間的再造有極大的關聯。第二，解嚴後很快面臨城市競爭壓力，從威權政治得到自由，這些被賦予主體性的文化元素，也透過消費以及文化商品來提供。這提供台北市過度到文化經濟的一種解釋。例如陳水扁藉由誠品書店、整合 1996 年以後西門町蔓延的日本商品的青少年形象，以及要賦予的青少年主體性、形象，最後西門町以哈日之城前衛新潮的形象，從沒落邊緣亟待拯救的處境中，重新變成商業資本競追利潤所在。又例如 2004 年以後明白提出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台北市解嚴後有尋找新形象的壓力，一個來自臺灣內部的城市競爭（尤其是高雄），一個是台北市追逐全球化，必須在全球城市文化位階找到位置。觀光客，以夜市等地方文化作城市行銷的利基，也認知到必須有全球城市或全球旅遊的配備，這也是台北市同志受到台北市政府支持的變化軌跡。

西門市場更新，1996 年便以社區營造的文化產業，電影空間來規劃，龍應台文化局文化消費空間文化與經濟 2002 當時還沒有清楚的論述，還有文化跟商業的對立。文化經濟不如文化政治清楚可辨，但正是如此，可以從西門町這個地方的例子，初探台北市文化政治經濟的轉變。

因此，本文有兩個主要的研究提問：

- 一、 **台北市 1994 年都市政治變遷，陳水扁的當選將都市治理轉入「市民參與」的新風格。透過「空間解嚴」政策實踐改造公共空間、塑造台北市集體記憶與認同的工程。也引發都市邊緣群體例如同志相應的空間—公民身份運動。「空間」與「文化」乃是首要戰場。這樣的文化政治脈絡，是西門町 1990 年代以後再發展的歷史與政治條件。從西門町的例子，嘗試分析台北市 1990 年代以後可能的文化經濟發展的軌跡。**
- 二、 **本文最核心的問題是在公共空間改造過程，邊緣群體打造「為了再現的**

空間 (space for representation)」的可能條件為何？1990 年代晚期台北市的公共空間解嚴伴隨的是同時由上而下也由下而上地，透過恢復、平反都市主體的文化元素來(重)塑造都市主體。主體的塑造或文化元素的架構、編整，除了國家介入與社群行動，也涉及了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經濟。在理論上的意義乃是由生活、藝術構成的「再現空間 (space of representaton)」受到資本主義秩序的穿入，文化元素成爲經濟發展的基礎。本文藉由 Zukin 與 Mitchell 兩種對「再現空間」的修正概念，從 1990 年代台北市空間解嚴脈絡坐落到西門町公共空間改造過程，分析青少年與男同志的空間，是從塑造主體轉變爲由私人企業所接收援引的文化經濟符號？抑或打造了可以用來向公眾自我再現的「爲了再現的空間」的公共空間？

要回答西門町徒步區以及紅樓(西門市場)的空間意義轉化，我將以 Lefebvre 「空間的再現」與「再現空間」兩個概念，做爲理解國家與資本還有邊緣群體行動者對於空間的佔有造成的意義轉化。徒步區空間以及紅樓空間歷史上的意義變遷，找出具有的歷史文化元素；接下來分析由哪些行動者以及行動者之間的結盟，轉化了空間意義。最後分析空間使用的權力關係以及是誰掌握空間再現，來檢視這是一個青少年徒步區以及紅樓南廣場，是否爲一個邊緣群體具有自我現在、向主流社會發生、具有政治動員力的公共空間。

第五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文分析的對象是西門町今日徒步區以及紅樓南廣場男同志酒吧聚落的空間轉化過程，因此集中討論青少年與男同志群體佔有這兩個公共空間的意義是如何而來。從經驗資料上依據兩個空間不盡相同的實際狀況把主要行動者區分爲國家(地方政府)、地主(房東)、大小型零售資本、以及社會群體。

由於在九零年代的再發展論述所挪用的文化元素，常常來自於西門町悠久又豐富的歷史，也就是透過對歷史的選取、再現而來，這部份我將以次級資料(歷史研究)以及報紙資料(臺灣日日新報、聯合資料庫(1951-)以及知識贏家(1994-))來重建西門町的歷史景象，其主要的空間意義變遷以及使用者的變化、再現。報紙資料庫方面首先以「西門町」、「西門鬧區」爲關鍵字，拼湊西門町發展的全貌以及透過主流媒體所形成的主要印象，再以「青少年」、「同志」、「同性戀」與「西門町」、「紅樓」的交集整理青少年與男同志與西門町發生什麼樣的關聯。台北市政府的規劃報告書(《台北市西門商業區(中華路一段)再發展構想》、《台北市行人徒步區規劃研究—以西門地區爲實例》、《台北市西門紅樓調查研究》等)以及參與西門町改造的基金會例如導航基金會的報告書、民間組織的出版品(例如西

門更新促進會的會刊、徒步區促進會各活動的宣傳手冊)，也是瞭解國家政策以及社會團體所作的論述以及再現的內涵。

針對 1990 年代的再發展行動，則選定關鍵的行動者進行深度訪談，輔以報紙與歷史資料相互參照佐證。進行訪問的對象，包括：徒步區發展促進會前理事長（同時也是從 1990 年徒步區管委會時代便參與其中的商家兼屋主）、現任促進會總幹事、徒步區電影公園警衛、陳水扁市府時代都發局官員、導航基金會前工作人員、西門市場管理委員會會長、紅樓同志創業商家 4 人（包括最主要組織目前紅樓同志酒吧聚落重大活動的主導人）。已經找不到的開創元老，則以電台訪問錄音檔為資料來源。除了藉由對這些關鍵行動者的訪談理解歷史過程與上述報紙、歷史研究等資料作一對照，以及現有的權力關係，同時也藉由訪談瞭解各行動者對於徒步區與紅樓空間的想像與期待。

	訪談日期	受訪者身份（匿名）
1	2009/5/6	T（gay bar 店家）
2	2009/5/6	Y（男同志受訪者）
3	2009/5/8	B（男同志受訪者）
4	2009/5/16	Li（gay bar 店家）
5	2009/5/18	H（西門市場自治會會長）
6	2009/5/21	Ts（gay bar 店家）
7	2009/6/4	W（前都發局長官員）
8	2009/6/4	L（前導航基金會專員）
9	2009/6/8	W（前都發局長官員）
10	2009/06/11	H（西門市場自治會會長）
11	2009/6/19	H（西門市場自治會會長）
12	2009/11/16	S（gay bar 店家）
13	2009/12/16	G（西門促進會前理事長）
14	2009/12/29	Ls（西門促進會總幹事）

受訪者一覽表

第二章 1980 年代：邊緣的中心

在 1990 年代都心再造之前，西門町所面臨的是中心地位失卻。過去是台北的幾何與交通中心，卻在 1980 年代「東區」形成新中心的新時空條件下，西門町成了舊時代遺留的舊中心，¹⁴一個既中心又邊緣的尷尬處境。西門町再造計畫回應中心東移的情勢，試圖將西門町提升作為台北新門面。

西門町從戰後開始作為全市中心超過三十個年頭，在這段時間累積著多重族群的使用遺跡與記憶。在 1980 年代，東區的中心地位逐漸形成後，西門町並未被立刻棄之如空城，而是由青少年、學生、性工作者、同性戀、台北縣勞工以及其他未曾離開西門町的人們，共同塑造了西門町的獨特氛圍：「邊緣」且「鬆動」。當東區成為台北市經濟再結構下的新政治經濟「中心」，西門町則形成了與此相對的「邊緣」¹⁵。在這一連串變遷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西門町的「青少年化」¹⁶。

在本章中，我將結合政治、經濟與文化面向，從政治經濟力量的變動推引，以及使用群體的可見與不可見的變化，嘗試勾勒 1980 年代的西門町從中心商業區轉變為「沒落鬧區」的過程。¹⁷二次戰後，台灣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西門町作為經濟中心隨著消費的集中而匯聚各種群體，產生了各種次文化。到了 1980 年代，西門町面臨經濟再結構的情勢，國家計畫與資本投資出走形成關鍵的變遷條件跟空間基礎，前階段形成的次文化則扮演要角，讓西門町得以轉變「另一種中心」。我將指出兩個西門町的重要族群：青少年與同性戀，其一顯一隱地共同促成西門町形成「另一種中心」。

¹⁴ 本文採用夏鑄九（1987）的說法，忠孝東路四段一帶的商圈成型於 1984 年，太平洋崇光百貨開幕的時候。這個時間指的不單是開發計畫的完成，也包含形成台北市服務業新貴的新消費中心。

¹⁵ 可參考符耀湘的描述，他認為 1990 年代初期的西門町是一個非日常非工作節奏的都市空間。在其中青少年、學生、老人都不是白領上班族。而給予西門町獨特的空間節奏感。另外例如蔡明亮描寫西門町的兩部電影：《青少年哪吒》（1992）與《河流》（1997），是西門町青少年與老年人、同性戀「邊緣情慾」的空間。

¹⁶ 王德生、賀陳旦於 1985 年所著《台北市行人徒步區規劃研究—以西門商業區為例》中，就預測西門町的青少年化，消費水平降低以及對環境破壞力強。另外台大土木研究所都市計畫室受委託的《中華路一段再發展構想》也分析在東區形成以後，西門町的消費水平將會下降，轉為較年輕的消費者的市場。

¹⁷ 張大春（1992）用「沒落鬧區」稱呼 1990 年代初期的西門町處境。

第一節 中心的轉移

一、西門町形成「中心」

西門町原是日本僑民的居住與商業區，屬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內地人街」，二次戰後，大量日本僑民遣返回國，而在 1949 年國共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更帶來一波數量龐大的移民，以城內與西門町做為主要安置空間，短短幾年內，西門町在人口組成上經歷巨大轉變，而後又經歷龐大的城鄉移民潮，這些轉變使得西門町成為中心。西門町在殖民時期累積的資本與空間，以及戰後經歷的人口變遷與政治權力重新注入，西門町成為新政權跟它的資本與移民的集中區域，台北市的中心商業區。以下，將分別從移民的文化條件跟戰後治理的政治經濟條件，具體說明西門町成為台北市中心的過程。

(1) 戰後初期本省移民以及外省移民形成社區

戰前西門市場或西門町的日本店舖，便會僱用臺灣人員工，因此就有少量的城鄉移民¹⁸。戰爭結束後，這些員工接手店舖，或是在西門町居住生活。也有更多中南部的本省移民到西門町做生意。除了臺灣本省人買下接手日本人的店舖，或是從外地移進西門町做生意¹⁹，也有大量的外省移民安置於此。不少房屋跟公家機關為國民黨政府接收，分配租售給新移民。加上大量的移民在中華路以及西本願寺、西門市場等大型廣場形成暫居社區。

戰後初期，主要的象徵中心西門市場周圍，從淺草的慾望想像，轉為對上海的鄉愁遙望。²⁰市場周圍便形成小上海的地景，八角堂也為上海人陳惠文所租用經營。上海式的消費地景，取代了日本風味的地景。夜總會與舞廳、歌廳也圍繞在昔日的「台北淺草」。²¹

¹⁸ 可參見黃永詮會長的訪談，日本商店聘請比較低價的台籍員工是常見的現象。

¹⁹ 聯合報，1958/1/6，〈西門棚屋小史 地處鬧區身價彌高 夕陽雖好惜近黃昏〉。

²⁰ 參考葉龍彥，1999，《紅樓尋星夢—西門町的故事》。例如販售日貨的百貨公司轉為販售上海商品的「國貨」百貨公司、西門市場外圍出現「海派」的「上海紅玫瑰」理髮廳，以及西門市場的入口八角堂二樓改為上演上海戲的「滬園劇場」。西門市場周圍從戰前譽為超越東京淺草轉變為戰爭偏安的「小上海」景象。白先勇《台北人》對尹雪豔的描述，展現了戰後初期上海移民在西門市場一帶的消費生活。

²¹ 例如《臺灣日日新報》，1912/2/19，西門市場被與東京淺草的熱鬧地景相比較。西門市場於戰前是規範嚴謹的官有市場，周圍是日本情調的夜市。1935 年，被選為臺灣總督府博覽會的會場之一。不但是日本僑民日常生活的中心，也是日本殖民政府展現治理實力的空間。另外，從《臺灣通信》針對西門町市場改建耗費鉅款的批評，可見西門町市場的改建目的是彰顯統治者的經濟技術實力，達到彰顯「國力」的目的。並非符合當時人民消費水平的普遍性消費市場，而是屬於高級、高價的百貨公司。參考：《臺灣通信》，大正五年（1916 年）二月十日。

此外，國民黨政府來台的大量移民，在西門町東側的鐵路沿線成爲最大的臨時移民收容場所。戰後的遷入中華路與西門市場的移民，以違章建築的形式形成商業區。這些移民在中華路、西門市場形成了庶民、低價的經濟地景。

除了外省籍新移民，來自中南部的移民，也於相同時期遷入西門市場社區。²²「戰爭期間還是市場，戰後本省外省通通都來阿，大家在這個地方住、做生意，慢慢就形成比較凌亂的傳統市場。」（H，訪談稿 2009/05/18）。在西門圓環靠西門市場與博愛路兩側，也分別由本省人與山東移民形成比中華路攤棚更早的口味小吃店。²³

根據雷柏爾、陳紹馨（1954）對中華路攤棚（新建區）的研究記錄，攤棚住戶主要爲外省籍居民，但也有 26%本省籍居民（其中 75%爲外縣市移民）。形成中華路攤棚就地而立的各種小商業、手工業住商混和區。中華路棚戶在 1957 年請求免於拆除的請願書述及：

（一）中華路為台北市重要商業區之一，若加以拆除，將危害民生，減削民力，（二）中華路正式戶口一千六百餘戶，以一家四口計，合計六千餘人，臨時戶口三千餘人，賴以謀生者達萬人，多為大陸來台之義民及本省各縣市來台北謀生者，今日中華路之繁榮，均由血汗奮鬥而來。²⁴

顯示出戰後中華路由移民所組成的違建，雖是違建實爲當時法令根本無法相應人口激增的都市需求。中華路攤棚形成由移民組成的「商業區」，位於都市精華中心，也自然成爲平民階層的中心商業區。

（2）新政權的政治經濟投資

國民黨政權跟新進資本的發展，延續日本人的區位集中在城內與西門町。除了地理空間上延續前朝的區位，另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西門町有大量的戲院土地接收。戲院土地佔地廣大並且劃爲商四用地，再開發利益十分可觀。根據翁臺生（1976）的說法，在國共內戰時期，上海資本看情勢不佳，便投入到西門町商業區購買土地。資本快速集中以及土地再開發的利益，也造成西門町炒地皮的景象。

25

²² 對西門市場攤商的訪問，參考自：懷寧傳播公司製作，公共電視台監製，2008，《西門市場百年滄桑》。台北市：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²³ 聯合報，1958/1/6，〈西門棚屋小史 地處鬧區身價彌高 夕陽雖好惜近黃昏〉。

²⁴ 刊載於聯合報，1957/1/11，〈中華路棚戶請願 要求免拆並准整修 市議會昨討論結果決請市府准予整修〉。

²⁵ 翁臺生，1976，《西門町的故事》，台北市：龍年出版社。

改建中華商場

1960年，台北市政府將中華路攤棚「整頓」為「中華商場」。象徵著國民黨政權對台北市的治理，從戰爭狀態開始轉為建設。中華商場於1961年四月落成啓用，從忠孝西路一路延伸到愛國西路，成為戰後台北市最現代化的象徵，也是全國最大的綜合商場。各種商品，飲食、制服、茶館、軍用品、古玩買賣聚集於此。

因此中華商場第一個作用，就是集中多元的消費文化。比更新改建前的中華路攤棚匯聚數量更多、種類更多元的商品。曾旭正（1994）指出，中華商場已經不同於1950年代做為戰爭期間移民的暫棲地，具體的功能已經是活絡商品經濟、促進流通的都市中心（ibid.: 153）。尤其1960年代，大量城鄉移民湧入台北縣市。對城鄉移民來說，台北車站不但是台北市入口意象也是與故鄉的連結。而商品多元集中又廉價的中華商場，更是再生產的主要空間。本來就受西門町電影街吸引的人潮，中華商場更擴大吸引力，是形成中心商業區的關鍵。

中華商場另一項作用，是連接「城內」衡陽路的商業區與中華路西側電影街一帶，等於擴大為「西門商業區」。為了更方便連結兩側商業區，避免行人受到鐵路交通的阻礙，台北市政府於1968年建造天橋連接商場各棟。²⁶1971年又連接武昌、漢口、開封街。政治金融中心與電影街的連結，加上中華商場匯聚各種人潮，加速西門町成為台北市的中心商業區。中華商場的霓虹廣告招牌加上西門町的電影街，成為臺北的不夜城。也是火車進入台北市必經路線，霓虹大招牌，成為台北市以外的人入城的符號，現代化的商場，形成台北市的入口意象。逐漸形成首都中心的象徵。

創造性破壞

中華商場整頓了戰後初期臨時收容社區以後，中華路西側的西門町地區也迅速再開發。中華路以西、長沙街以北的地區，屬於日本殖民時期新起町、西門町等商業精華區。素以「電影街」吸引台北市民延續到戰後。戰後初期原先只是零星的夜總會、歌舞廳的開設，但是豐富的商業活動與夜生活，到了1964年，西門町超越衡陽路的地價。當時官員說道，「過去衡陽路的繁榮，已漸為西門一帶所取代。」²⁷不久，西門町進行大規模的改建。

1960年代初期，台北市長黃啓瑞便曾說要把西門市場改建大樓，發展為「臺

²⁶ 聯合報，1968/5/5/，〈台北之窗 西門人行陸橋開工〉。

²⁷ 聯合報，1964/8/5/，〈西門區夜市繁華 地價較衡陽路高 北市地政科長提解釋〉

北的曼哈頓」。²⁸如上所述，電影院全數為國民黨接收，由黨營企業或是販售給財團改建。戰前的舊戲院紛紛改建商業大樓。由於資金不斷的投入發展，1960年代快速進行「創造性破壞」的時期。除了夜總會、歌廳、舞廳，上海資本更是紛紛將戲院土地改建為商業大樓。六零年代到七零年代西門町改建商業大樓或百貨公司整理如下：

大樓名稱	報導日期與標題
五洲大樓	1960-12-17/聯合報〈纏訟十三載 鬧區起高樓 台北將有「夜總會」〉
第一百貨公司(本省規模最大)	1965-10-06/聯合報〈設立大百貨公司 經濟發展所必需 第一公司昨開幕典禮 經長李國鼎發表談話〉
	1967-07-22/聯合報〈原憲兵隊舊址 將建摩天大樓 亞洲水泥首先建造 希望准予儘量加高〉
	1965-11-05/聯合報〈新世界將停業 改建八層大樓〉
	1967-07-26/經濟日報〈西門鬧區·建地四百五十坪 中影第一大樓 下月初揭幕 對台灣的都市繁榮帶來了更嶄新的一面〉
遠東百貨公司	1967-10-11/經濟日報〈昨天開幕營業〉
今日百貨公司暨今日育樂中心	1968-06-20/經濟日報〈萬企育樂大廈 十月竣工 正式營業〉
	1968-12-09/經濟日報〈今日百貨公司開業〉
亞洲百貨	1969-11-29/聯合報〈亞洲百貨公司 定明天揭幕〉
人人百貨	1972-12-03/經濟日報〈台北人人百貨公司開幕〉
萬年商業綜合大樓	1973-03-16/經濟日報〈萬年商業綜合大樓 月底竣工〉
	1973-10-06/聯合報〈萬年商業大樓今天開幕〉
來來名店百貨	1978-11-25/經濟日報〈來來名店百貨今開幕〉
獅子林新光商業大樓	1979-03-29/經濟日報〈獅子林新光商業大樓明開幕 佔地一萬四千坪·投資廿億新台幣〉
東本願寺	1961-11-20/聯合報〈西門東本願寺 將改建大廈 財產局決將其標售 僑商財團將投資建旅社〉
	1967-06-27/聯合報〈東本願寺舊址籌劃地盡其利將建豪華觀光大廈 四家公司各建一家〉
	1968-08-10/經濟日報〈東本願寺舊址 將興建大商場〉
	1971-11-12/聯合報〈北市都市計劃委會通過 東本願寺所屬街廓 指定為特定專用區 建築物高度一律為三十五公尺〉
力霸百貨	1982-05-14/經濟日報〈力霸接管大王百貨明天開業〉

本研究整理

²⁸ 聯合報，1960/7/21，〈西門市場將改建 巨廈直上七重天〉。

可以見到西門町迅速的蓋起高樓。亞洲水泥、新光、遠東也計畫在中華路與寶慶路口有一步的摩天大樓計畫。新式電影院、百貨公司的集中，使得西門町凌駕大稻埕，成為台北市的單一市中心。精華區也由舊時西門町（成都路）飽和逐漸往北推移。²⁹

（3）西門町的中心性

如一開始所提，戰後西門町的人口有大幅變化。台北市有兩波主要的移民潮，一是 1949 年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的中國移民，第二是 1960 年代臺灣經貿政策下的城鄉移民潮（章英華，1995）。西門町正是這兩波移民潮轉化台北市地景展現的一個重要的空間。

曾旭正（1994）指出催動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台北市都市地景變遷主要的力量來自大量湧入的城鄉移民。城鄉移民居住以及再生產的消費需求，導致的商業地景，沖淡了威權國家透過闢建公共建築的政治宣示象徵。同時城鄉移民的混入，也打破了原來延續殖民統治空間區隔的日人/台人到外省人/本省人的區隔與對立（ibid.: 149）。因此，做為移民與故鄉連結的台北火車站，以及滿足消費需求的中華商場，在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階段，成為台北市非常重要的地景元素（ibid.: 149）。中華商場會聚了各種社會分類，而成為社會空間的中心。透過象徵的集中，它是個象徵的中心。西門町戰後迅速發展為充滿各種社會分類的市中心（ibid.: 153）。

如前述，西門町在戰後快速的形成都市中心。由於移民以及都市財富集中於此，打造消費地景。中華商場與電影院、百貨公司的商業區，移民再生產活動的集中，形成西門町象徵上的中心性以及集體的都市經驗。統治者跟庶民的文化夾雜、不同省份移民形成大雜院的社區、軍人美軍的同性戀、青年的次文化，彼此在同一個公共空間中發生互動或並置。³⁰

戰後這種快速的資本集中創造性破壞跟移民經驗形成的中心性，是另一個商業中心大稻埕延平北路一帶缺乏的。不同於日本統治時代，城內跟大稻埕兩個不同族群的文化中心空間³¹。百貨公司與電影院的發展跟城鄉移民的都市經驗，凝聚台北市的中心象徵。加上交通方便，鄰近新莊、三重等工業區，西門町有比大稻埕更好的條件成為首都的中心。這個景象到 1980 年代發生改變。

²⁹ 聯合報，1968/6/16，〈西門鬧區 鑽石地帶北移〉。

³⁰ 例如白先勇《孽子》中，也揭露青春鳥兒在中華商場的流連身影。參考自：鄭懿瀛，〈中華商場的興衰〉，<http://km.cca.gov.tw/myphoto/show.asp?categoryid=79>（國家文化資料庫）。

³¹ 徐裕健（1993）分析日本殖民時期台北市的社會空間，指出雖然城內做為支配性的地景，但是大稻埕也成為台籍反對運動的中心，是一反支配的社會空間。參見：徐裕健，1993，《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台北為個案》，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二、整體發展的選擇：東移與其後果

(1) 中心商業區的附帶問題

西門町做為中心商業區，人口集中也逐漸出現負面的後果，例如交通擁擠、髒亂、治安問題。鬧區龍蛇雜處所衍生的暴力、勒索、色情，電動玩具店的盛行，西門町那時是個繁榮但也使人墮落的花花世界，例如在層出不窮的財務犯罪案件中，一則標題為〈都市五光十色 小伙子意亂情迷 鄉村青年·台北謀生 把持不定·易入歧途〉的報導，特別提及西門町吸納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特別容易出現因為迷失而來的犯罪：

前幾天，警方偵破了一個由十幾名青少年組成的搶奪集團，這些青少年都是從中南部來台北找事的，結果事沒找到，卻走上這條路。警方在偵破這個案子的過程中，發現這些青少年，大多只有國校畢業程度，本來彼此不認識，在流蕩期間因為一起在西門鬧區，才結成一夥。

(聯合報，1971/8/9)

除此之外，令人難以忍受的是色情黃牛日益猖獗，西門町不論電影黃牛或色情黃牛一直都在鬧區遊走討生活。西門町巷弄充斥以理髮廳為掩飾的色情業，當街拉客的色情黃牛日益猖獗，甚至發生命案。在 1980 年代初期成為最令人卻步的現象。

台北市西門鬧區的理髮廳密度之高，在某些地段已到了三五步一家的程度。武昌街、漢口街、昆明街、西寧南路和漢中街充斥了許多幫理髮廳拉客的色情黃牛，不斷騷擾路過的單身男子。

(聯合報，1981/4/13)

西門町的色情理髮廳與南邊的華西街娼館相互呼應，有「北剃頭店、南華西街」的名聲。色情業者彼此競爭下，拉客黃牛也因應而生。攔路拉客成了西門町一大特色，前往西門町逛街的男性們，不是被電影票黃牛拉，就是被色情黃牛拉。色情黃牛拉客導致糾紛或暴力威脅，也嚴重影響西門町的治安。³²

交通、治安、色情問題一直困擾著西門町。這些問題與鬧區相應相生。與此同時，1980 年代資本開始轉往東區，西門町發展逐漸停滯。其地區意象越來越破敗，獅子林一帶被視為危險的都市邊境。³³

³² 參考：中國時報，2007/9/25，〈援交當道 三七仔只剩一口氣〉。

³³ 最近，台北市刑大檢扒組及城中分局刑事組，在西門鬧區先後破獲了三件恐嚇、勒索與搶奪案

警方破獲的色情黃牛搶奪路人及不良分子連續恐嚇勒索學生二件案子，雖是兩種不同的犯罪型態，但都與「地緣」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一名市民指出，西門鬧區由於地上、地下特種營業充斥，畸形發展的結果，治安上也面臨重大考驗，已逐漸成為犯罪者的溫床。

西門鬧區，除了幾家正派的電影院外，充斥的卻是色情理髮廳、色情按摩院、色情表演、舞個通宵的舞廳、做色情媒介的賓館、旅社，色情黃牛擋道斂財，繁華是繁華，卻成了罪惡的淵藪。

雖然主管這個地區的警察單位，站崗依舊，取締依舊，抓幾個「色牛」充數依舊，但是擺在眼前的是恐嚇依舊，勒索依舊，搶奪依舊，色情依舊。³⁴

西門町馬路上電玩、色情黃牛已經令人舉步維艱。西門町的色情黃牛以及財務犯罪、治安問題，瀕臨都市居民的容忍界線。

城中分局坦承萬國戲院邊服飾業者拉客的情形嚴重，色情黃牛則是無一家色情業沒有，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西門鬧區每月約減少兩萬人次的行人和休閒者，業者則感到生意大不如前。³⁵

為紓解交通的鐵路地下化工程，剎時將西門町帶入了交通黑暗期。1984年後成型的「東區」，對都市中產階級的吸引力逐漸升高。一推一拉下，新興白領放棄西區而轉向東區，東區與白領中產的意象相互強化，逐漸成為高級消費中心的象徵。

(2)「東區」：新的政治經濟追逐的象徵的新中心

1970年代末期民間資本率先往東區發展，忠孝東路一帶線性商業區也逐漸發展，直到1984年太平洋SOGO百貨開幕。忠孝東路四段一帶的線性商業區「東區」終告成型（夏鑄九，1987）。西門町百貨公司過於密集，電影人潮車潮水洩不通，夜晚的電影街交通是臺北市最頭痛的問題，副都心的開發勢在必行。然而東區開發後，超大街廓的設計，符合八零年代全球經濟再結構下都市中心所需要的金融大樓、航空公司、跨國公司分部，東區的空間結構已經是西區無法匹敵（鄧宗德，1991）。隨著經濟再結構出現的新興白領階級，符合其品味的消費也在東區形成，忠孝東路四段在1984年已經形成政治、經濟、社會再結構下，具有流動節點功能

件，而案發的地點，以獅子林大樓為中心，方圓不超過三百公尺，足見這個地區的治安情況確實已亮起紅燈，亟待加強整頓。（聯合報，1987/4/6）

³⁴ 聯合報，1987/4/6，〈西門鬧區·漸成都市黑街 色情充斥·亮起治安紅燈〉。粗體為本文強調

³⁵ 民生報，1987/4/1，〈重新規畫 把色情掃乾淨 讓西門鬧區復活再生〉。粗體為本文強調

意義的都市中心，也逐步成為臺北市最高層級的象徵消費中心（夏鑄九，1987；王鴻楷、陳坤宏，1996）。

根據夏鑄九的論點，「東區」的形成並非偶然，而是來自於台北市經濟、政治與社會三個面向的變遷。台北市在 1960 年代以後逐漸轉行為加工出口，隨後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政策，開放外資。來台已經卅餘年的國民黨政權，也需要一個完全由自己而非日本殖民遺緒所建設的都市中心。隨著經濟轉型，台北市服務業比例遽增，新興的白領中階層工作與消費的地點皆以東區為主。這三種結構條件促生了新的市中心。東區代表的是全球貨物流通的節點，意義下的中心，即便位於交通、幾何中心的西門町已經無法成為都市中心。

當東區形成白領階級的消費空間，原來的舊市中心西門町，人口便以台北縣居民與學生為主，並轉為普通消費（夏鑄九，1987；王鴻楷、陳坤宏，1996）。東區不只接收了西門町的人潮，其亦皚皚映照著處於黑暗交通以及色情黃牛當中的西門町，接受「沒落鬧區」的夕陽惆悵。

（3）西門町的意義轉變

「東區」對西門町的影響，西門町市中心的負面後果，一推一拉，造成西門町市中心的人跑掉、資本跑掉。西門町在面對七零年代末期交通擁擠問題，鐵路地下化工程更惡化交通環境的同時，也正在崛起的東區倍感壓力。面對西門町色情、交通、治安、髒亂的問題，東區的發展，給了另一個選項。

新的象徵很快形成，吸引了資本也吸引了追逐象徵的消費者。根據王鴻楷、陳坤宏（1996）對台北市六個商業區的研究，在九零年代初期，台北市象徵消費位階最高是在敦化南路的東區，西門町降為普通消費區。不但是外來縣市人口比例高，學生所佔人口 54% 也居冠。是一種「大人出走」的現象。

東區形成新的象徵與都市經驗（林秀姿，2002），不只是「第二個西門鬧區」。東區所擔負的市中心功能，並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發展的西門町可與之匹敵（鄧宗德，1991；曾旭正，1994）。西門町失去戰前以來現代化的象徵地位，百貨公司、學者影城分散西門町的人潮、家庭錄影帶的興起，西門町已經不是台北人假日休閒的唯一選擇。遲恆昌（2001：48-9）與潘瑾怡（2001：3-21-22）同時都指出，1982 年以後百貨公司東移，以及電影院事業的下滑，是西門町內部產業無以維持台北市中心消費區的關鍵。

因此，1980 年代，與台北市服務業相生的中產白領階級，也與東區共同聲成。被遠離的舊中心西門町，承受了許多負面的「再現」，於 1980 年代末期，西門町

的形象轉變為令人可憐、卻步的「都市黑街」：

西門地區，近年來被色情行業，汙染得從一個國際知名的遊樂區，**已逐漸「降格」為一個落後的色情區**，這種情形，非但令地區內的正當業者痛心，也讓所有的台北市民痛心。

（聯合報，1987/1/16，粗體為本文強調）

「西門町」曾是許多中年人回憶中的美好地名，也與許多人一生中的感情生活有著密切的關連，誰想讓它成為一條被人恐懼的「黑街」呢？

（聯合報，1987/4/6，粗體為本文強調）

相關報導整理如下：

報紙標題	報導時間
莫讓西門町·淪為風化區 色情黃牛拉客·民眾視為畏途	聯合報，1987/1/16
西門鬧區濃濃春意 取締私娼寥寥數人	聯合報，1987/3/6
黃牛充斥交通混亂 西門鬧區日薄西山	聯合報，1987/4/1
西門鬧區·漸成都市黑街 色情充斥·亮起治安紅燈	聯合報，1987/4/6
變色的西門町·處處「禁區」 檢察官遇黃牛·手上「掛彩」	聯合報，1987/6/30
西門町夕陽西下 車輛垃圾都少了 警察'逛街'觸目可見 攤販不再囂張 連電影街也冷清	聯合晚報，1991/2/13

本研究整理

根據《民生報》在 1988 年針對六百多名民眾的電話調查，有五成左右麼民眾認為西門町已經沒落，認為「西門町不如東區進步」（民生報，1988/1/20）。

因此，東區形成新中心，連帶影響西門町意義的改變。經濟上由低價商品填補，轉為普通消費區；人口、商業跟著跑掉，西門町失去象徵中心的地位，快速衰落。

但是西門町並沒有被棄如空城。前述電玩以及色情業聚集衍生的治安問題，加上東區的影響，不利於西門町做為中產階級中心。在 1980 年代社會結構轉變形成新的都市中心形成過程，邊緣化過程，西門町因為大人離去以及商業資本離去的縫隙，服飾、速食店、舞廳、冰宮、電動玩具店等接替發展的青少年零售娛樂業，成為西門町新興支配性地景，持續吸引青少年。

西門町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呈現張大春（1992）所謂「沒落鬧區」的狀態。³⁶既有 Fischer（1984）認為異質人口的集中以及形成都市次文化群體的「關鍵數量」，又處在國家控制以及資本創造性破壞的鬆懈之際。鬆動的西門町混和了並未隨著東區離去的群體與文化，以及新興的青少年消費娛樂文化。醞生各種青少年、老人、同志等都市邊緣群體的次文化與邊緣情慾。³⁷不同於東區的工商活動節奏，紅樓戲院、西門市場、麥當勞、電動玩具店、賓館…出現的是非正式的都市節奏（符耀湘，2003），西門町是都市邊緣也是這些邊緣群體的中心。

第二節 另一種中心的形成：沒落鬧區西門町

僅只是「衰亡」和「沒落」並不足以解釋西門町。如果你恰巧站在一家大型服飾店或大型速食店的門口，你感覺到人潮如流，光明而有前途。

（詹宏志，1989：129）

詹宏志這段話，顯現出西門町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從西門町既有的歷史來看，西門町的確是沒落了，其做為台北市消費中心以及象徵中心空間的地位受到東區高度挑戰，政治目光與經濟資本如今皆往東追逐。然而，西門町因使用族群的更迭在 1980 年代起越見明顯，與其說西門町沒落了，不如說西門町開始散發其都市邊緣空間的鮮明色彩。

前文論及中華商場於 1961 年落成，多元消費集中吸引眾多人口，加上前仆後繼的城鄉移民，使得西門町眾生喧嘩。根據 Fischer（1984）的次文化理論，都市的交通與人口數量、異質性使得次文化群體的滋長得以可能。西門町吸引了各種社會群體，也是各種次文化生成展現的空間。儘管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處於戒嚴的高壓統治，當時仍有著一些休閒娛樂，主要是看電影與逛百貨公司，除此之外，在彼時熱鬧的西門町，也出現過一些次文化的痕跡，這些次文化痕跡有助於我們更深刻的瞭解，西門町曾有著哪些騷動，而他們在 1980 年代的轉型過程中，一些成為新文化的根源，一些則銷聲匿跡。

一、妖—青少年與同性戀

台北市警局把取締不良份子，掃蕩不良幫派的勤務，稱為「伏妖」專案，在

³⁶ 出自張大春，1992，〈囚城交通黑暗期—「青少年哪吒」裡的西門町〉。刊載於 1992/11/11《聯合報》副刊。

³⁷ 參考：蔡明亮，1998，《河流》。

前天一個晚上，總計有六百四十九人被「伏」。...

上個月中旬，市警局和隸屬各分局，曾經雷厲風行的掃蕩了一陣**被頭型和奇裝異服的青少年**，那一陣子，台北市的街頭上確實是清靜了許多。可是，掃蕩之風次過以後，這幾天又可在繁華的鬧區零星的看見**妖形人物**出現了。因此，警方再度執行「伏妖」專案，非把各種妖物「伏」盡為止不可。

(聯合報，1970/7/2，粗體為本文強調)

都市街道提供給女人空間與自由(Wilson, 1991)，也是次文化可以形成社群的條件(Fischer, 1984)。西門町彼時匯聚了台北市各式各樣的族群，晚間的電影街人潮雜沓，交通壅塞到必須實施晚間交通管制計畫。在人潮中，一個戒嚴時期的主流社會文化中，也可見到次文化的小小潮流。在那個服裝儀容都管制的時代，對西門町的鮮明印象是「留長髮的年輕人在街上被少年隊追趕」(G, 訪談稿 2009/12/16)。從當時的報紙來看，1970年代台北市出現過好幾次警方大力掃蕩「奇裝異服」的行動。

1970年警方甚至展開「伏妖」專案，所謂「妖形人物」事實上混雜了不良少年、奇裝異服人士、蓄長髮人士等等不同的分類。當時，警方連續大規模在鬧區取締蓄長髮、穿著短裙、女性不著內衣或是男扮女裝裝扮，其對服裝打扮的管控，視同不良幫派，兩者被「一視同仁」地進行取締。然而，這些「妖形人物」究竟是誰？趙彥寧(2001)曾論及戒嚴時期的同志處境，在動員戡亂時期，奇裝異服是被警方監控甚至取締的對象，管制「奇裝異服」的也籠統地合法化對同性戀的取締與騷擾。這些在外表上奇裝異服招搖過市的年輕人，精神上則是跟隨西方嬉皮與存在主義風潮，同時也包含了西方的同性戀的次文化。³⁸

對奇裝異服或蓄長髮的青少年取締行動，從1969年九月開始，一直到1972年都還有類似行動。理由是視為對社會秩序與風俗的擾亂。這樣「奇裝異服」的青少年在西門町集體現身，意味著對對社會秩序的鬆動，儘管沒有什麼實際的犯罪行為，但是被視為潛在有問題的而受到警方取締。著奇裝異服而「招搖過市」³⁹被視為挑釁秩序，警方對此常常大規模取締，百人以上的並不少見，甚至有四百人、六百人的事件，情節嚴重者還處以違警拘留，例如1969年第一例取締行動的報導：

台北市警龍山分局連日來，在西門鬧區共勸導及取締了青少年蓄長髮，著奇

³⁸ 警方的掃蕩行動很少提及「嬉皮」，但是由報紙社論跟後來的文章可以推得。參見：1970-01-01/聯合報/03版/〈黑白集〉；郭冠英，中國時報 1992/10/31，〈消失的起跑線〉；李尚仁，1986-03-29/聯合報/08版/〈要不要調整航向？我看目前的青少年次文化〉；翁臺生，1976，〈野人帶來的問題〉，收於《西門町的故事》。

³⁹ 聯合報，1970/6/7，〈莫辨雌雄.代為整容 長髮青年.修理門面〉。

裝異服的少年男女，總數約在百人以上，其中情節嚴重的並被警方處以違警拘留。

（聯合報，1969/9/22）⁴⁰

嬉皮在西門町的現身，是以奇裝異服、蓄長髮受到警方取締來現身，與嬉皮相關的談論存在主義，甚少著墨，受到大幅報導驚動社會的是其中一項文化元素，吸食迷幻藥。西門町的「野人咖啡屋」開設於1967年，是1960年代末期重要的青少年次文化空間。然而1969年野人咖啡室因為爆發集體吸食迷幻藥而轟動社會。⁴¹在林懷民（1969）的小說《蟬》記述著1960年代末期，嬉皮、同性戀如何發生在無光十色煙霧瀰漫的西門町。因此1950年代在公園週邊的公廁，中華商場忠棟、台北車站，新南陽戲院都有男同志的身影。但是在白色恐怖時期，連奇裝異服、「人妖」都被視同匪諜，同志的活動身影對圈外世界來說是不被看見的。

在以前那個年代，社會大眾從來不知道有男同性戀在新公園的事，那時候三人成行就成聚會團體，沒有名目就抓起來了。白色恐怖時代就是這個樣子的，要說有什麼「活動」在新公園中進行，那真是膽子太大了。那時候對這種同性戀行為有幾個字可以形容：就是變態，而且是不可救的。

（張力口述，引自賴正哲，1998：56）

在西門町鬧區表面的「妖」，底下包含著這些次文化的內涵。也顯露出西門町在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的娛樂區，底下卻暗潮洶湧。

西門町南側的萬華地區，在戰前即是特種行業集中的地區「艋舺遊廓地」，艋舺遊廓裡便有男妓。⁴²戰後新公園成為台北市男同性戀的重要據點，賴正哲（1998）認為跟國軍帶來大量男性，從總統府前廣場的籃球場，一路到新公園。既有研究最早是五零年代外省軍人重塑新公園地景。因為新公園鄰近臺北火車站以及西門町鬧區，還有總統府前的籃球場，成為軍人以及學生方便邂逅的場所，這可能是新公園成為男同志聚集會面的開始原因。⁴³當時台北車站是最重要的交通樞紐，西門町是唯一個鬧區。因此台北車站、新公園、西門町便是男同志活動的路線範圍。

⁴⁰其他取締行動報導：《聯合報》1970-01-01；1970-01-19；1970-06-07；1970-06-08；1971-07-04；1971/8/28；1972/2/6；1972/2/28。

⁴¹參見：聯合報，1970/3/26，〈野人的洞窟?邪惡的去處!〉；聯合報，1970/3/27，〈披髮左衽形同野人 浪蕩男女伊於胡底 警方掃蕩一群不肖青年 邪惡洞窟宣告關門大吉〉以及翁臺生，1976，〈野人帶來的問題〉，收於《西門町的故事》。

⁴²柯瑞明推測是來自於日本浪人的文化。見柯瑞明，1991，《臺灣風月》。1960年左右三水街開始出現男妓，尋芳客有本省人、外省人，也有外國人。其中以外省人居多，主要是隨國民黨來台的軍人與公務員，後來也擴張到西門町。除了三水街做為性交易空間以外，「新公園」是戰後迄今最重要的同志公共空間。

⁴³另可見吳瑞元，1998，《孽子的印記—臺灣近代男性「同性戀」的浮現》，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吳瑞元認為日本移民來台以及戰後國民黨軍隊來台的單一性別移民，跟男性同性戀的發展重要的歷史條件。新公園、三水街的男性同性戀中，外省軍人佔了很大的比例。

1960 年代初期，從新公園延伸到南陽街的「新南陽戲院」，與樓下的「滿庭芳」酒吧、鄰近的「馬德里」咖啡廳，有不少男同志光臨，發展出最早的同志酒吧（賴正哲，1998）。新南陽結束營業後，又移師西門町紅樓戲院。在西門町已經邊緣化的紅樓戲院，便接替「新南陽戲院」，成為 1975 年以後男同志情慾空間。

隨著中心的轉移，也隨著社會開放，這些次文化才顯露出來。這些次文化現象的發生，對當時的政權來說，是一種無傷大雅的失序。西門町是主流社會的中心，到西門町看電影逛百貨公司是主流的休閒娛樂。

二、青少年的天下：青少年化及其內涵

如上一節所述，西門町在 1970 年代已經滿載中心商業區的秩序問題。1980 年初期國家計畫東移，西區也由鐵路地下化工程展開更新。西門町進入變化期。在東區新發展初期，西門町開始鬆動。出現人口的變化。興起的東區並沒有像西門町提供閒晃、遊蕩、社交的空間，電影院提供給青少年社交功能家庭錄影帶無法取代，公共運輸優勢以及針對年輕人消費的小商店聚集持續吸引青少年。東區的高級跟價位，對青少年並沒有吸引力，習慣在西門町聽歌的老年族群跟青少年還有鄰近居民就變成西門町主要人口。因此西門町在面臨交通、色情的同時，青少年文化也漸漸佔領西門町。

1980 年代青少年的消費文化—主要展現為日本商品雜貨的購買以及原宿龐克的形式—成為「沒落鬧區」的矚目地景。青少年佔領了西門町，也成為 1990 年代中期西門町再發展的歷史條件跟意象打造的素材。青少年以「不良少年」做為一個挑戰既有秩序，要受到管控規訓的範疇出現。到了 1980 年代青少年變成「市場」作為西門町受到東區影響的新出路。諸種對西門町青少年的再現，形成青少年跟西門町的緊密關係，至 1990 年代中期出現把西門町街頭還給青少年的說法（見第三章）。

西門町的「青少年化」作為新興消費力支撐西門町的經濟，「台北原宿」成為 1980 年代西門町一張新的臉。然而，青少年化所代表的低消費力、秩序問題，同時跟西門町的「沒落」也辯證地互相生產著。

（1）青少年的遊樂場：犯罪、失序構成的西門町

1980 年六月初，西門町發生規模龐大的青少年械鬥事件，七、八百名中國海專與開南商工的學生在西門町互相尋仇，大批憲警到西門町各路口實施戒嚴。⁴⁴

⁴⁴ 聯合報，1980/6/1，〈數百學生聚集西門 攜帶兇器準備械鬥 警方及時防範一人被殺受傷二十二

電動玩具店的集中，青少年本來也是西門町的族群之一，看電影或交友閒逛空間。因為電玩的聚集，吸引更多大小學生。圍繞著青少年的休閒娛樂產業也更加蓬勃。西門町宛如青少年的遊樂場。賭博性電玩的流行，吸引小孩、青少年蹺課、蹺家流連。西門町更是電玩大本營，也引發許多因為沈迷電玩的青少年財務犯罪。⁴⁵

台灣地區的警察單位，最近調查電動玩具遊藝場所，發現許多青少年經常流連其間，其中有逃家的、逃學的、更嚴重的是一些不良份子混跡其間。...這些場所現在已大多數變成了問題青少年的聚會處所。

在台北，電動玩具場大部份在城中、龍山、中山等地區，尤其是電影院集中的西門鬧區更多，在這些電動玩具場內，從中午開始到深夜，都有男女青少年流連其間。

(聯合報，1974/6/9)

西門町環境惡化，可是電動玩具店深深吸引青少年。人口組成的變化，西門町形成青少年娛樂產業集中的地方。獅子林大樓開幕後，一年後很多電動玩具店。電影、電玩、冰宮是青少年主要的休閒娛樂。一直延續到 1990 年代。連色情業也都針對年輕人⁴⁶。1987 年電玩解禁後，原本已趨沒落的西門町，又因電動遊樂場的不斷增加，而又再度熱鬧起來。短時間內西門町再度成爲「遊樂場的大本營」⁴⁷。

話說當年西門風光，真是多采多姿。但最近幾年來，特色消褪，已淪為年輕一輩游蕩混混的所在，使有潛力的顧客望而卻步...

(聯合報，1985/10/27)

(2) 青少年消費地景與「原宿」的疊合

英國人類學家 Dick Hebdige (2003) 研究英國青少年龐克次文化的起源，來自於工人階級的白人青少年，對未來的不確定跟對現狀的不滿，受到黑人雷鬼音樂的啓發，所發展出不論在音樂或是服裝的形式上，充滿的是反叛的符號，例如破褲子、補釘，或別針。這個次文化引起廣大的迴響後，終究被商業資本收編，變成一種流行商品與符號。1970、80 年代日本的龐克，便是接收英國所傳遞過來的

人被捕、告誡之後放回)；管仁健，〈決戰中華路〉，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310531182>。

⁴⁵ 聯合報，1972/2/1，〈青少年無處「消遣」遊樂場「生意」興隆〉；聯合報，1972/3/25，〈吃角子老虎不准進口 七家遊藝場所 違規裁定處分〉；聯合報，1972/9/27，〈少年警察隊長王化義談防止少年犯罪〉。

⁴⁶ 聯合報，1986/12/8，〈色情違規行業·氾濫西門鬧區 選舉期間變本加厲淘金 誘拐少女賣笑·警方豈能坐視〉

⁴⁷ 經濟日報，1988/9/6，〈電動玩具撐場面 西門町再展歡顏〉

形式化了的龐克，東京原宿的「竹子族」發展在八零年代初期，貼縫上去的衣服補釘、集體在街頭跳舞，集體的奇異裝扮，蔚為原宿著名的次文化地景，隨後也傳到臺灣。

一九八三年，我回到離開一陣子的台灣。有一天我走在西門町的街上，「看到」某家商店有一面牆掛滿「一類新東西」，那是：皮衣、帶尖刺的皮腕套、鐵鍊皮帶、納粹標誌的布章……。「我的天，那是龐克們用的東西！」我心底暗喊著。……不久，我就和台灣的龐克族少年們邂逅了，他們就群坐在西門町一家麥當勞門口，身旁倚著奇特造型的機車，年輕的臉上露出疲憊的神情，沉默地承受路人投射的驚訝與嫌惡的眼光。

後來發生的事，我不必告訴你，你已經很熟悉。後來，龐克模樣就成為我們社會可見的一部分面貌，電視上也看得到他們的蹤跡，然後就不稀奇了。
(詹宏志，1989：35-6)

1980年代的「原宿文化」跨海而來，形成青少年哈日消費的先端，改變了本地的青少年，也改變了西門町的地景。從日本傳到臺灣的龐克文化，以更加原封不動的日本商品來表達（詹宏志，1989）。顯著地影響台北的青少年消費文化。這一波流行文化與青少年消費，具體生產出日本流行商品、服飾的消費地景。這樣的商品出現、聚集在西門町。⁴⁸透過消費與商品表現。也透過青少年身體在街道上遊走流連。

跟 1960 年代末期的嬉皮相較，嬉皮規模較小，被認為是西門町當中擾亂秩序的少數異類，存在於電影街、百貨公司的臺北市人潮中。到了 1980 年代的龐克，主要來自於對日本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模仿，也透過商店的出現取得商品來模仿：⁴⁹

到了民國七十二年，西門町的萬年商業大樓以及小香港，開始「偷渡」一些日本青少年服飾，因而青少年紛紛換下小喇叭褲，穿上九分的緊身褲，上身則搭配印有日文或日本武士的 T 恤，同時為了大展「腳底功夫」，矮子樂也換成了各色日本布鞋，或者名牌球鞋，才能伸展跳躍自如。

(民生報，1988/6/26)

在這段期間，相較於東區欲躋身全球城市的「國際化」的地景（王志弘，2003），西門町的歌舞廳、電影院、餐廳、百貨公司顯得老舊過時。但是 1980 年代一波青少年消費，卻於資本與國家東進期間，在西門町萌發茁壯。青少年人口的集中，

⁴⁸ 李尚仁，1986，〈要不要調整航向？我看目前的青少年次文化〉，刊載於聯合報，1986/3/29。

⁴⁹ 嬉皮的流行彼時的學生流行到中華商場改制服，不若 1980 年代的青少年次文化出現專賣店。

形成以電影、電動玩具等青少年次文化娛樂產業為核心以及相關的飲食業、服飾零售業發展，百貨公司紛紛改變型態以迎合青少年族群，形成東西兩極的消費市場。⁵⁰從以下這篇報導可以看出西門町消費地景的替換：⁵¹

以今年一至七月台北市十七家大百貨公司的業績比較來看，前三名都不在西門內，在西門的七家百貨公司，除了今日為第四名外，其它均在七名之外，其中有四家甚至落後到十名外。

位於西門中心的來來百貨公司在六年前開幕，當初所訂的目標是希望能夠經營一個高格調的消費中心，但最近讓該公司卻發現成交率一再下降，目前還不到兩成，逛的人多買的人少，該公司的高格調商品，已經無法符合西門的青少年需求。

「來來」的襄理張維中分析，由於東區已拉走了一些高消費能力的成年顧客，西門區的商店只能盡量配合青少年階層。因此該公司打算從十二月開始，花半年時間把內部商品大調整，裝潢也將全部更改，目標是十八歲至卅歲年輕人消費的「輕便型百貨商店」。

在西門內的其他消費場所如商店、餐廳也都是如此。大部分商店都改成販賣青少年流行服飾的商店，高級餐廳也紛紛改為速簡餐飲，或其他低消費的飲食。如漢堡、炸雞、快餐等。

武昌街靠近中華路的一段路上，本來是台北市一個頗有名的「西裝街」，但最近一些西裝店都改成賣青少年服飾的商店。目前青少年相當流行的日本軍國主義標語貼紙及胸章等，大部份都是從這裡外流的。

中國戲院旁的一條原本專賣舶來品的巷子，現在也沒剩幾家，取而代之的仍是少男、少女服飾。

原宿的龐克商品以「跑單幫」、「水貨」的方式在西門町的萬年大樓、巷弄販售，除了萬年大樓形成「日貨大本營」模仿日本的新奇商店。⁵²，另一家同樣對準青少年喜好的「西門新宿」也於1986年開幕。⁵³西門町青少年消費地景的逐漸建立，支撐了西門町1980年代的經濟，也填補西門町失去中心地位後的空間文化。

⁵⁰ 聯合報，1986/1/5，〈消費新走勢 東西區 兩極化〉。

⁵¹ 中國時報，1984/11/19，〈市區消費中心 大幅轉移 西門好景不再 東區抬頭 青少年群集西區 購買力有限 是沒落主因〉。

⁵² 聯合報，1985/11/16，〈人動腦筋賺青少年的錢〉。

⁵³ 經濟日報，1986/10/20，〈西門町「美人遲暮」加緊「洋化」以挽回青少年的心〉。

青少年的消費市場以及在街頭的展現流連，這一波次文化，藉著商品機制擴大流行，席捲西門町巷弄、大人離去的百貨公司，把西門町給「原宿化」。生產一個彷彿原宿的地景：⁵⁴

在台北市西門鬧區，處處可見「原宿式」打扮的青少年。

（聯合報，1985/4/20）

晚近五年間，由於東西商圈消費結構的變遷，**西門町猶如日本的原宿**，是年輕人的快樂園地，永遠為年輕人所喜愛，這一個時代最尖端、最熱鬧、最前衛的流行精神集中在此。

（經濟日報，1985/9/29，粗體為本文強調）

對「原宿」的投射與想像，在 1985 年台北市政府為活化西門町所舉辦的「徒步區示範活動」中達到高峰。為了吸引原本離去的台北市民回來西門町特別設計多樣性的街頭表演活動，在獅子林、來來百貨中間設計了壁畫、鋪面作畫、默劇、民俗技藝跟青少年霹靂舞、搖滾樂等表演。試圖，讓「青少年佔據的西門町，或許可以成為各種年齡階層的休閒場所。」⁵⁵。但是活動期間最受歡迎的，卻是近百人的霹靂舞表演，

市政府工務局都市計畫處原先計畫以民俗和屬於青少年活動吸引各年齡階層的市民，但是，昨天出現在行人徒步街的，**幾乎全是青少年**，有的人的打扮就如歐美、日本的青少年，也因而產生許多不尋常的活動。

市政府邀請的霹靂舞團在重重人牆包圍下，幾乎沒有表演空間，完全破壞他們的表演計畫，後來，他們只好十幾個人拉手圍成圓圈，擋住洶湧的人潮。

五、六個霹靂舞團得知昨天的盛會，也都紛紛自備音響，未經市政府允許，鋪上地布就跳起舞。只要那裡出現舞者，必定有大量觀眾。霹靂舞受歡迎的程度，也由此可見。

（民生報，1985/6/9，粗體為本文強調）

日本 NHK 電視台的採訪，使得西門町的原宿文化的風潮更加盛行。⁵⁶多達百人的青少年現身也在這一次活動，躍上全國的舞台與視野中。

於是，一場試圖扭轉西門町充滿青少年意象的示範活動，卻成了確立西門町的青少年意象。西門町變成了「台北的原宿」，青少年成了西門町的主角。不過，相對於青少年的鮮明身份，事實上還有著其他的身影，同樣隱身新鬧區之中。

⁵⁴ 李明聰（2010）將西門町 1990 年代以來的形成的消費地景稱為基於跨文化想像而實踐的「擬東京」地景。然而西門町青少年對「日本」的想像與消費，最早在 1980 年代便已給予西門町街頭充滿原宿風味的深刻印象。只是當時青少年如何想像原宿？需要進一步研究。

⁵⁵ 民生報，1985/6/6，〈台北市政府 給市民「空間」禮物 街頭表演為行人徒步區接生〉。

⁵⁶ 參見：聯合報，1992/12/22，〈《黑潮一家，名字叫新潮》新宿族 暴走西門町〉

三、1980 年代同志身影

「我能怎麼辦呢？」楊榮華說：「從前我們放電影，同性戀者就大量聚集，有時候鬧得太不像話，我就開始抓，不是一個一個抓，是『一票一票』的抓，其中從國大代表到升斗小民都有。」

（聯合晚報，1991/5/1）

相較於青少年在八零年代，佔領西門町集體可見的鮮明身影，引起社會的關注與反應，國家重視與控制，另一個重要的族群在西門町的身影在主流呈現上隱晦、繪聲繪影的描繪著。隨著西門町發展的核心北移，戰後西門市場便開始走下坡。1980 年代紅樓戲院沒落，新式電影院開設後，紅樓戲院就變成二輪戲院，也開始變成男同志的據點。⁵⁷被主流視為邊緣的，開始成為同志的中心。

從男同志的歷史來看，紅樓戲院是在新南陽戲院關閉後轉移過去。台北車站、新公園、中華商場一直都是男同志主要活動的空間。1960 年代第一家男同志酒吧「香檳」開設後，gay bar 擔負起讓在公共空間現身不安全以及遭受敵意的男同志一個安全的空間。⁵⁸但即便同志酒吧興起，gay bar 的消費還沒有非常普遍的時候，新公園跟紅樓戲院還是最主要的空間。有使用者如此描述，「貴倒不是貴，那時候一般人的經濟水平都比較窮。所以一般人不能去 bar 就去新公園啦、紅樓啦。（引自吳佳原，1998：39）」因此「一個戲院、一個公園」依舊是 1970 年代最普及的男同志空間（ibid.: 39）。但是新公園的地位，在同志酒吧興起以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做為認識同伴，前往酒吧之前的聚會、社交地點。兩者並不互斥。在這些新興的同志消費空間，新公園、紅樓、依然扮演低價或免費的公共空間。酒吧、公園與三溫暖有不同的活動模式，也有不同的族群。

1980 年代經濟起飛，卡拉 OK、迪斯科，普遍化，加上後期解嚴，西門町內，除了同志酒吧還有興起三溫暖。三溫暖興起以後，新公園、三溫暖、gay bar，成為台北市男同志三大空間，戲稱為「火炬三部曲」（賴正哲，1998：73）。

沒有聲音的主體

⁵⁷ 那時候我記得一二十個有啦。…應該是從民國六十五年的時候開始有，（我：那時候還是市場？）還是傳統市場阿，那時候還是演二輪的。（H，訪談稿 2009/05/18）

⁵⁸ 1960 年 TAKE 在國賓飯店附近開了第一家男同志酒吧「香檳」，就是以美軍酒吧為雛型，也是臺北市開始出現男同志的消費空間（吳佳原，1998）。隨著男同志集體的浮現，男同志形象被圈外媒體勾勒出來，主要以變態行徑暴力刑案的報導角度，描繪男同志的面貌。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是 TAKE 接受採訪時表示開設 gay bar 的原因（吳佳原，頁 37）。

1980年代，同性戀作為無主體的主體被塑造出來，謝佩娟（1998）稱之為同性情慾被「公共化」。其內涵乃是與愛滋病連結的污名，來自醫學與社會控制的污名，以及許多繪聲繪影的都會傳說（吳瑞元，1997）。加上警方屢屢取締所爆發的新聞事件，不斷定義「同性戀」為對照異性戀主流社會的他者。

1980年代初期，臺灣尚未解嚴，警方「掃蕩」同性戀。因為1970年代以來同性戀與刑案的連結，污名，遏止違背善良風俗的命案發生（吳佳原，1998：45）。媒體對臺北市同志空間的報導，透過警方的掃蕩，「新公園」與「紅樓戲院」開始被主流媒體指認為臺北市同性戀的活動空間，例如1980年聯合報對警方「掃蕩」同性戀的報導：

台北市警察局城中分局從四月一日迄今，在轄區新公園中已經查獲了六十多名同性戀者，警方對已有同性戀行為的妨害風俗違警人，分別裁決三至七天的拘留。……警方初步調查：目前除了新公園外，青年公園、紅樓戲院附近、餐廳、江山樓一帶及龍山、雙園地區等，也都有同性戀的男娼拉客。

（聯合報，1980/4/23，粗體為本文強調）

紅樓戲院也屢屢遭受警方臨檢，或是發生騷擾、報案事件，同志在紅樓戲院的聚集跟行為，同性戀者在1980年代初期，列為警方「掃蕩」對象，新公園、中山北路的同志酒吧都是警方稽查空間，紅樓戲院在媒體上被再現為同志據點，並且以男同性戀者騷擾紅樓戲院客人，例如對觀眾「上下其手」或是佔便宜，

台北市警萬華分局是在最近接獲民眾報案，指紅樓戲院內，經常有男同性戀人在戲院內作出猥褻動作，有些同性戀人還會騷擾到一般觀眾，因此連續進行臨檢。

「紅樓戲院有同性戀者出沒已經不是新聞」⁵⁹

被報導成是「是紅樓戲院內一群同性戀者的「遊戲」」⁶⁰、「...以前面所提到紅樓戲院「玻璃圈」的事，更不知有多少觀眾在那裡受到莫名的騷擾，那些同性戀者甚至在戲院隱然形成一股「勢力」。」⁶¹。紅樓戲院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尚有警方受民眾檢舉，臨檢逮公然猥褻的男同性戀者的事件。⁶²

1991年臺北市政府提出中華路與萬華車站地區的再發展計畫，中華商場拆除

⁵⁹ 聯合報，1981/6/10，〈同性戀者出入紅樓戲院 男學生抽人一根煙 渾身無力被佔便宜〉。

⁶⁰ 聯合報，1981/4/14，〈娛樂場所問題不少 清新運動確有必要必須多方面共同配合才能收效〉；聯合報 1981/6/10，〈同性戀者出入紅樓戲院 男學生抽人一根煙 渾身無力被佔便宜〉。

⁶¹ 聯合報 1981/4/14，〈娛樂場所問題不少 清新運動確有必要 必須多方面共同配合才能收效〉。

⁶² 聯合晚報，1993/5/30，〈「紅樓」情事再曝光 查獲四男〉。

後，西門市場與紅樓戲院也列為有待改建整合的地區，紅樓戲院出現存廢之爭。⁶³當時已經是播放三級片的老戲院，紅樓戲院「同性戀聚集地」的歷史也在媒體上被揭露探索：

紅樓興建於民國前三年，至今已八十五歲的老戲院了，外觀顯得蒼老，雖然位處西門鬧區，但斑駁的外表，加上周圍環境的雜亂，影片的特殊選擇尺度，及繪聲繪影的同性戀傳聞，都讓不曾去過的民眾，感到好奇與神秘。...曾幾何時，紅樓卻成了專映限制級電影的戲院，加上不時有同性戀者在此出入的傳聞，更讓紅樓蒙上了詭異的面紗，讓人看不透台上是戲，還是台下是戲，或許這也正是紅樓「迷人」的地方。紅樓，走過興盛，也嘗到失落，紅樓本身就是一齣精彩的戲。

(聯合報，1993/7/26)

2002年紅樓修復完畢，以「紅樓劇場」開張，一名男同志重新走進新開張的紅樓劇場以後寫道：

揉著眼睛，我再次走進了紅樓。

零二年七月底的重新開幕，大概也沒多少人關心。回到台灣，也一直沒留意到這棟充滿回憶的建築，老瓶中裝了什麼新酒。巧合，今晚走過西門町，一向黑暗的角落發著光，是的，紅樓重新開張。

心中的激動無法形容，我一步步的走向紅樓，十數年前的回憶一一湧上，這棟三級古蹟，有著自己無數的第一次，這個打開我同志世界的場所，今天重新裝潢，煥然一新。

帶位的是一位年輕貌美的小姐，不是熟悉的售票歐巴桑；鼻所聞的味是一般咖啡廳的味道，不是男子的下體分泌物；眼所見的是光亮的裝潢，不是黑暗的角落；耳所聽到的是近期西洋歌曲，不是八零年代的國語流行歌曲；前來說話的是要求填寫問卷的服務生，不是前來搭訕的孤寂男子，紅樓，一切都不一樣了。⁶⁴

作者細數紅樓內部咖啡廳桌上墊著的紅樓大事記，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紅樓戲院做為「同志聖地」的年代，官方的大事記上卻只留下空白，聲稱紅樓當時遭人遺忘，閒置。

⁶³ 參見：1991/1/14/聯合報/14版〈專家學者及文化界人士談塑造新魅力 西門電影特區 萬華歷史街區凸顯西區文化風貌兩個好主意〉、1991/4/16/聯合晚報/10版〈紅樓戲院滾滾紅塵 前途未卜 更新會建議作電影館 財局則恐影響西門活力〉。

⁶⁴ 作者 hm，2002，〈又到紅樓〉，刊載於《同位素電子報》，2002/9/14。

九十多年前的歷史，想必考據而來應是沒有問題，但一九七零年代，在西門町逐漸沒落的年代中，紅樓只是被主流社會逐漸遺忘。民國七十年左右，紅樓可說是全台灣的同志重心，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新公園與紅樓，是台北或說是全台灣的同志聖地，多少同志在其中尋求慰藉，民國八十年左右，紅樓才開始逐漸沒落，成為老年同志時常出沒之所，一九九八紅樓封樓，當時政治人物曾提到規劃的同志咖啡廳也未再聽及，直到今時，紅樓改裝，成了我不認識的模樣，而這段紅樓的同志歷史，也如同紅樓的味道一樣，一·筆·勾·消。

第三節 再發展的前奏：拯救西門町

一、成長聯盟

拯救西門町!台北西門商業中心更新促進會，在三位企業家——侯政廷、張國安及徐之豐的推動下，於二月十三日誕生了。以往有如鑽石般繁華奪目的西門町，如今已是交通紊亂、攤販集中、色情行業氾濫的老市區。如何能讓西門町再恢復過去的面貌，就是民間成立更新促進會的目的所在。

(經濟日報，1988/3/10)

「拯救西門町」的呼聲，來自於失去中心地位的認同危機與行動。西門町的「危機」，促成民間社會形成的地方組織。1988年二月，由三位企業家發起組成「台北西門商業中心更新促進會」，以民間促進辦理都市更新為宗旨，加快催促公部門對西門町更新的投入。他們認為隨著中華路鐵路地下化工程，也要對西門町的硬體加速更新，以及針對西門町的大片土地進行再開發。

更新促進會並非一般的社區組織。1988年成立之初的成員，以全國性企業董事長、房地產商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組成。節錄部份成員名錄如下：⁶⁵

主任委員	侯政廷（豪景大酒店董事長）
副主任委員	張國安（豐群來來百貨董事長）、徐之豐（今日公司總經理）

⁶⁵ 全部名冊請參見台北市西門商業中心更新促進會，1990，《台北市西門商業中心更新促進會會務報導》。西門促進會的政治實力不可小覷，當時台北市長吳伯雄率領二十多位市府主管出席會員大會（參考《會務報導》頁48）。

常委	黃崇西（龍山寺董事長）、黃慶雲（天后宮主任委員）、王又曾（中國力霸董事長）、徐旭東（遠東百貨董事長）、楊塘海（信大水泥董事長）、李進枝（資生堂董事長）、黃龍浩（力福建設總經理）、黃書瑋（立法委員）、林宏熙（議員）…
----	---

資料來源：《台北市西門商業中心更新促進會會務報導》

其中發起人暨主委侯政廷，是從事鋼鐵、拆船業的企業家，甫投入三億元改裝淡水河岸的飯店。顯示促進西門町環境的整頓的主要推手，乃是新進投資的企業資本。⁶⁶

二、拯救什麼樣的西門町？

更新促進會面對需要拯救的西門町，「以成為第二個日本『新宿』為目標」（經濟日報，1988/6/14），如何詮釋西門町的問題？更新促進會主委侯政廷指出：

這兩年來由於西門町環境的急速惡化，使此處商家的生意卻一落千丈，只有過去的二、三成，鐵路地下化工程和中興橋中斷，使得西門町的交通幾陷癱瘓，再加上色情黃牛的入侵，現在除了一些看電影的青少年回來，西門町已不再具有往日的魅力。

（經濟日報，1988/2/14）

交通問題跟色情黃牛是西門町兩個視為環境惡化的指標。但是經歷 1980 年代的青少年化，對於想要恢復西門町榮景的商家組織，青少年或許是「消費新星」，支撐了西門町下滑的經濟，卻也不構成之後再發展的基礎。對於把西門町規劃為青少年特區的想法，都有商家因為青少年消費力低落表態反對⁶⁷。

晚近五年間，由於東西商圈消費結構的變遷，西門町猶如日本的原宿，是年輕人的快樂園地，永遠為年輕人所喜愛，這一個時代最尖端、最熱鬧、最前衛的流行精神集中在此。

西門町充滿了沒錢有閒壓馬路的台灣 E·T 消費群，其平均年齡層從民國六十八、九年次的十八歲到二十二歲降低到民國七十三年次的十三、四歲到二十三、四歲的消費年齡，真正擁有經濟基礎，有消費潛力的消費者已不涉足西門町，經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西門町的消費單價平均八十七點五元，只及

⁶⁶ 經濟日報，1988/7/20，〈侯政廷來軟的 豪景大酒店 生活新去處〉。

⁶⁷ 聯合報，1987/4/1，〈黃牛充斥交通混亂 西門鬧區日薄西山 民間建議規劃為休閒區〉

東門町(頂好商圈)一百七十元消費單價的一半而已。

(經濟日報，1985/9/29)

經濟日報這篇報導道出了西門町發展的矛盾。一方面「原宿化」的西門町對青少年有莫大的吸引力，但是消費能力較低的青少年，讓西門町難以再吸引較高消費能力的族群。

西門町聚集青少年，也產生全台北市最高的青少年犯罪率。1981年救國團曾經在西門町（今漢中街星巴克）設立「蓮苑」提供青少年活動場所；少年輔導委員會也針對西門町青少年進行多項活動。例如1987年與1988年分別連同西門町來來百貨、麥當勞等企業商家舉辦將西門町導向「健康遊樂區」，使「西門鬧區文化」引導至正向⁶⁸。少輔會指出：

事實上，除了假日週末，西門鬧區平日亦聚集著不少青少年，並形成特殊的次文化活動型態。且根據統計，台北市去年一千多件少年偏差行為，西門地區即佔百分之七十，顯示西門鬧區除了商業文化外，更有必要注入新的文化，引導青少年正當休閒。

(民生報，1987/1/10)

1980年代是青少年「佔領」了西門町的時代，所謂「佔領」具有兩種意涵。首先，西門町受到東區影響經濟市場轉型，青少年消費力適時的填補支撐西門町的經濟，因此西門町的變化其中一個面向是青少年消費受到正面的再現，西門町經濟的新希望。另一個面向則是青少年聚集生產「社會空間」所造成對失序的焦慮，這個面向首先經過徒步區事件，引來對青少年商品化、模仿的批評，延伸引發國家對於青少年空間的政策討論。

這是西門町在東區發展而動搖之際，市場的轉型以及聚集青少年的次文化展現，這些因素共同匯聚在一個時空，產生了西門町跟日本原宿的連結想像。1980年代這樣一個巨變，改變了西門町的形象。西門町從戰後的市中心冷戰結構中第三世界的國際商圈，在成人退守後，成為青少年的天下。本來只以學生或是不良少年現身的青少年群體，以一個新的跨國文化消費的形象，出現在經濟危機的西門町街道。一方面彷彿是西門町的救世主，一方面又是西門町衰落的替罪羊。

三、原宿的想像

在1970年代中心商業區時期，面對青少年聚集在西門町遊蕩玩樂，除了警方

⁶⁸ 〈使西門鬧區成健康遊樂區 有心人發起「飛躍西門町」活動〉。

加強監管，當時台北市長林洋港，提出在理教公所舊址興建青少年育樂中心的構想，讓到西門町的青少年有正當活動的場所，以「不會再到西門鬧區遊蕩（聯合報，1977/9/26）」為目的，想將青少年從街道中集中到一個提供正當休閒的育樂中心，來解決西門町因為青少年遊蕩、聚集或是青少年陷入電玩，產生偏差行為例如勒索、性交易、集體衝突。1980年代青少年聚集在西門町，追求日本流行的地景，集體在街道現身，跳舞，還在徒步區示範活動，集體現身，引發社會討論，也強化了西門町跟原宿的連結。

西門町青少年的現身，縱然引來模仿、商品化或是奇裝異服的批評，但是留下極大的印象。當時在西門町的青少年次文化，很清楚的被認為是對原宿的模仿或類似原宿，西門徒步區流露「文化仿冒色彩」⁶⁹。1985年西門町龐克的現身，引起社會討論，同時也深化的西門町青少年的天下的印象，西門町＝青少年＝原宿龐克的印象。

西門町的青少年次文化在一次的官辦活動中現身，引起最多的批評，是對日本青少年文化的模仿，也開啓了青少年次文化空間的討論。其背後的問題是，如果西門町不只是青少年的，那人數聚集眾多的青少年該怎麼辦？當時中興大學建築系漢寶德教授便提出了西門町做為紐約、倫敦的蘇活區，東京的原宿這樣的次文化空間的想像⁷⁰：

台北市在娛樂與休閒文化上正亦步亦趨的追隨著東京，實在是受到在同樣社會環境的壓力下所產生的日本青年文化圈的影響。如果予以適度開放與鼓勵，台北市應該可以建立自具特色的青年文化。

也許台北市已經到了擁有自己的青年特區的時代了。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倫敦的蘇活區，東京的原宿，是青年的樂園，也是創造力旺盛的泉源，各種文化力量的交融的洪爐。心靈彷徨的青年在這裡尋找自己，為自己成年後的心理完成調適的準備，同時釋放自己的創造力，在不為成年社會規範約束的情形下，嘗試自己是否可以成為一個為社會開新局面的人，很多下一代的藝術界領袖就是在這種環境中培養出來的。

台北市的西門町是否可以發展成為這樣一個中心呢？

（漢寶德，1986，粗體為本文強調）

雖然當時台北市政府，對此的回應，跟1970年代相同以建造青少年活動中心

⁶⁹ 聯合報，1985/6/11，〈西門徒步區流露文化仿冒色彩 景觀未設計處處充滿視覺汙染〉。

⁷⁰ 漢寶德，〈劃給青少年一個文化圈〉，刊載於聯合報，1986/4/7。

的方式提供青少年活動場地⁷¹，但是西門町與東京「原宿」的連結給人的深刻印象，在往後對西門町的再發展想像也不斷被不同的社會行動者提及。1980年代令人印象深刻的龐克，日後在趙少康的政見、藝文界的請命、台北市都發局的想像，都不斷的發生影響於把西門町作為台北的原宿或蘇活區是復興市中心的替代想像。⁷²

本章小結

西門町在 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是政權跟資本打造的地景；1980 年代國家與資本往東追逐，西門町空出了一個空間。經濟轉為由低價的青少年市場來支撐，因此青少年文化變成西門町的公共文化，看電影、電玩冰宮，身體展現在街道上。沒落鬧區的意義，就在於缺乏大投資的「沒落」，而卻由青少年進來支撐住形成他們的中心鬧區。除了最明顯的青少年，還有其他的群體：鄰近的北縣居民、在西門町定居的舊移民或是西門町歌舞廳留下來的群體文化；男同志對新公園紅樓戲院傳承下一代的男同志；色情拉客還有從萬華、三重過來的性工作者。這些變成西門町的新意義。

1980 年代西門町「原宿化」，意義轉變的內涵，就是透過青少年消費作中介，像原宿一樣。可是也延續青少年遊蕩的空間，電動玩具店，因為青少年聚集沒有離去，才生出以青少年為主的消費地景。青少年對原宿的想像與消費，集體現身「佔領」西門町街道。西門町 1980 年代形成的類原宿的地景，引起社會注意，日後西門町不斷被與原宿連結。1980 年代的同志，就沒這樣的風起雲湧。不同於青少年因為消費新星跟文化的展現受到矚目。同志在 1980 年代形成公共化「同性戀」，是一種來自醫學與社會控制的污名，同時也指認同志聚集的紅樓戲院、新公園。

這個西門町，並不利於「發展」。1988 年房地產資本跟地方政治精英組織促進會，開啓一連串遊說政府公共投資的都市更新計畫。對西門町再發展的期待，反對青少年特區的設置，同時對西門町青少年進行輔導控制。

⁷¹ 不只避免青少年犯罪，由於「尤其西門町一帶的青少年穿著，簡直就是日本青少年的翻版，實在值得我們為人父母、師長，以及教育單位重視或關心。」還要塑造「中國青少年」。參見：民生報，1986/7/21，〈重塑現代青少年的模型 許水德對青少年活動中心 有最新創意 跳舞喝咖啡 讓大家做正當喜歡的活動〉。

⁷² 聯合報，1994/10/17，〈趙少康理想的西門町 很蘇活 陳水扁拜訪福林社區 強調居民參與創造社區文化的重要性〉。

第三章 「佔領西門町」？—青少年與徒步區的舞 台化

斥資一億多元的台北市西門徒步區人行系統改善工程，七日正式動工，台北市長陳水扁參加開工儀式時，宣佈「打造青春國」行動開始。陳水扁表示，「新版本」的西門徒步區，將在明年四月前完工，加上捷運路網成型及摩天大樓興建，西門町將成為台北市的新門面。

（中國時報，1998/9/8）

西門町徒步區更新工程於 1999 年完工後，新版本的徒步區的確吸引人潮回流成為嶄新的台北市消費區。這個「打造青春國」的公共空間重構行動，卻早從 1995 年開始進行。1994 年年底台北市長選舉，在野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扛著市民主義大旗入主台北市政府，陳水扁上任不久便以「空間解嚴」的種種公共空間改造政策，宣告遠離威權的台北市。同時藉由「還空間於民」的行動，為解嚴的空間填入日常生活文化的元素，恢復平反社會群體的意義。這個重新置換符號的過程，仰賴編整到經濟體系，轉變為文化經濟發展的基礎。

突出的青少年文化成為西門町在 1980 年代最主要的地景。對地方商業組織而言，青少年化固然支撐當時西門町困頓的經濟，卻也無助於西門町的發展。因此 1980 年代末期西門町有相當大的都市更新的壓力，希望恢復西門町做為中心商業區的榮景。然而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以後，陳水扁市府也顯露出對青少年特別示好的各項文化活動。新生南路封街或總統府前廣場「飆舞」便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面臨經濟再發展的催促壓力，以及「空間解嚴」政策強調還空間於民的交匯點，形成陳水扁市府改造西門町公共空間的張力。

本章將論，陳水扁市府藉由青少年飆舞瓦解本來受到威權禁錮的偽公共空間—「廣場」與「街道」，後將青少年飆舞延續到西門町做為長期的社區營造，打造青少年城市空間。然而要重塑公共空間的文化，西門町 1995-1999 年的打造青少年空間行動，除了透過青少年跳街舞生產街頭文化，也仰賴商業資本打造舞台。即是，對威權的解構，重塑公共空間的「公共性」，不單依靠原本被壓制的主體的身體表現或自我再現，在西門町的例子裡，也伴隨著依賴商業資本編整這些文化元素。

因此，西門町如何從 1990 年代初期被視為混亂無章的沒落商業區、危險地帶，轉變為青少年主題消費區，不可忽視的是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台北市文化政治經濟

的轉變下，「青少年」在陳水扁上任初期塑造新台北的角色。因此，本章首先分析西門町再造如何受到空間解嚴政策影響，以及背後陳水扁政權跟青少年的曖昧關係——一方面透過青少年飆舞塑造西門町的街頭新文化，一方面卻是延續對西門町青少年偏差的控制，整頓了西門町的秩序。接下來我以「舞台化」、「節慶化」描述改造西門町的過程，透過哪些活動轉化西門町的符號與節奏。最後，則要發問是誰打造舞台？從西門町改造過程可以發現大型商業資本的跟進配合，將文化元素的提供整編為商品流通的基礎。隨著公部門的商圈組織計畫，將西門町公共空間的管理委託給地方商業組織，西門町舞台充分為了商業發展，而不是給予青少年自主的活動空間。

第一節 青少年飆舞與空間解嚴

一、飆舞的意義

陳水扁上任後的「空間解嚴」政策，「對於空間的集體記憶與符號，並未因政治制度的由官派市長變為民選市長就因此有了立即的變化，甚至在開放於市民大眾『自由發揮』地進入空間，或許只是讓既存的符號與記憶隱匿而存在。」陳華志點出了市政府的行動，正是在「疊」上新的藝文記憶才能重新與既有的「權力記憶」上進行鬥爭與再建構（引自蕭民岳，2008：36）。蕭民岳（2008）分析陳水扁市府的「飆舞」系列節慶，指出台北市做為舊威權政治的中心，做為中華民國、台北市民做為國民的代表，是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時期強力建構的中國認同；台北市的城市意象與居民認同與舊時的國民黨權威統治緊密聯繫。因此，

與其說陳水扁是以『建構』新的認同來取代舊有的認同與象徵，不如說是以喧嘩、堆疊新符號的方式來『消解』既有的認同框架。層層疊上的新認同，其實是想解構、解離既有的城市象徵與認同。(30)

陳水扁在 1994 年 12 月 25 日就職前夕，特別邀請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參加市政府前廣場的聖誕舞會：

「我和阿扁的自助舞會」昨晚在市府廣場展開，協辦單位 TVBS 電視現場轉播，多名偶像級藝人登台獻唱，現場開放市民和青少年們一同熱舞，警方雖派出大批員警協助疏導交通，但因耶誕夜歡樂氣氛濃厚，連員警都放鬆心情執勤，大批小吃攤早已占據停車場邊人行道作起生意，有些攤販更「偷渡」進入廣場旁賣起各種小吃，彷彿一處臨時夜市，但員警都未予阻止。

(聯合報，1994/12/25)

從自助舞會到跨年晚會，陳水扁上任以來，所有政策、活動，都標榜「市民主義」，一個不一樣的新市府正在成形。

說辦就辦，陳水扁所屬的福爾摩沙基金會，就在陳水扁就職前夕的耶誕夜，與 TVBS 電視台「寶島蜜見」節目合作，舉辦了一場青少年「自助 PARTY」，地點選在市府廣場，入場券寫明限制十三歲至廿五歲青少年參加，藉著青少年的活力，標示台北市長民選以後，即將為台北市政府注入的第一股新氣象。

阿扁說，新的市政府不僅要在行政效率上，讓市民耳目一新，就是在各種例行活動上，也要求新求變，讓市民充分感受到民選市長應有的創意，這也就是市民主義的具體實踐。

(聯合報，1995/1/16)

「舞會」的形式在此之前很少出現在政治人物與選民接觸的場合，也一直都是台北市官辦節慶的形式。然而陳水扁在就職前夕以舞會的形式，還特別邀請青少年，原因是在族群內在緊張的台北市，陳水扁以訴求生活品質、市民參與的民主價值勝出，陳水扁或民進黨在台北市的執政難以用「臺灣」與「中華民國」的對立差異來爭取支持。反而在「民主」與「威權」、「改革」與「守舊」的對立中，「年輕」與「叛逆」是陳水扁對抗國民黨最有力的形象。青少年就彷彿過去遭受國民黨威權高壓統治的民進黨的象徵。蕭民岳（2008）指出「舞會」在臺灣開始從後威權政治時代走離的政治意義：

在威權政治的年代，政治掌權者壓抑著人民的集結，將人民的集結視為反動、影響秩序的動亂。而這當中連最無涉政治權力、為了娛樂而進行的集結也被嚴加禁止。禁止舞會意味著政治管制範圍的最遠處，深入到最無涉於政治全力的人民生活的那個部份。反過來說，舉辦舞會在當時含著反抗政治權力的味道，是屬於那個年代的青少年反抗，是某種偷渡、逾越界線的行動...。(39)

舞會的管制，是臺灣社會對威權統治的集體經驗與記憶，「舞會」的舉辦，也有如平反了過去受到威權政治所禁制的民眾集結。同時也宣示新政府不再是那個壓制個人生活的威權政權，而是與民眾站在一邊，勇於反抗追求自由的改革盟友。

陳水扁以青少年飆舞的活動，藉著青少年象徵綠色執政的改革、反威權與開放性。藉著身體的舞動踰越、鬆動被威權所禁錮的公共空間。青少年自由自在的身體舞動，是對威權空間禁錮的最大反差。1995 年高中聯考以及大學聯考結束後

的夏天，由台北市政府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的新生南路舉辦飆舞活動。三萬多人聚集歷時了三個多小時的飆舞，市府設計要在舞會全程讓青少年「當自己的主人」，捨棄體育館而選擇新生南路封街，讓青少年享受「小小的犯罪」的快感（聯合報，1995/7/10，引自蕭民岳，2008：38）。突顯出與過去的政權不一樣，是站在自由、突破威權的民眾這一邊。用跳舞來不斷鬆動既有的從臺灣歷經殖民統治以來的「偽公共空間」⁷³。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台北市政府又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辦了一場名為「共鳴時刻 我們在一起」的舞會。

透過民眾的身體舞動解離了籠罩時間與空間之上的威權幽靈，最終在全民齊按喇叭的漫天破響中大聲落幕。多元紛雜的解離過程在喇叭的共鳴下劃下這一樂章的休止符，喇叭聲的嘈雜漫出而鬆開了既有秩序，人們再一次對秩序之內／之外的區分感到模糊，如同封起新生南路舉辦舞會一般，在禁區內飆舞的人聲鼎沸，張揚而蔓延，一旁總統府的莊嚴肅穆如同紙老虎般地漸漸糊掉了，最後的喇叭齊鳴聲，「共同」地達成的嘈雜最高點，紛亂蕪雜的各種人聲樂音合而為一撞開了就秩序，彷彿也暗示了其合而為一地產生出另一種新（嘈雜）秩序。

（蕭民岳，2008：46）

蕭民岳指出透過對威權空間的鬆動，一次次的官辦大眾節慶，讓民眾在同一個空間裡面聚集、營造共感的經驗。「舞離舊中心（25）」，也逐漸暗示了一個集體認同的框架。消解空間威權幽靈以後，用什麼來填入？在一個反威權的象徵上，建構由這些新的集體經驗型塑而成的都市市民認同。選舉造成的內部緊張分裂也透過一次次共感經驗撫平，進而做為台北新故鄉的認同基礎。空間與文化政策成為都市再造工程的最前線。莊雅涵、王奕婷、吳偉立（2004）則指出私人資本打造的集體消費空間早在台北市政府先一步塑造台北市民的集體經驗。莊文認為誠品書店所營造的連結英文世界的跨國想像空間經驗，被陳水扁所挪用依賴；西門町則是一個對比的抵抗顛覆的城市空間。不過這樣的對比，顯然忽視了西門町做為陳水扁上任後，西門町是延續新生南路飆舞後續的更實質的城市空間改造計畫。

二、佔領西門町

⁷³ 「偽公共空間」為夏鑄九所語，他指出日本殖民時期許多公共建築實際上卻只是彰顯殖民現代性的建物，並沒有真實的公共性。夏鑄九，2000，〈殖民的現代性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的歷史〉，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0期，頁47-82。

在颯舞活動廣受好評以及引發更進一步對台北市青少年公共空間的需求的討論。1995年暑假，NGO 團體導航基金會與淨化基金會，在西門町舉辦「打造青少年城市空間—佔領西門町」活動，將中正紀念堂的街舞團體引進到西門町街頭演出，並且向市府的颯舞活動喊話，認為除了舉辦節慶式的舞會，應該要把青少年的活動空間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導航基金會的董事長夏林清表示：

除了這種大型舞會外，市府應結合所有的行政資源，為青少年找一些立即可以活動的空間，並且落實在日常的生活，例如西門町。⁷⁴

同時台大教授夏鑄九也在文建會關於台北市西門徒步區、永康社區的社區營造會上表示「西門町本來就是青少年的」，⁷⁵如果把西門町還給青少年好好規劃，色情行業將無法滋生。官辦的聯考後在新生南路的暫時性解放，緊接著被連結到具體的城市空間，台北市青少年聚集密度最高的西門町。

1995年七月與八月導航與淨化基金會舉辦的「佔領西門町」活動。「佔領西門町」在1995年暑假進行，長達兩個月的定期活動，邀請了青少年舞團在西門町街頭表演以外，也舉辦扮裝、造型比賽。佔領西門町活動以打造青少年的公共空間為主旨，企圖在青少年聚集的西門町，創造非商業性的集體活動（L，訪談稿2009/6/4）。

在台北市政府支持下，轉移落實到真實的青少年城市空間西門町來進行。⁷⁶1996年台北市都發局開辦「地區環境改善計畫」，西門町便由導航基金會取得計畫案。1996年寒假，導航延續前一年邀請青少年團體到西門町跳舞之外，並舉辦持續性的訪談、田野活動，舉辦青少年對西門町空間規劃的工作坊，再轉由規劃公司納入台北市重要的「造街」計畫—西門町徒步區更新規劃中。

台北市政府對打造青少年城市空間的重視，連當時都發局負責西門町徒步區更新業務的科長林欽榮也表示，西門町的消費人口有四分之一是青少年，這種城市空間特定族群的存在，是全台灣絕無僅有的。青少年是政治影響力的弱勢族群，因此更需加以保護。他也認為青少年佔領西門町活動是一項「文化與社會空間實驗計畫」。⁷⁷因此，在1995年西門町緊接著新生南路颯舞，也透過青少年街舞表演的方式熱鬧的進行一場青少年與空間的活動。1996年在台北市政府都發局計畫的支持下，納入西門町空間改造的規劃。青少年1980年代佔領西門町以來，受到國

⁷⁴ 民生報，1995/7/10，〈颯舞之舉 學者肯定為青少年多設計些‘出口’〉。

⁷⁵ 夏鑄九言。見報導：民生報，1995/7/18，〈舊社區 新營造 北市西門徒步區 永康生活圈兩計畫 文建會邀專家提供意見〉。

⁷⁶ 事實上「佔領西門町」受到陳水扁的福爾摩莎基金會捐款支持，陳水扁夫婦也參與其中活動。

⁷⁷ 中國時報，1996/2/6，〈西門町改造完工後 將公平分配給各族群使用〉。

家所支持成爲西門町的主角。

然而陳水扁「飆舞」象徵反叛、打破威權、解放的，當飆舞移師到西門町用來打造屬於青少年的城市空間，要面對的是什麼景象？讓我們回到 1990 年代初期的西門町，西門町在色情行業猖獗、交通困頓、青少年化、經濟下滑代表著失序。當地的地方商業組織西門更新促進會已經不斷催促西門町的更新。陳水扁身爲民選首長自然不可能迴避西門町經濟發展的壓力。同時西門町做爲台北市集體記憶的空間，各方對西門町的期待想像，這都讓陳水扁超越了社區的層次，進行空間改造的同時也要由西門町來重塑一張台北市的臉。

1995-1998 年都市發展局計劃案	執行單位
台北造街計畫— 西門徒步區人形系統改善規劃案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公司
地區環境改造計畫— 西門町青少年文化創造及表達活動案	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資料來源：導航基金會總結報告書
W（前都發局官員）訪談

第二節 舞到西門町：從空間解嚴到公共空間整頓

導航期待把飆舞移師到西門町，打造一個青少年的城市空間。但是西門町的再發展有其地方組織的脈絡，同時對於「青少年聚集在西門町」這個現象商家促進會跟國家都有要控制危險偏差的立場（如第二章所述）。導航的行動，並未能走向預期的目的，建立一個「屬於」青少年自主自治的空間（及便受到都發局長口頭的允諾）。

然而導航與市政府 1995-1996 年間的行動，也轉化了西門町。本節先論青少年空間行動到了西門町必須整合到經濟發展的條件下，空間解嚴內涵的轉變。其次，西門町的再發展出現與「舞台」的想像，舞台化整頓了西門町的文化元素，將既有的文化編整爲新的消費空間。

一、對青少年空間的想像：舞台

(1) 解放與控制

青少年地景在 1980 年代末期導致兩種衝突的空間發展想像。然而在民選市長陳水扁的支持下，市政府指定率先用社區營造重新規劃的公共空間，一下把青少年提升到重要的地位。市政府意識到更新後的西門町將成為台北市的新門面，卻依舊把青少年提升到重要的地位。這用政策的延續性或是從經濟因素來解釋都是不足夠的。如上一節所述，從台北市 1994 年市長選舉開始，青少年做為陳水扁重要的政治符號，「打造青春國」具有與舊威權政權切割，打造解嚴台北的政治意含。

然而，西門町的再造規劃有其歷史條件，西門町與青少年的相互關聯在 1980 年代以來交纏已久。上一章我們看到，地方商業組織促進會與少輔會合作，力圖控制西門町的青少年偏差。此外，1980 年代青少年聚集西門町展現的文化開啓西門町連結「原宿」的想像。在各方對西門町的再造有所期待矚目下，陳水扁市府必須回應這些需求，提出「青少年城市空間」計畫做為西門町造街的主要內涵，不單是支持青少年「佔領西門町」的意義。

1995 年四月西門町快樂頌 KTV 大火，延燒的青少年問題，即便對青少年態度持開放立場，喚起了對西門町一直以來因為青少年聚集而成為一個紛亂容易發生危險的空間。

1995 年四月十七日，西門町快樂頌 KTV 發生火警共造成十二人死亡，經過調查是一名十七歲的未成年少年縱火所致。快樂頌大火不只引發公共安全問題對甫上任的陳水扁市府團隊造成強大的壓力，也掀起了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注。

陳水扁說，十七日凌晨二時他在睡夢中被市警局長黃丁燦叫醒，告知快樂頌 KTV 大火，他隨即起身趕往現場看到慘不忍睹的場面，使他心情十分沉重，前天案子雖破了，但他認為問題還是未解決，因為被大火燒死的很多都是十幾歲的青少年，這些都市社會邊緣人，一般都是來自比較清苦的鄉下地方，在都市謀職不是很容易的情況下，家人又看不到管不到，KTV 等場所遂成為他們打工或遊樂的場所，很多社會問題也因此發生。

(聯合報，1995/4/22)

不但隨即擴大臨檢，嚴格取締青少年深夜，查察涉足不正當場所的青少年，⁷⁸ 陳水扁並指示市警局對禁止青少年涉足的不正當娛樂場所，加強查察及嚴格取締，並應研擬對策，禁絕青少年在公共場所內飲酒，致生事端。並要求少輔會體

⁷⁸ 台北市政府實施擴大臨檢的時段，指揮十四個警察分局及直屬大隊，在各個有治安疑慮的公共娛樂場所執行「旭日專案」。參考：聯合報，1995/4/26，〈北市執行旭日專案 查獲兩百餘青少年 涉足不正當場所〉。

制化、增加經費，並且要朝向社區，深入青少年文化（聯合報，1995/4/26）。

〈挽救偏差青少年 需要更多關懷〉	（聯合報，1995/4/22）
〈校方增設輔導老師 警方取締涉足不良場所 加強輔導青少年 雙管齊下〉	（聯合報，1995/4/26）
〈北市執行旭日專案 查獲兩百餘青少年 涉足不正當場所〉	（聯合報，1995/4/26）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大鳴阿扁要辦青少年高峰會大放 指將與青少年面對面溝通,說出心裡的面;而棒球場不嫌多,要提供更多休閒場所供他們使用〉	（聯合晚報，1995/4/28）
〈加強輔育 少輔會經費決提高 市長參觀土城少年觀護所 認為少輔會年預算僅四千萬「很不應該」要求增加一至二倍〉	（聯合報，1995/5/12）
〈校方增設輔導老師 警方取締涉足不良場所 加強輔導青少年 雙管齊下〉	（聯合報，1995/4/26）

快樂頌大火後相關報導整理

當陳水扁用青少年飆舞做為身體踰越、打破原來威權空間的界線以及符碼，落實到真實的城市空間改造，要用來轉化西門町的負面（犯罪、髒亂）意義，事實上也是由飆舞活動在已經是青少年聚集的西門町「馴化」了西門町青少年的活動。陳水扁的青少年政策的曖昧性，一來表示對這個族群的開放性，二來因為快樂頌引發的公安問題更緊張於青少年空間的安全性，展現在宵禁政策上。這樣矛盾的立場，整合為「要一個愉悅安全的公共空間，但必須要受到控制的」。

（2）導航的論述整合

成立數年的西門徒步區管理委員會成員認為，徒步區提供活動空間給青少年表演，但他們不希望徒步區成為低消費力的青少年的天下，而期待能吸引更多高消費力成年人來購物。

（聯合報，1996/2/6）

然而西門町的再發展是當地商家迫切的需要，台北市都發局規劃以電影產業來振興經濟，青少年造街計畫也與西門町的再發展整合。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對西門町再發展與「青少年」之間矛盾曖昧的態度，進而提出新的論述以「青少年文化」改變西門町邊緣、危險的負面形象。

目前西門徒步區已成立多時，但至今每逢管制時間，車輛仍然穿梭期間，攤販任意擺設，商業廣告旗幟林立，形成一幅髒亂的景象。再加上西門町給人的印象，如電玩、色情、高犯罪率等，經常令人視為犯罪邊緣區或危險場

所。如何在西門町這個被視為邊陲的地區，重塑其新的生命力，創造性的青少年文化及表達活動推動，將是西門町再出發的動力。

(導航基金會，1996：1，粗體為本文強調)

西門町附近的商家對本活動有贊同和反對的意見，贊同者持的觀點是青少年帶來消費力，而反對者認為青少年帶來秩序的混亂而且消費力低，所以對商家的進一步溝通，如何提昇西門町區的文化特色及西門町給社會大眾的形象，也是本計畫重點。

(導航基金會，1996：2，粗體為本文強調)

台北市政府對西門町的改造計畫，由造街計畫的專業公司境群規劃公司，以及地區環境改善計畫由導航基金會執行。也就是導航基金會負責西門町的社區營造工作，在此階段，不只要為西門町塑造新的社區文化，也必須滿足地方商業組織促進會的經濟再發展需求。⁷⁹然而導航試圖掌握西門町的再現跟論述必須接合地方經濟發展，在西門町形象低落的情況，青少年被論述為利於經濟發展。但也因此，限制了特定的青少年文化。

(3) 打造舞台

挪用「原宿」的想像

從短期的、嘉年華式的街道、廣場，轉移到一個真實的城市公共空間，把西門町化為舞台給青少年。事實上，在 1985 年就曾經由都發局舉辦徒步區示範計畫，雖然當時只是把既存的青少年霹靂舞當作活絡徒步區的街頭表演之一，卻受到歡迎迴響，引發了把西門町發展為青少年次文化空間的討論。

1980 年代青少年流行的「原宿風格」，讓西門町跟日本原宿有了連結。青少年龐克聚集在西門町街頭，當時就已轉化了西門町的意義。西門町不只是一個沒落的舊中心商業區，同時也是「台北的原宿」。大批青少年在西門町街頭展現穿著、身體，引發對青少年文化模仿的危機與批評，卻也寄望西門町是否可以成為台北青少年的都市空間。因此，對「原宿」想像的內涵，不單是商品消費空間的模仿，更受到期待的是西門町像原宿一樣成為青少年表現自我的舞台。⁸⁰

⁷⁹ 根據受訪者 W (前都發局官員) 表示，第一屆地區環境改善計畫公開招標，但是有能力提出計畫書的多集中在天母或是台北市東區的社區。台北市西區當地居民組織在此制度下並不習慣參與競標。導航基金會並非西門町當地居民的非營利組織，然而 1995 年導航基金會已經與淨化基金會舉辦「佔領西門町」活動並受到陳水扁福爾摩莎基金會的支持，因此，與其說西門町是基於居民的社區營造，更貼近事實的是，貫徹台北市政府的青少年空間控制/賦權的政策。(W，訪談稿 2009/6/8)。

⁸⁰ 1994 年台北市長新黨候選人趙少康先生，也提出將中山堂、中華路到紅樓戲院一帶規劃為「台北蘇活區」的構想，提供給青少年表演空間。雖然不以原宿稱之，內涵上同於東京的原宿做為青少年聚集、跳舞的次文化空間。

活動	內容	執行單位
1985 年台北市行人徒步區 示範活動	邀請百名青少年表演霹靂舞。當天臨時有青少年團體即興加入街頭演出。霹靂舞受歡迎的程度引發青少年對原宿青少年文化的模仿。也引發台北需要一個像原宿的青少年空間。(詳見上章)	都市發展局
1994 年「紅樓夢、西門情」	藝術家王墨林等人在紅樓戲院前廣場舉辦俗民文化表演活動，為紅樓戲院保存請命，並且提出可將紅樓與西門町規劃為原宿	樂山基金會

如上一章所述，1980 年代末期，西門町快速青少年化，一方面引起新興消費市場的注目以及對青少年次文化與活動空間的討論，另一方面卻也引發社會焦慮。浮現了社會對西門町空間規劃的兩種期待，劃作青少年文化特區，或是應該扭轉青少年化的趨勢進行商業區的升級。

掃電玩

1997 年，因為周人蔘弊案而大力掃賭博性電玩，讓武昌街店面一夕之間變得空蕩蕩。掃電玩、掃黃、掃攤販的行動，拔除西門町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期被視為髒亂危險的空間符號。把西門町本來充斥電玩、色情、青少年遊蕩，整頓轉化為明亮的舞台。

陳水扁當市長之前，他就是把整個電動，否則我們這裡很多都電動玩具阿。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比如我們這裡七號，到樂聲戲院是一號嘛，這七間有大概五家六家都是電動，因為電動的利潤比較高、報酬率比較高、租金也很高，所以人家都租給他。**取締以後整個又空起來，整排都關起來，重新慢慢有人再租給其他行業這樣。**

(G, 訪談稿 2009/12/16)

置入新符號：台北電影節

紐約的布萊恩公園原為毒販、遊民聚集的空間，透過引入時裝秀等文化活動，改變布萊恩公園的節奏感；西門町原為台北市電影產業聚集的地方，許多電影界

人士也希望台北市政府能夠以電影產業做為西門町再發展的方向。⁸¹台北市政府1998年舉辦首屆台北電影節，不但要藉由國際影展讓台北市擠進全球城市的文化位階，也藉由台北電影節星光大道的鋪面，人潮重新匯聚轉化西門町衰敗的意像。台北電影節刻意封街改裝西門町，就是最直接的給予新的視覺印象。

台北電影節昨晚七時卅分在台北市長陳水扁的「觸電儀式」之後正式開幕，點亮了西門町街頭的「城市之光」造型。原本景觀坑坑疤疤的西門町圓環，在建築師林洲民的包裹之下，呈現了另外一種光影風貌，昨天大約有三千名觀眾在西門町一同欣賞「變裝」之後的街頭景觀，在景象一新的西門町街頭逛街。...將西門町的徒步區、圓環、天橋、中山堂都換上了不同的景觀，同時運用光影的技巧強調電影的感覺。...妝點得有如一本台灣電影史的「電影天橋」，昨天也吸引了無數行人流連、駐足。

(中國時報，1998/09/26)

為期十天的台北電影節昨晚在西門町熱鬧展開，這個著名的電影街也聚集不少特色咖啡店、台灣小吃、各式專賣店，電影節執行委員會特地編製一本西門町口袋書，讓民眾歡度電影節時，順道按圖索驥，來趟豐富的「城市西遊記」之行。

(中國時報，1998/09/26)

臺北電影節的開辦，吸引人潮集中到西門町，為期十天的電影節，除了圓環、街道空間有節慶設計，從中山堂到紅樓，天橋，電影畫面，由影像、時間的疊置、空間的標示，宣告前一個歷史階段的西門町範圍。依附在臺北電影節期間的逛街地圖編寫，提供旅客按圖索驥走入西門町。電影節在西門町各電影院之間跑來跑去的新經驗，事實上將整個西門町都變成了節慶空間。西門町電影街的舊時記憶，轉化為西門町沒落後新的集體經驗。

二、馴化

T. C. Chang(2000)分析新加坡的觀光政策，為了塑造新加坡「亞洲」的意像，官方介入了族裔區商店的擺設包括商店的擺設、街道還有時間節奏的安排。這樣的經濟發展計畫改變了原居族裔居民的組織與認同。她把這樣的整頓過程稱為「馴化 (taming)」。

⁸¹ 1993年國民黨黨部拆除事件，引發台北市歷史建物保存的急迫性，選前樂山基金會等藝文界人士為紅樓戲院的保存請命，並提出紅樓戲院可以扮演提供西門町青少年藝術文化表演的空間。選後，陳水扁視察宣佈市府收回紅樓戲院，選擇了電影文化取代已經轉型為同志聚集空間的紅樓戲院。

不同於 1980 年代，公部門借用當時青少年流行的霹靂舞做為街頭表演內容，導航與台北市政府，從西門町之外引進「飆舞」做為國家所支持、新台北青少年該有的活動，事實上是將焦點放在青少年，由青少年改變西門町，也由對特定文化形式（飆舞）的支持塑造青少年。

（1）反客為主：青少年做為主角

1996 年二月，系列活動中青少年造街座談會，邀請都發局長與科長列席，由兩百位青少年代表在會中發表對西門町空間的感受與看法，都發局長在會中甚至表示應該讓青少年自主管理西門町空間。雖然青少年造街活動，最後交給專業的規劃公司「境群」以後，導航基金會跟青少年在後續的規劃過程已經沒有實質的權力⁸²，但是透過大眾媒體的報導，台北市政府大力支持的態度，西門町徒步區的改造工程「青少年徒步區」、「青少年王國」的建造留下深刻印象。透過媒體報導青少年對於西門町環境的意見發表，更是顯現了在西門町諸多族群中，青少年做為被國家所背書最重視的一群，甚至都發局長張景森亦曾發言，要讓青少年管理西門町。

用意在於改變青少年在西門町只是扮演「消費者」的角色，要讓青少年在西門町的街頭創造獨特的文化，然後讓這些青少年活動常態化，融合西門町居民的參與，「建構一個屬於青少年文化的西門町街道（導航，2002：1）」。跟之前少輔會比較，1988 年「飛躍西門町」活動，提供青少年正當休閒場所，導航基金會在 1995 年跟淨化基金會的活動，雖然同樣立基於青少年失序問題，但是基進的提出，青少年需要可以自由活動的都市空間。這樣的論述並且把青少年「反客為主」，1980 年代被視為「外來」的低價消費者跟麻煩製造者，在導航的論述裡，例如「西門町本來就是青少年的」⁸³，以及陳水扁市政府的支持下，反轉讓台北市青少年群體做為西門町的新公共文化。

商家與房東對青少年消費力低落而不願意西門町變成青少年的天下。導航進行的打造青少年城市空間活動，的確試圖賦權給青少年。把青少年轉變為對都市空間規劃的發言主體。

在 1990 年代初期，西門町聚集了青少年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沒有人會認為西門町應該屬於青少年。但是國家支持青少年城市空間計畫後，青少年被賦予了做

⁸² L，訪談稿 2009/6/4。

⁸³ 夏鑄九言。見報導：民生報，1995/7/18，〈舊社區 新營造 北市西門徒步區 永康生活圈兩計畫 文建會邀專家提供意見〉。

為空間主角的正當性，比青少年在西門町晃盪更久的老年⁸⁴，在這過程完全被視為他者。老人活動的西門市場也從青少年眼中看來陰暗髒亂。老人群體甚至承接了污名，變成青少年的西門町裡面最不搭嘎的一群。

熟悉台北市西門町的人都知道，西門町有一群「老色狼」，他們平常成群結隊，遇上「落翅仔」就上前搭訕，碰上蹺家少女更興致勃勃，有些變態的「老色狼」連少年也不放過，並時常收攬一些少年、少女做起乾爹，目的卻在姦淫猥褻，形成當地一大治安問題。西門町的「老色狼」究竟有多少人？當地警方估計可能上百人以上(有刑法及社維法紀錄者)，這些人平均年齡在 60 歲以上，最年長者有 80 歲(根據警方紀錄)，他們大都無業，而且單身。

(聯合晚報，1995/7/6)

(2) 篩選青少年文化元素

「跳舞的青少年」成為台北市青少年的新形象。導航基金會的造街計畫，並非凸顯西門町既有的青少年文化。西門町的青少年族群被視為電玩、色情、犯罪的同路人或是受害者，不然就是其中的消費者，這個青少年文化不被視為有利於西門町再發展。導航計畫所作的，是「引入」青少年街舞文化，從聚集中正紀念堂練舞的舞團找來西門町街頭表演，一方面要把西門町街頭從色情行業「還」給青少年，一方面要以非商業性的青少年集體創作活動，做為西門町街頭的主導節奏。

西門町在 1980 年代青少年化以後，從中心商業區變成青少年消費市場、邊緣、逾越的鬆動空間，是一座「青春囚城」或「沒落鬧區」。1995 年到 1996 年的青少年造街計畫，又以「街舞」「扮裝」解放又歡樂的活動，試圖改變西門町公共空間為安全、乾淨、陽光、愉悅的。

Doreen Massey(1998)談論青少年的空間建構認為，定義「特定哪些年齡群體可以去哪些地方」，就是定義一個年齡群體的過程。「對空間 (spatiality) 的控制是定義年輕人 (youth) 這個社會類屬過程本身的一部分...也是定義什麼是該群體被認為可接受的行為的過程的一部分。(1998: 127)」

陳水扁青少年政策，開放，但是從快樂頌大火跟加強少輔會還有宵禁政策，一方面又是保護。既是一個解放的運動，也連接原本少輔會對西門町青少年的控制。可以說陳水扁藉由西門町的改造—打造青少年城市，是整頓一個已經被青少年佔領使用的空間，轉化為國家願意支持的青少年形象。配合著掃校園幫派、掃

⁸⁴ 張曉婷(2004)對西門町老人進行了民族誌般的考察，很多老人表示他們比青少年還要更早就在西門町活動。

電玩以及禁止青少年夜間在外的宵禁政策，訂出了新的規制：「好的青少年」是勇於表現站在舞台上表現自我那種形象的青少年。規範了這個空間該有的行為透過鼓勵與禁止。提倡一種青少年形象，敢秀（相對於受到威權、聯考壓制）。

透過青少年飆舞的身體以及官辦節慶，突破台北市其他空間，但是到了西門町，本身已經是超出中產階級秩序可以忍受的範圍的空間，便轉為以輔導、整頓，旭日專案加上 1997 年的宵禁，更可以證明，陳水扁政權挪用青少年符號所象徵的反叛，卻還是必須回到負責、秩序來得到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

陳水扁初上任的空間解嚴，如果是先以開放、自由進出空間來鬆動既有的威權統治下的集體記憶與符號，做為新生南路封街飆舞落實在日常生活革命的西門町徒步區計畫，把街頭還給「青少年」，但是蔡明亮在電動玩具店蹲點一年所觀察的青少年，如同節慶式的聚集一群人來集體經驗空間與時間跟日常的斷裂，從中正紀念堂引進街舞團體做為西門町的新文化，卻忽視了在西門町大宗的哈日消費或是電動玩具店的青少年次文化。

陳水扁時期對青少年以尊重、「取悅」的態度，但其實跟少輔會對「青少年」範疇的建構一樣，陳水扁新市府所建構的是新的青少年認同，一個隨即被新的媒體與資本做為市場利基的青少年形象。對西門町公共空間抱有的原宿青少年空間的想像，也更加連結到全球消費景觀的進步景象，塑造了公共空間該呈現出來的進步城市的青少年景觀—自由、表達自我、卻也得小心翼翼控制不威脅社會安全的。這樣的期待，也就是既有冒險、叛逆主張的氛圍，卻又是被確保安全的，正是 Hannigan(1998)所謂「新奇城市」的打造，真正的內涵是充滿愉悅、刺激又安全的娛樂消費空間。營造特定國家所支持的青少年形象，把西門町變成正當休閒的「舞台」，與九零初期電影的一夜情、電玩、撞球場、青少年遊蕩、同性戀差異。把電玩、賓館、冰宮的青少年，轉化為在大街上表演，在兩道消費。

西門町的新符號在系列活動中逐漸堆疊，一年不到的造街計畫並沒有持續，大型零售資本、媒體，在這個基礎上更快速的席捲改變西門町的視覺符號。但在此之前，市政府與導航引入青少年街舞、扮裝活動的同時，公權力也同時在整頓淨化西門町。

第三節 走向迪士尼

1995 年台北市政府以「打造青少年城市空間」來改造西門町。支持青少年做為西門町舞台的主角。然而青少年是主角卻不是主人。隨著西門町的改造計畫，事實上「整頓」了 1970、1980 年代以來失序的空間，新的大小零售資本也跟著改

造計畫進到西門町。透過青少年造街，國家與陸續加入的商業資本把西門町打造為光鮮新潮的舞台。模擬著 1980 年代所慾望的「原宿」。

東京在 1970 年代的青少年地景也有所轉變。西武集團在鄰近原宿的澀谷公園道上開設 Parco 商場，創造了一個新的圍繞著公園道的澀谷意象。Yoshimi(2000)指出西武集團在澀谷所作的，是透過序列的累積，把一個設計過的地區從它周圍的區域獨立出來，並且將它轉化為劇場。將這個地區呈現為一個文化消費的開放劇場，每一個消費者可以扮演一種可消費的他們的自我形象。西武的澀谷空間計畫，如同迪士尼樂園是一種「新空間」，西武集團將澀谷「舞台化」的空間安排，就如同迪士尼樂園一樣扁平、片段化，依據「主題」跟「品味」來建構，而不像老市區包含了各種差異的元素。(2000: 216-217)

北美同樣有許多對迪士尼樂園的評論。其中 Zukin(1995)點明迪士尼世界是 1990 年代新公共空間的樣板。學習迪士尼以私人管理的方式，提供大眾維持「安全」、「乾淨」的公共設施。在 Yoshimi 的舞台化、片段化概念以外，Zukin 強調的是私人企業對公共文化再現的壟斷，公共服務與空間意義由私人企業來提供。

1990 年代，美國紐約市長朱力安尼，正在推廣商業促進區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由私部門認養公共空間，改善商業區的環境。時報廣場的再發展幾乎讓渡給迪士尼企業與索尼，交由媒體企業打造公共空間的視覺符號，塑造公眾的集體記憶。也因此都市本應充滿著雜亂異質的文化與衝突，卻由大企業設置了單一的視野。視覺一致性的設計，可以掩蓋都市空間裡令人不悅的人事物，把具有危險可能的「差異」轉化為安置得宜的、可消費的「多樣性」(Mitchell, 1995)。

因此，晚近公共空間的迪士尼化兩層意義，一個是轉變為主題化、舞台化的空間；另一層意義指的是公共空間私營化，變成一個將差異化為多樣的消費空間。

西門町徒步區在 1990 年代晚期的再發展，是一個舞台化的過程。除了公部門的計畫，也十分倚賴私人商業資本配合搭建舞台。本節將指出，西門町徒步區更新工程以及陸續的資本投資，將西門町舞台化過程的另一個面向，實為消費空間與商品符號所支撐。

一、從公共到消費

陳水扁的市民城市除了公共空間政策，也展現在其文化政策上，讓藝文活動來進行符號的消解，誠品書店則是尚未有文化局以前，重要的幫助型塑台北市民

形象的重要機構。借助「文化消費」空間的塑造，做為公共空間的內涵。後威權「多元」的內涵，要怎麼組織怎麼編排？⁸⁵莊雅涵、王奕婷、吳偉立（2004）「消費空間」更是早一步有召喚台北市主體的作用。陳水扁挪用了誠品書店做為台北市城市外交競爭的文化資本，也借助誠品書店打造連接全球想像的台北市與台北市民。⁸⁶

誠品所擅長的地方空間、文化安排，誠品在做的，正是陳水扁市府打造台北新故鄉的內涵。誠品書店在從精英書店轉型為販售精英符號的連鎖書店（蔣文德，2000）後，所打造的台北市中產美學空間，跟陳水扁對於台北市民主體的塑造是一致的。

「連鎖而不複製」的策略，正是打破一元的國族想像，而空間區域的文化以及多元的生活經驗。再現每個區域的在地文化，進而又把在地文化符號化，做為對空間的消費素材。蔣文德（2000）舉誠品台大店的例子，當誠品配合台大的節奏，並且把「開學」、「圖書館」、「分校」、「暑修」做為文宣與活動的修辭，一方面順應台大學生的日常生活節奏跟文化，一方面也讓非台大學生的一般消費者，到誠品台大店內便可以慾望或投射台大的學生生活。

誠品到西門町

1997年，誠品接下西門町1968年開幕的老牌的百貨公司今日百貨公司。在西門町的經濟危機，老百貨紛紛無法持續，誠品書店的進駐，象徵1990年代的新台北中產核心象徵中心，從東區，回到了西門町。⁸⁷誠品接手老百貨，舊時代的結束。1980年代中心遠離，舊百貨公司就像記憶一樣不捨離開西門町。

誠品的進駐，彷彿說著中心要回來了。台北市政府宣佈多項更新計畫後新資本投入西門町。例如1995年，大陸工程以及力福建設，將萬國戲院改建為青少年專屬的百貨賣場；而1997年誠品進駐西門町，更是為西門町的再發展打了一劑強心針⁸⁸。誠品代表的，是台北市的中產階級消費品味，誠品的投資，也馬上帶動周

⁸⁵ Zukin（1995）為1990年代初期朱利安尼治理下的紐約市，發出公共文化為私人資本所壟斷的警訊。紐約市面臨移民衝突的問題，多元文化主義來斡旋，台北市則是在面對後威權時期，由選舉凸顯出來的省籍緊張，「多元」成為後來施政者非常核心的政治修辭（王志弘，2003）。

⁸⁶ 1995年陳水扁表示曾為誠品敦南店向新光集團請命，因為台北市不缺百貨公司，卻需要誠品書店這樣的空間提高台北市的人文形象。（蔣文德，2000）

⁸⁷ 誠品的進駐，有更大的符號力量，文化觀察家李清志（1998）便寫道，「從都市空間的角度觀察，西門町正有一股強勁的更新力量正在形成，包括前一陣子誠品書店的進駐，象徵著都市中產階級的回歸西區」李清志，〈三少四壯集：城市電影節 台北終於有自己的電影節〉，刊載於中國時報，1998/9/16。

⁸⁸ 中國時報，1998/1/7，〈西門町大反撲 大型服飾店進駐吸引人潮 誠品開幕 添人文氣息〉。

圍的租金。⁸⁹

誠品公司企劃李菲婷表示，西區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冷清，這裡的人潮很固定，到了週末假日，更充滿蓬勃的氣象。而在這次的規劃與招商過程裡，誠品也再次的驗證，其實有非常多的業者想進駐西門町，只是苦無滿意的店面，他們很擔心隔壁隨時就變成了理髮廳，而讓自己白費心力，所以，能有具商譽的商場出面招商，業界都非常的開心。

像是李菲婷，已經很清楚地在誠品開幕後，看到一些東區類型的客人出現在這個商圈裡了。

(中國時報，1998/1/7)

塑造西門文化

然而誠品有這樣的象徵，他卻不是把「東區」帶到西門町。誠品書店西門店打破誠品書店的書類，特別擺放了與青少年文化緊密相關的漫畫書，以及電影書類，做為空間規劃的主軸，在書店內特別增列了漫畫書(蔣文德，2000)。雖然誠品並未直接參與台北市政府在1995-1999年間的造街計畫，但是誠品本身就是造街。誠品集團陸續於2002年、2005年接手新世紀大樓以及武昌街來來百貨，佔據西門町在1980年代以前重要的三個位置。為西門町青少年塑造「混種異質新人類」意象的「誠品一一六」更是取代西門町圓環麥當勞的位置改寫西門町的入口意象。

市政府的「打造青少年主題城市」活動，以及誠品西門店的開幕，在意象上，改變了西門町老舊沒落跟危險色情猖獗的黑暗面，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轉化為青少年消費跟娛樂的西門町地景，在國家跟具有優越掌握符號能力的企業—誠品的背書下，將在地文化元素篩選轉化為地方的符號。⁹⁰

同時，由誠品連接地方文化到書店內部的「展示」，提供進入書店的使用者的經驗，經過包裝跟再現的地方文化，透過誠品書店，這個被認為是台北市中產階級品味的代表，認可了西門町青少年文化，把西門町的某些青少年文化元素，跟中產階級的目光連在一起。在誠品書店裡，這一切並不危險也不邊緣，而是歡迎讀者身在其中。「複製而不連鎖」的書店擴張原則，符合多樣、在地文化，把在地生活符號化為書店空間，中產階級品味並未消失。

⁸⁹ 中時晚報，1998/3/26，〈大型賣場進駐，引爆商圈店面行情〉。近幾年來稍顯沒落的西門町一帶，隨著誠品進駐峨嵋街原今日百貨所在位址，以及有日系百貨公司考慮設點，店面租售行情已上揚20%。

⁹⁰ 誠品商場經理表示，誠品商場設店，係依每個區域的特性來塑造店頭風格；峨嵋店位於以青少年為主要客層的西門町，賣場裝潢將融入豐富的色彩、鐵件，強化視覺印象，商品內容也會與東區、天母的店頭有別。(中國時報，1997/6/13)

誠品書店在西門町顯現出其在台北市改造環境形象的影響力。2008年，西門町在武昌街、西寧南路中國戲院舊址推出在西區難得一見的豪宅建案「阿曼 TIT」。在西門町鬧區中心推出豪宅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建商邀請誠品集團包下豪宅一到五層樓的商場。並在文案以及建地圍牆指明誠品為「人文新地標」。誠品書店這種效果，至今更已經為房地產商使用。西門町因為誠品而提昇人文形象，房地產商則利用誠品與西門町的國際觀光吸引力做為豪宅的賣點。⁹¹

二、商業資本接收青少年形象

一提到台北的西門町很多新人類的腦海裡就會浮現「萬年大樓」這四個字，這裡是青少年流行文化的聖地，哈日族的天堂，各種充滿東洋風的吃喝玩樂把戲都有。

這家決定明年在西門町開幕的百貨公司目前正在密集的趕工中，樓高十四層，賣場超大，和萬年大樓所走路線完全不同，以賣電腦為主體再搭配精緻的美食點心街，負責企畫的業者說，最大的希望是讓青少年走進來之後分不清自己是身在台北或東京。

(聯合晚報，1998/8/30)

對「原宿」的想像，行動者已經從青少年、單幫客變成國家跟資本跟媒體。⁹²雖然這家號稱分不清身在台北或是東京的第三代百貨公司後來並未出現，但是業者的說法，顯然更是針對青少年。打造西門町所塑造的「敢於秀出自己」的青少年形象，由商品來快速提供。⁹³

國家要追求的是西門町經濟再發展、空間從衰敗中更新的目標，中途一度符合文化界或是社會團體的期盼，以打造自主的原宿創造表演空間的方式，並且結合地方商家來扭轉西門町意象，國家也透過具有符號操弄能力的資本跟媒體的配合，將本來在西門町八零年代就發展的模仿原宿次文化做為空間改造的主題。

再現與地景的再生產

⁹¹ 中國時報，2009/8/15，〈阿曼開發與誠品 聯手打造西區新地標〉。

⁹² 1995年開設的「萬國商場」或是1997年的「誠品西門店」，都針對青少年消費族群，在物質空間跟空間符號上，配合著青少年造街的系列活動，例如萬國百貨在1998年跟導航基金會合作舉辦cosplay活動(導航，2002)。

⁹³ 大型財團百貨業與速食業紛開始大舉進駐西門町商圈，且所有業態大都走年輕化路線。工商時報，1997/10/28，〈西區商圈大改觀百貨速食業紛進駐〉。

李明璁（2010）分析西門町在 1999 年以後的擬東京地景很重要的再生產機制乃是台日跨國製作的生活風格雜誌。透過雜誌對日本消費地景的想像，讓遊客也讓店家按圖索驥再製地景。然而西門町從 1980 年代之前開始成為青少年聚集的公共空間，並不只是做為一個商品交易的空間。電動玩具店、撞球場、泡沫紅茶店、賓館...，西門町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期一直是臺北青少年、或是從中南部上來的青少年的青春囚城。⁹⁴

但這些青少年的次文化元素在誠品或是《Taipei Walker》、《HERE！》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說，這些媒體所呈現、行銷的，是經過篩選的文化元素。而哪些次文化被接受、哪些被忽略或排除，在國家介入舉辦青少年造街的時候便已經形成。國家跟資本的一連串行動，可以說是為西門町的空間主題確立了一個比較利於消費的青少年形象。如 Mitchell（1995）所說的，把公共空間的差異，轉化成可以消費的多樣性。扮裝嘉年華、簽唱會，提供歡愉的活動，並且搭配商業進行的節奏。西門町從 1980 年代末夾雜在色情圍繞、青少年聚集、前衛的龐克想像的城市邊緣，轉化為一個保留這些多樣性，而變得更安全、乾淨，吸引消費者來看、來玩的娛樂消費空間。

媒體培養青少年消費品味，把某種生活風格資本化，餵養更多消費者的慾望跟想像，也引來更多大大小小的資本到西門町提供消費實踐。透過對日本影視情境的生活風格的想像（符號的生產者），創造西門町的文化消費活動。在西門町消費、身體展演（「奇裝異服」到了這個時期變成商業循環中重要的符號的傳播跟生產），大型資本在旁推波助瀾，尤其在 2002 年，「誠品一一六」在捷運站六號出口圓環開幕，在空間的視覺符號上，誠品一一六取代武昌街變成西門町的核心，而誠品一一六所標榜的「混種異質新人類」（開幕文宣，引自遲恒昌，2004）更成為西門町的中心意象，也是符號所要召喚的主體。

上一階段（1995-1999）打造青少年城市空間計畫，將青少年正當化為西門町的主角，原本從八零年代末延續少輔會，或是導航基金會打造青少年公共空間的目的，卻因為大力透過私人資本以及當地商家本來就有振興經濟的目標，空間的掌控在追求經濟利益的人的手上，青少年次文化符號化為空間主題，空間內部則是不斷鼓吹更蓬勃的青少年娛樂與消費。聚集在西門町的這些符號，召喚更多青少年前來，陳倩菱（2004）指出西門町整個空間跟簽唱會、商品的內容，本身就是召喚青少年主體的符號。

三、公共空間私營化

⁹⁴ 「青春囚城」為張大春（1992）由蔡明亮（1992）的電影《青少年哪吒》有感而語，另見侯孝賢（1992）電影《少年也，安啦！》。

從社區營造到商圈發展

西門町的再發展從 1995-1996 的青少年之城開始規劃徒步區空間，但是在落成後，西門町空間接著 2000 年是由經濟部商圈計畫來輔導商圈組織的成立。經濟部商圈輔導計畫把徒步區委員會轉型為「街區發展促進會」，並交由私人管理顧問公司（易展管理顧問公司）來承接執行業務。西門町在青少年城市跟徒步區的基礎上，朝向主題商圈、主題樂園式的青少年商業區。⁹⁵

西門町徒步區促進會主要由還留在西門町做生意的屋主參與，像誠品大型百貨公司也會派人開會，必需要是在地戶籍才可以參加。形成了一個掌控的機構，這個機構的目的，是要活絡西門町的商業環境，促進會的目的，非常清楚，即是促進西門町徒步區的經濟發展。

我們類似公部門一個單位，要召開協調會，例如要請文化局同意、交通局同意，也是蠻繁瑣的。要依法行事，我們也像一個外界來西門町辦活動的單位，我們不像他們是以自己公私營利為主，比較屬於地方性的發展。像西門購物結就是為了店家可以促進繁榮，聖誕節掛LED燈或粉刷油漆也是為了地方的購物環境美化，依照國際觀感比較網美好的購物環境。所以我們作這些事情出發點都是以地方為主。

這場武昌起義是誠品，它們每年十月都會辦音樂革命派對，也是跟她們談合作，等於這場活動可以納入我們的子活動，等於我們幫他們負責場地，那主辦單位是商業處，等於是我們的話跟文化局借場地就不用錢。等於是雙方互惠啦，我們當他們出廠地，他們只要掛我們的促進會協辦商業處主辦，**這些大家都是結合在一起為地方發展，帶來很多人潮。**

（Ls，訪談稿2009/12/29，粗體為本文強調）

但是地方實際的獲得利益者是誰？

我：這邊商家加入促進會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高：老的比較多啦，原因是流動性很高，那店家跟我有相關的才會加入，比如說警察取締這跟我相關，可是跟他不痛不癢的參與率就很低了，**不會像我們房東這麼積極**，所以我們也是希望多一點房東來，**因為假如這個地方我們弄的更繁榮，能夠跟市政府溝通，那這個地方可能會更新的更快，做的更好，那地價也會漲**，（房東也比較受益），對對對。

（G，訪談稿 2009/12/16，粗體為本文強調）

⁹⁵ 台北市都發局回市議會函，表示將西門町徒步區經營為一主題公園式的青少年消費空間。

誰代表公共利益？以目前的組織方式，促進會代表了最具正當性的地方公眾，但是促進會的成員並不多，西門町三千家以上的商家，大多數沒有積極參與促進會，也需要設籍在西門町的業主才可加入，實際上對於西門町佔絕大多數的外來商家根本也沒有開會或表決的權力。西門町的商圈繁榮所有商家都可以共榮，但實際上租金上漲，最大的利益者還是少數的房東。

不過促進會是否能代表「公共」，在從社區營造或是公共空間再造轉移到經濟部商圈計畫，也已經說明西門町的空間管理，當公部門讓渡權力跟義務給私部門，採取「公私合夥」的經營管理模式，讓渡的對象並非社區也非公眾，而是跟商圈利益最息息相關的地主、商家。

空間安排的邏輯

促進會擁有對台北市政府其他單位的發言權，也擁有徒步區空間最大的管理權，但是對促進會來說，組織的目的地是滿足西門町「商家」的需求，若非商家的商業利益，促進會並不會作優先考慮。如果非商業團體希望在西門町舉辦活動，促進會通常選擇併入商業活動妝點串場，或是請團體自行向文化局申請場地。

他們本來也想有一個舞台可以發展，可以宣傳他們的品牌或是有舞台可以發表，所以我們也剛有好記者會需要有舞者來開舞，就會連想說前面找街舞的，我們西門地區有兩三個協會吧，IP工作室就年輕人會來這裡創一個教室阿或藝青會藝術青年協會就逝去年才成立的，是在地一個作塗鴉的常常會教小朋友，會在西門町選店面噴漆，他們也會找我們合作，那能結合就結合，我們跟這些單位合作的話就可以省下這些費用。

(Ls, 訪談稿2009/12/29)

但是對於大型商業公司，例如可口可樂，就是促進會積極希望可以合作辦活動的對象。在這樣的篩選下，西門町當然就是一個充滿商業活動的空間。鄭建科（2003）以徒步區圓環廣場的座椅拆除為例，就是因為商家認為青少年聚集喧鬧，阻礙商家做生意，所以要求公部門將圓環拆除。在有權力對西門町公共空間說話的各類行動者中，並沒有人會為青少年堅持使用空間的權利。即便促進會也非常清楚青少年是西門町的主要族群，是辦活動的最主要對象，但是是將青少年視為西門町最主要消費者，針對正確目標，真正考量的還是商家的利益。

這些都是阿，當然主軸對象都要對阿。我們當然是以族群比例高的為優先。我們作整體商圈發展，在地店家大多屬性是年輕人所以我們當然是以大宗為優先考量。我們如果把經費花在小族群上，對店家助益不大。目的效益沒有

出來，就會被店家說擬辦這些活動幫到店家什麼？會受質疑。

(Ls, 訪談稿 2009/12/29)

反公共的空間管理

然而促進會最大的權力在於西門町徒步區空間、廣告旗幟的優先權。徒步區兩側的羅馬旗與座椅、垃圾筒都是促進會可以拿來轉包廣告獲益的來源，徒步區的公共空間由文化局管理，經由促進會申請活動不但是優先使用權，也可免除租金。由於促進會所安排的都是商業活動，因此西門町徒步區整個空間的使用，幾乎完全以商業活動為優先。

徒步區打造為舞台，但是即興演出卻消失了。在西門町街頭的即興表演，因為阻礙商家生意，要求促進會請文化局進行管理，文化局的街頭藝人表演辦法，必需要有執照，而且必須向文化局申請場地，否則在西門町徒步區未經申請場地將可受到警察驅趕、開罰單。然後文化局也擴大到徒步區、電影公園，公共空間的活動內容要跟文化局申請，因為文化局的管理政策，警方可以取締為申請的表演者，對街道的管理，讓即興演出的情況減少，⁹⁶

以前很多啦但是目前還好，現在可能越來越要求，像說場地他們隨便找一個地方表演可能會被警察趕，因為現在場地都要申請。像現在的街頭藝人阿以前他們來西門町找地方表演就好，音樂打開就唱歌，可是因為西門町本來就是比較小的地方人潮多很擁擠，他們只要表演就圍一圈人，像去年就有發生漢中街...只要有一團或兩團街頭藝人表演根本就無法走動，那邊的店家叫苦連天阿，每天都念說「那我怎麼做生意，前面都是人，都沒人要進來我店」，其實店家是不爽的，就會找上協會幫忙簽連署書由協會名義發文給文化局，說事態嚴重，請文化局好好管制街頭藝人展演空間。最後我們協調了半年了，很多展演空間的點，後來選了二十幾個點，分散的，我們不讓他們集中，因為之前好的地方都是集中在這邊，大家都在比大聲，人一多店家根本就是很慘。你要表演前要跟文化局申請。

(Ls, 訪談稿 2009/12/29)

這樣的空間使用機制，事實上便是淘汰了非商業性的活動，把許多想在西門町辦活動的非營利團體排除在外，至少幾乎不可能排的到六、日的精華時段。也就是西門町徒步區在 1999 年以後重回台北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間之一，卻沒有組織來監督西門町的公共性。

⁹⁶ 〈臺北市府文化局經管特定路段舉辦臨時活動申請須知〉

<http://www.culture.gov.tw/frontsite/cms/contentAction.do?method=viewContentList&subMenuId=30204&siteId=MTAx>

我：那這邊空間會有一些不是西門町店家的團體來使用嗎？比如說有一些青少年團體或學校團體...

高：有，像現在塗鴉就跟文化局結合阿，有時候像滑板族要辦活動也會自己去找場地。主要是我們年度活動下有空間他們才能夠，因為大部分都是禮拜六禮拜天，假如不是禮拜六禮拜天應該都很容易申請。

我：但是就是以促進會的行程優先？

高：對對，我們有年度的活動那樣。

(G, 訪談稿 2009/12/16, 粗體爲本文強調)

因此西門町空間使用機制，淘汰了青少年容易聚集、即興演出的空間特性，商業活動與簽唱會代替即興街頭演出。1995 年以「舞會」來象徵衝破政治對身體、集結的禁制，舞到西門町。現在文化局跟促進會以「活動管理」的角度，促進會的把關是不能阻礙商家做生意，文化局引進文化活動，合作的結果，的確是讓文化活動可以井井有條在街道上，形成一個受到重重控制的安排。在看似歡愉的街道上，有一層層組織（文化局、警察、促進會）控管著徒步區的集結行動。

Myrna Margulies Breitbart(1998)在工業移出經濟衰退的底特律，讓年輕人藝術創作結合社區的研究訪談，讓他們用藝術品來改造公共空間，Breitbart 認爲底特律夏天計畫，讓年輕人作一些訪查，這些資訊讓他們**拿回塑造意象的一些控制權**。街頭的「玩」可以變成草根企業以及年輕人對公共空間的鬥爭、塑造關於社區的新的集體意義。這樣的計畫，達到了**由年輕人掌握再現複雜的生命經驗的權力**，同時也可以賴以謀生、活化底特律的小社區。這個例子表示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年輕人是**有宣稱公共空間，並且掌有自我定義、自我展現，的可能的**。

但是西門町的改造，即便有台北市政府支持賦權青少年，鼓勵青少年用街舞、身體來佔領西門町街道，並且生產論述青少年文化助益西門町產業發展的論述。可惜的是，並沒有長久的計畫，不論 1985 年的徒步區示範計畫，或是 1995 年與 1996 年暑假寒假的計畫，即便都向大眾宣稱了西門町是青少年的，但是青少年並沒有持續定義跟再現的能力，所以很快這就變成了市場的利基。西門町是青少年的，幫資本準備好了舞台。一開始資本在背後配合著搭建舞台，接收這個空間轉化成果，大型看板廣告所宣告的青少年形象，都在百貨公司裡面跟小攤子由商品提供。

本章小結

Yoshimi (2000) 用「消費『美國』」來解釋日本都市空間的迪士尼化。西門町的舞台化，可追溯到 1980 年代台北青少年的消費「原宿」。對原宿的想像內涵是

舞台。1995-1996年導航跟陳水扁市府的打造青少年城市空間行動，也是意在從空間解嚴的「飆舞」，落實到真正的都市空間改革——將西門町轉化為一個青少年可以自主表現自我的舞台。是一個打造青少年都市空間的社會-文化-空間工程。⁹⁷

陳水扁上任後以「市民參與」、「空間解嚴」進行對公共空間再造的工程。青少年飆舞是挑戰、鬆動威權空間的符號。導航延續新生南路飆舞，也以青少年街舞活動，進行空間化的戰鬥。要以青少年的身體舞動，佔領西門町。因為市民參與的規劃原則，導航基金會在1996年獲得陳水扁市府的支持，主導西門町徒步區改造的計畫。

但是將飆舞移師到西門町，卻也必須面對西門町再發展壓力的脈絡。其一，從1981年救國團在西門町設立「蓮苑」開始，國家機器面對聚集青少年的西門町，持續進行青少年活動的監控。1980年代青少年在西門町環境惡化的論述裡，扮演了「既是無辜受害者亦是危險加害者」的角色。因此少輔會同時進行輔導與保護的工作，也獲得地方商業組織「促進會」的支持與企業的合作，透過控制或保護青少年改善西門町環境的髒亂與危險。因此，西門町與青少年的連結，有國家對西門町空間「控制」的歷史。其二，西門町經濟再發展的壓力，是西門町改造最主要的目的。1988年西門更新促進會組成爲遊說政策的地方團體，1995年以後的西門町改造計畫，台北市政府協調西門更新促進會、專業規劃公司，由導航基金會負責規劃塑造西門町街頭新文化。因此導航基金會的青少年造街計畫除了其所宣稱的要改造過度商品化的西門町青少年文化，也必須整合進西門町的經濟發展。1995-1999佔領西門町計畫，將青少年視爲西門町空間的主角，跳舞的文化元素卻同時是進行西門町整頓的手段。1994年以後，台北藉由青少年的舞動來改變，也藉由舞動掩蓋了西門町既苦悶又騷動的青少年文化。

透過星光大道的鋪面、徒步區廣場、舞台的架設，把徒步區舞台化，藉由把徒步區節慶化，這是跟飆舞一樣的方式。然而，同樣把西門町既有的青少年文化視爲需要輔導整頓，投注一個陳水扁市府塑造的青少年新形象。將由打造青少年徒步區的空間工程，活動的操作，分析將青少年做爲主角的過程，對於挪用、援引了九零年代以前醞釀而生的青少年文化，然而一方面受到快樂頌大火影響，從上任初期破解威權空間的節慶，透過挪移到西門町成爲正式的都市計畫，看似基進，事實上卻是重塑西門町青少年文化以及西門町秩序。

第三節指出了西門町的舞台化是透過公共工程以及大型零售資本的配合。打造舞台化過程商業資本的配合，尤其是誠品書店，展現了公共空間重塑文化過程架構文化元素的能力。舞台化的西門町，青少年是光鮮亮麗的舞台上的主角。但

⁹⁷ 當時負責西門町徒步區的都發局科長林欽榮語。見：中國時報，1996/2/6，〈西門町改造完工後 將公平分配給各族群使用〉。

卻被西門町則形成日趨穩固的再現權力組織，架空為符號。只能順著商業資本的安排在西門町活動，成為西門町 1999 年改造的符號，卻未能透過持續的組織或資源，透過西門町空間的自由使用表達再現自我。青少年並未獲得在西門町安排、再現文化的權力。



第四章 同志重返紅樓—公共空間的競逐

前一章已說明，西門町如何在國家的回頭下一步一步進展為青少年的主題商業區，儘管同志族群如青少年同是主流社會離開後的使用者，但兩者命運卻迥然不同，同志身影並沒有被進行空間改造的國家所挪用，其在西門町的主要活動場所紅樓戲院，以及與之相鄰的新公園，在陳水扁政府推行的「空間解嚴」政策下，紅樓戲院被收回並規劃成電影博物館，同志多年的隱微歷史未被論及，而新公園的重新規劃，卻扣上了臺灣同志運動串連的扳機。這一連串的衝擊與行動，形塑出同志族群與青少年不同的空間發展路徑。

1995年「空間解嚴」政策，包括總統府前廣場與新公園的規劃案，是陳水扁政府的指標性政策。總統府前廣場的重新規劃，試圖解除戰後國民黨政府長久統治下所凝固的威權空間，而先後由日本殖民政權與國民黨國族象徵所盤據的新公園，則以台灣歷史上重要的「二二八事件」重新命名，試圖平反長久以來被噤聲的人民歷史。然而，新公園在當時已隱隱成為臺北男同志「出道」與社交的重要場所，新公園規劃案因而引發一連串角力，觸及當時政治神經極度敏感的地帶，在此議題下所開啓同志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抗爭，立刻進入尖銳的交鋒。空間解嚴將博愛特區從威權解放出來，但是對新公園來說，卻促成同志族群的現身集結，不單將同志族群長久累積的文化資本帶入對公共空間的要求，也強化了同志團體的組織串連，彈起後來同志大遊行的前奏曲。⁹⁸

本章將以紅樓為主要分析場景，說明同志族群離開與重返的過程。一方面，當國家重回西門町，其排除紅樓戲院與西門麥當勞裡的同志族群，繼而在新公園規劃案引爆的同志串連，致使同志族群要求公共空間使用權（新公園、常德街事件夜行權）；另一方面，在私人消費空間（酒吧、三溫暖）的同志活動逐漸擴張，而其對公共空間需求的集結也轉而以消費空間（彩虹社區）展現，兩者進一步地在節慶式的集體現身（台北同玩節與同志大遊行）中，強化了同志與空間的連結。在如此背景下，終而累積而成同志重回紅樓的重要資源與條件，在紅樓戲院劃定古蹟後十年，西門市場再造頹然之際，同志以救世主之姿，重返當時黯然失色的紅樓，為西門紅樓漆上那過往隱微的七彩光亮。

⁹⁸ 關於1990年代臺灣同志運動的詳細發展脈絡，可參考《台北新公園同志運動—情慾主體的社會實踐》（謝佩娟，1999）中的整理。此外，許雯娟（2007）則從官辦「台北同玩節」的生產脈絡，指出2000年以後同志大遊行以及同玩節的同志團體組織串連，是1996年新公園同志空間陣線所奠基的基礎。

第一節 離開紅樓：同志運動與公共空間

「空間解嚴」也導致了同志運動的「空間化」。1990 年代同志運動的風起雲湧，來自前階段在文化場域以及婦女運動的累積（謝佩娟，1998），爾後發生「公民轉向」追求公民權益的平等（朱偉誠，2003）。但本文要指出，在 1990 年代晚期，由於空間解嚴的「首都核心圈規劃案」，引發同志團體的串連，抗議新公園的規劃未將同志的歷史與集體記憶作核心考量。1996 年初「新公園同志空間陣線」的成立，以及接下來常德街事件皆透過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抗議同志不平等的公民權。甚至 2003 年開始舉辦同志大遊行。同志運動的空間化並不僅於此。1999 年賴正哲於公館開設「晶晶書庫」開宗明義要以草根的社區工作者定位晶晶，將同志空間運動深入社區；再往前追溯台北市同志空間，同志酒吧的興起，原初便是要保護同志免於外界騷擾、異樣眼光的目的。本節從 1990 年代晚期同志團體跟國家的決裂與合作開始談起，回顧同志各種空間戰鬥史。

一、離開紅樓

(1) 對「公共」的質疑

儘管還有關於同志出沒的報導⁹⁹，但是 1990 年代初期，紅樓戲院已經從 1970、80 年代的同志聖地，變成以老年同志為主的空間。1994 年，國民黨中央黨部拆除事件引發危機與爭議後，「紅樓戲院」由臺北市民政局提報為列管歷史建物¹⁰⁰。1996 年，紅樓戲院在陳水扁的指示下決定保留，並且決定由市府收回全面展開更新規劃，原因是紅樓戲院十分具有保存與再發展的歷史文化價值，於是規劃案目標是使紅樓戲院不再破敗，進而有新生的功能與特色。¹⁰¹

一篇《聯合晚報》1996/5/23，〈紅樓戲院下月回歸市府懷抱 老市產淪為同性戀聚集地 市長勘查後宣布收回更新 民政局已報請列為三級古蹟〉的報導，可以看出在紅樓戲院拆除爭議又被提及的同志情事，並沒有被遺忘紅樓跟同志的密切關聯，但是在紅樓指定為古蹟後，「同性戀」的都市傳說，似乎就此終結。

⁹⁹ 聯合晚報，1993/5/30，〈「紅樓」情事再曝光 查獲四男〉。

¹⁰⁰ 參見：聯合晚報，1994/4/23，〈臺北有 20 處歷史建築物？〉。紅樓戲院的保存與否的爭論發生於 1991 年公聽會，參見：聯合晚報，1991/4/16，〈紅樓戲院滾滾紅塵前途未卜 更新會建議作電影館；財局則恐影響西門活力〉。

¹⁰¹ 參見：聯合晚報，1996/2/27，〈紅樓戲院 將告別破敗 歷史建築 市府 6 月底後收回重規劃〉，以及聯合晚報，1996/5/23，〈紅樓戲院下月回歸市府懷抱 老市產淪為同性戀聚集地 市長勘查後宣布收回更新 民政局已報請列為三級古蹟〉。

台北市政府的介入，結束紅樓戲院營業收回修復。也因此讓戰前整個西門市場的規劃現身。紅樓戲院收回以後，由台北市民政局管理，新聞局規劃做為西門町電影空間再造的一環。做為電影博物館規劃。紅樓戲院收回的時候，新公園抗爭正如火如荼的展開¹⁰²，也引發紅樓規劃的一連串爭議。

首都核心圈計畫觸及新公園的重新規劃，引發同志團體串連抗爭，爭取在重要公共空間的平等使用與再現權利。1996年初同陣成立，針對新公園的公共空間再造，提出同志在公共空間應該有平等對待，去污名，並且拿回性主體自我定義的權力。同陣與都發局隔空叫陣過程，紅樓戲院的規劃案也被牽扯其中。媒體猜測都發局要規劃紅樓戲院為同性戀俱樂部取代新公園，弭平同志對公共空間需求的抗爭，因而導致同陣與市政府隔空交戰。

為了避免模糊焦點以及與居民的對立，同陣澄清並沒有提出「同性戀酒吧」或「同性戀特區」的要求，「同志要的是每一處公共空間的使用權，不是要一個公設的「同志動物園」，讓異性戀者又來這個「特區」偷窺。¹⁰³」同陣並批評市政府的作法，是「進步卻去性化」的，其最終是打造另一個大衣櫃（引自謝佩娟，1999：219）。

關於公共空間的去性化，Fran Martin（2000）認為，從民進黨或是陳水扁市府追求自由的文化政治傾向而言，其對新公園的規劃無法單純視為恐同或反同的表現，她舉了都發局在面對同志空間陣線曾經提出要由官方資金設立同志俱樂部為例，認為陳水扁市府並非恐同，而是在把都市空間「公共化」的同時，對於什麼是在公共空間適當的行為有所界定。陳水扁重整首都公共空間以邁進全球化，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排除同志使用者，事實上是在追求市民城市的公共空間政策（打造市民的公共空間），並生產新的規則：公私區分的重要性。在公共空間中，被鼓勵的是中產階級的消費行為，非消費的情慾不該出現在公共空間。因此，陳水扁市府的都市空間改造政策，同時在生產「兩種同性戀」。

公共化的過程引進西方公私區分的概念，因此也同時帶著對他者的排除。所以，學生、失業者為主的新公園公共空間的情慾活動，被認為是不應該出現在公共空間的。根據 Martin 的分析，九零年代中期以後台北市追求全球化、以及民進黨追求開放的政治的氣氛，國家的公共空間重構並非恐同，而是製造了兩種同性戀概念。Martin 並指出，劃定公私界線也成為後續同志運動的競逐點。她並以趙彥寧的研究指出，同性戀把城市當作舞台而不斷強調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成為市

¹⁰² 1995年，臺北市「首都核心圈歷史城區」計畫，對新公園與總統府前廣場的規劃，引起臺灣首度集體公開現身的同志團體，爭取同志對公共空間的使用權與詮釋。並在新公園舉辦同志彩虹情人夢、提出同志版本的總統府前廣場計畫提案，在媒體上的曝光的效果，由同志團體宣稱公共空間的權利，宣稱新公園做為歷史悠久的同志地盤，...

¹⁰³ 聯合報，1996/2/1，〈紅樓戲院設特區 有志一同澄清〉。

政府公共空間的另類版本，並挑戰「性」是做為公民權的項目，而不該被排除在公共與政治之外。

陳水扁政府的空間解嚴政策要解放、打造公共空間，在「市民主義」的旗幟下，同志團體意識到同志這個公民身份，卻是相對迷你，同時「同性戀」的公共定義，也一直深受污名以及被定義。一連串後續的行動，同志團體的組織拒絕在「公共」、「市民主義」的大帽子下，忽視其被忽視的處境。也反對將紅樓戲院作為同性戀俱樂部的「荒謬想法」。紅樓事件的表態，更清楚突顯出同志團體的訴求，是同性情慾主體的基進認同策略。

國內二十一個同性戀團體二十三日晚在台大門口宣布成立「同志公民行動陣線」，並號召近二百名同志舉行嘉年華會，同志們用面具、歌聲、舞蹈、集體尖叫表達不再做「迷你」公民的心聲。許多人則首度在同志留言版上寫下「請勇於接受我們、承認我們」。

由於台北市政府承諾提供的四十萬元舞會經費跳票，原定在今年二月十四日舉行同志年度盛會|彩虹情人週也被迫取消，改由昨晚的迷你嘉年華會取代。主辦單位說，稱為「迷你」是因為同志的公民權長期受忽視，**藉著同志公民行動陣線的成立，同志要宣告不再做「迷你」公民。**

(中國時報，1997/02/24，粗體為本文強調)

(2) 反污名與自我再現的同志運動

陳水扁市府原先允諾了同志團體在市長官邸舉辦舞會，以及編列預算舉辦同志節慶，最終卻跳票了，而同志們也自立門戶，宣告跟陳水扁、羅文嘉「決裂」，「不玩政治遊戲」。同志團體爭取新公園的規劃參與，同時對於紅樓設置同志特區的謠言，加以否認也表達出抗拒的立場。這表示同志團體，從市政府的規劃手中搶奪空間的主導權。拒絕被安排，隔年「同志公民陣線」在台灣大學校門口成立，對於羅文嘉委屈的投書「我當同志是朋友，為什麼同志當我是敵人？」，表示主流社會不瞭解同志想要的是什麼，同志要向主流社會發言，而不再是接受主流社會的標籤與空間安排。¹⁰⁴

因此，在紅樓戲院結束營業以後，同志離開了紅樓，卻因為新公園事件與陳水扁市府決裂，走了另一條都市身份政治運動的道路。謝佩娟（1999）認為新公園同陣運動的道路選擇，基於1990年代同性情慾已被「公共化」為同性戀，同性戀與新公園在歷史脈絡下累積污名，翻轉此污名「唯一可行之路，是更為『公共

¹⁰⁴ 1997/02/15，中時晚報。

化』的主體打造論述 (ibid.: 77)」，同陣的運動內涵即是「重新打造新情慾主體發言的可行性 (77)」。

在跟陳水扁決裂以後，1998 年同志公民行動陣線聯合其他團體，舉行反污名大遊行。

鮮明旗幟、尖聲吶喊，百餘位台北市前公娼與原住民、同志等弱勢團體，於婦女節前夕在華西街一帶展開「反污名大遊行」，抗議社會所加諸歧視標籤。抗議代表以燃香戳氣球、點仙女棒、行動劇等儀式象徵「污名大平反，尊嚴亮晶晶」，轄區萬華分局派員警全程嚴陣以待，當地居民沿路圍觀，數度造成交通阻塞，現場好不熱鬧。

打著「娼妓不是壞女人」、「同性戀不是變態，愛誰我決定」、「原住民不是番仔，族群要平等」各式標語與口號，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台灣同志研究學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等多個團體，昨天為「平反污名」走上街頭，希望透過行動洗刷階級、性別、職業、種族、性偏好等社會污名。

(中國時報，1998/03/08，粗體為本文強調)

從新公園事件爆發後，並與扁羅決裂，同志團體一連串的行動，一直層出不窮，茲整理如下。

時間	事件
1995	首都核心圈規劃案
1996	許佑生婚禮、和扁羅的分裂
1997	「同志公民行動陣線」在台大成立
1998	和公娼、原住民一起的華西街「反污名大遊行」
1999	公館「晶晶書庫」開張

新公園事件後續行動，本研究整理

(3) 再度與政府合作：台北同玩節

從公共與市民主體的定義，同志族群挑戰臺灣性主體自我再現權力。這些行動也一直與公共空間息息相關，並延續到馬英九市府，同陣組織成員進入體制內，將過去行動整合而成華麗的台北同玩節。

對比於青少年與陳水扁的符號親近性，同志與陳水扁的決裂剛好也成為馬英九與陳水扁的區隔線，尤其是宣稱多元的陳水扁所排斥的邊緣群體，馬英九對同

志的支持或更可突顯其比陳水扁政府更具開放性。

台北市長馬英九昨(三)日下午出席台北同志國際論壇的壓軸好戲「同志運動圓桌對談」，他在開場時承諾明年還要繼續辦理「台北同玩節」，也已經在九〇年度預算中編列這個項目；**馬英九強調一個社會多元性的重要**，而多元社會應該要相互尊重、包容，這正是民主的內涵，**他要讓台北成為同志的新故鄉**。

在競選台北市長前，馬英九曾經主持過電視節目「小馬哥現場」，訪問過不少同性戀者，也從中了解不少同性戀者的想法以及他們所面對的困境與問題，**像是「常德街事件」**一直是許多同志心中的痛；所以，馬英九認為，維護市民基本人權是市府的責任，去年發生警察抄同性戀酒吧的事件後，他也告誡警察絕不能再做。

馬英九指出，民主的內涵就是尊重與寬容，大家應該要尊重與寬容別人有不同的性傾向。就是因為有這樣的認知，他才會支持民政局長林正修編列這筆預算；**馬英九承認這樣做是有政治風險**，但是，**市府願意容忍歧見**，**維護社會的多元性**，以經費、政策來推動同志公民權的爭取，就是這種理念的落實。

聽到馬英九以英文承諾這樣的活動空前但不會是絕後，明年還將繼續編列預算辦理的時候，現場掌聲不絕於耳、一片歡聲雷動，馬英九說，一年一百萬元的經費相較於二千六百億元的總預算，連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他要透過同志基本人權的維護，**讓台北成為同志的新故鄉**。

(中國時報，2000/9/4，粗體為本文強調)

將台北市塑造為對同志友善的城市，也的確助於馬英九的城市外交以及將台北市更加國際化的政績，這是同志運動的政治機會(許雯娟，2007：34)。

同志經過了1996年以後自我再現主體以及去污名的運動累積，已經不同於1990年代初期，具有足夠的文化資本以及組織、再現的能力，再度返回體制與馬市府合作，並未失去自主性。

許雯娟(2007)分析台北同玩節的動員與組織，她指出台北同玩節是從新公園抗爭事件的「同志空間陣線」的延續，應當視為是同志社會運動的一部份，也因此，儘管同玩節是官辦，但同志團體一直有著相當自主性，後來與市政府決裂的，亦由同志團體自行募款舉辦，顯示市府色彩並不濃厚。

二、同志空間運動的轉變：從公共到私人消費空間，再重返公共空間

(1) 台北市 gay bar 的發展史

隨著六零年代美軍駐防，中山北路國賓飯店一代的酒吧，美軍的娛樂以及性服務業，社交空間，也影響臺灣男女同志的認同形成與新興空間。美軍的酒吧、國際飯店，提供一個相對於臺灣社會戒嚴、白色恐怖高壓的安全的空間，美軍帶來了臺北市酒吧的興起，在「高等異己」的保護下，高壓社會中同志空間的醞釀萌發（趙彥寧，2001）。

1960年代的冷戰結構對亞洲國家同志發展的影響（趙彥寧，2001：73）。例如以「家庭派對」做為社交場所，而臺北市男同志酒吧的出現，也是受到美軍的酒吧影響，在這之前只有新公園、戲院、公廁，幽暗的公共空間。1960年 TAKE 在國賓飯店附近開了第一家男同志酒吧「香檳」，就是以美軍酒吧為雛型，也是臺北市開始出現男同志的消費空間（吳佳原，1998）。隨著男同志集體的浮現，男同志形象被圈外媒體勾勒出來，主要以變態行徑暴力刑案的報導角度，描繪男同志的面貌。（ibid.: 37）。在公共空間現身的不安全感以及敵意，讓男同志開設的消費空間提供了安全。

因為我們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在公開場合又不能談論這些事。有次有兩位老兄就在一家餐廳忘情地談起戀愛來，最後被別人以『人妖』、『兔子』打了一頓。也就是這種情況下興起我開『吧』的念頭。

（胡亦云採訪 TAKE，引自吳佳原，1998: 37）

我第一家就是「香檳」，我開店就立下原則，大家來喝酒、談天、交友、唱歌，其它免談，酒錢訂得不高，只要能維持店面就好，只要大家有個屬於自己的地方可以談談自己想談的事情，玩玩樂樂就好，想不到店一開就不得了，小小一個店，居然天天客滿。

（胡亦云採訪 TAKE，引自吳佳原，1998: 37，粗體為本文強調）

(2) 彩虹社區計畫及其論述

同志空間陣線的抗爭結果，並沒有改變新公園的規劃方向。陳水扁在 1998 年落選，因此首都新核心圈的計畫也沒有完全實現，只有新公園更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同志的空間鬥爭除了嘉年華式、節慶式的同志大遊行集體現身之外，也有著另一條走入社區的路線。Martin 指出，同志一方面發展出新的公共空間運

動的論述，亦即逃逸官方版本的公共空間規劃，把整個城市當作相互看見、塑造認同的舞台，另一方面則以私人的消費空間來補足同志空間使用的需求。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公館「彩虹社區」計畫，而晶晶書庫更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領頭商店。晶晶書庫於 1999 年開張，由曾經參與同陣新公園口述歷史小組的成員賴正哲所創辦經營。¹⁰⁵晶晶書庫標榜為一個「同志為發聲主體的空間」¹⁰⁶，比前一階段由 gay bar 所扮演的安全空間，更具政治基進性。

晶晶書庫選擇了獨立書店、獨立咖啡店林立，因此接受同志空間的可能性較大的台大公館商圈落腳。透過在一個街道的兩側租下三間店面，以懸掛旗幟、舉辦活動的方式，常態、或是節慶式的翻轉原先街道的意義。在街道這個公共空間，同志可以主動地對社區居民發聲或再現。晶晶書庫積極的進行社區內打造同志在公共空間內可以現身、發聲的機會，到 2000 年，更擴及聯合其他商家進行彩虹社區計畫。2000 年八月，晶晶書庫、同志諮詢熱線、以及兩家男女同志酒吧四個在地理位置接近的同志空間，聯手開始推動「彩虹社區」計畫。串連公館商圈三十個店家，一起在大門櫥窗前貼上「同志之友」貼紙，在收銀機前擺放彩虹地圖。彩虹社區計畫不是透過直接參與或是批判公部門的空間計畫，而是以私人消費空間的形式，彼此串連，而讓街道出現一種對同志友善的表現。

晶晶書庫與彩虹社區計畫，不同於前一階段 gay bar 空間營造零星的同志飛地，而已經是透過符號（彩虹旗、貼紙）在街道上各家店面的串連，在公共空間傳達同志存在並且應該要對同志友善、平等對待的主張。

(3) 同志大遊行的節慶式集體現身：被看見

2000 年，第一屆台北同玩節在信義區華納威秀影城廣場登場。

2003 年，公共電視拍攝《孽子》連續劇在「紅樓劇場」舉辦試映會，由同志諮詢熱線、性別人權協會等十多個同志社團聯合舉辦，在場外紅樓外的廣場舉辦「向資深同志致敬」的活動，指出紅樓戲院一直是資深同志跟年輕同志約會的「重要圖騰場所」並批評「從幾年前台北市政府的古蹟整修再利用計畫，「紅樓」的同志意涵便從台北市歷史消除」，因此在場外藉由「服裝」與「空間」重現當時的同志風貌，「重回曾代表同志精神的紅樓大戲院。」¹⁰⁷。

¹⁰⁵ 賴正哲於台北市公館台電大樓後方巷弄連續開設相關的晶晶同志系列空間：1999 年開設同志主題書店「晶晶書庫」，2000 年開設同志主題咖啡「晶晶咖啡」，2001 年開設同志主題藝廊「晶晶藝廊」。

¹⁰⁶ 賴正哲，2001，〈在浴缸裡不耐久候－同志書店「晶晶書庫」做為同志社區想像的開端〉，文化研究月報第五期。

¹⁰⁷ 2003-02-16/聯合晚報/4 版/〈回首紅樓 向資深同志致敬 劇場內 孽子首映 劇場外 同志團體復

但是對於紅樓跟同志關聯的宣稱，斷斷續續在不同的同志團體、運動出現。由白先勇《孽子》所再現的臺北同志空間，與同志團體對公共空間的宣稱不斷宣告的地點，新公園、紅樓、常德街一帶逐漸是同志歷史空間認同的重要地圖。例如在一篇名為〈打造無障礙空間 同志站出來〉的報導中（聯合報，1996/2/8）由同志本身發言，追尋了新公園跟紅樓戲院做為台北市同志聚會地點，但是相較於新興的 gay bar、三溫暖，紅樓戲院的同志活動記憶，依然是比較負面的，「每天下午二時以後直到晚上十時許，也有許多同性戀者到紅樓劇場看電影，在烏黑的電影院裡，男同性戀者就會互相愛撫、親吻，甚至還當場做出不堪人目的行為，將電影院變作同性戀者幽會的地方，嚇走了真正看電影的觀眾，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當時的紅樓劇場是同性戀者聚會的場所。」¹⁰⁸

2003 年開辦同志大遊行，路線經由西門町紅樓。後續同志大遊行選擇路線以西區台北車站、總統府的首都核心圈路線，或是選擇東區台北市政府、忠孝東路四段精華區路線。透過一年一度在重要公共空間的集體現身，自主地決定同志要如何被看見。

以下整理歷年同志空間行動對照紅樓戲院的規劃過程：

	紅樓	同志運動	地點或路線
1994.1	王墨林等藝文界舉辦「紅樓夢、西門情」文化活動，商請三級片停止播放一天，青少年原宿的想像		
1996	陳水扁視察紅樓戲院決定租約到期後市府收回經營	新公園同志空間陣線與都發局隔空對罵，新聞局長羅文嘉指出紅樓戲院更新使用非關同志權益；同陣則說同志要求每一處公共空間的使用權，不要特區	新公園（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1997	內政部通過紅樓戲院指定古蹟，《西門紅樓調查研究》，規劃做為電影博物館納入西門町電影空間發展計畫		

古秀風華〉

¹⁰⁸ 1996/2/8/聯合報/14 版〈打造無障礙空間 同志站出來〉

1997.8		同志公民陣線成立常德街專案小組爭取公民夜行權	常德街
1998.6	紅樓戲院動工修護		
1998.9	首屆臺北電影節會場之一		
1999.11	台北市文化局成立		
2000.7	西門市場大火		
2000.9		首屆同玩節	信義區華納威秀、台北市議會禮堂
2001.5	西門市場拆除，攤商抗議		
2001.9	紅樓整修完成招標委外經營	第二屆同玩節	台大舊體育館、新公園音樂台
2002.7	紙風車經營紅樓劇場，居民揚言抗爭市府漠視居民權利	第三屆同玩節	西門町徒步區
2003.2		同志團體在紅樓劇場「孽子」首映會場外抗議：「重回會代表同志精神的紅樓大戲院」	紅樓廣場
2003.7-8	十字樓開幕 67 攤商試賣生意差，有財團有意收購		
2003.9	市場處指攤商與「文化園區」規劃有落差		
2003.1	十字樓新西門商場開賣		
2003.11		第四屆同玩節	西門町紅樓廣場
		2003 首屆同志大遊行「看見同性戀」	二二八公園→西門町紅樓廣場
2004.1	十字樓改賣熱炒 100		
2004		第五屆同玩節	NGO 會館、新公園音樂台
		2004 同志大遊行「喚起公民意識」	中正紀念堂→凱達格蘭大道→二二八公園→衡陽路→西門町紅樓廣場
2005.9	台北市政府決定收回十字樓，與紅樓廣場一併委外經營		
2005		第六屆同玩節彩虹園遊會	西門町紅樓廣場

		2005 同志大遊行「同心協力 101」	誠品敦南店→忠孝東路→台北市議會廣場
		小熊村咖啡開幕	
2006.7	台北市政府收回十字樓		
2006		第七屆同玩節	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議會、華山文化園區
		2006 同志大遊行「一同去家遊」	松山菸廠→忠孝東路→華山文化園區
2006.9		DALIDA、G 樂園、同頑石開幕	
2006.11	十字樓市場處舉辦土雞推廣活動		
		同志驕傲月	
2007.7	文化局舉辦文化創意嘉年華		紅樓十字樓與南北廣場
2007.9	文化局北廣場 KUSO 創意市集		
2007.9	紙風車告別紅樓，文化局接手十字樓與南北廣場統一事權。「建立西門紅樓為文化創意產業平台、重振觀光人潮」的市府政策		
2007.11	正式委託文化基金會營運，重塑新定位		
2007.10		第八屆同玩節	紅樓
		2007 同志大遊行「彩虹有夠力」	國父紀念館→仁愛路→敦化南路→忠孝東路→台北市政府
2007.12		首屆 REDay 同志跨年派對	紅樓南廣場
2008.9		南廣場同志商家透過西門市場自治會租下南廣場使用權	紅樓南廣場
2008.9		2008 同志大遊行「驕傲向前行」	台北市政府→仁愛路→敦化南路→忠孝東路→台北市政府
2008.10		第九屆同玩節：我的同志好友	信義公民會館
2008.12		REDay 同志跨年派對	紅樓南廣場

2009.8		第十屆同志公民運動	西門紅樓
2009		2009 同志大遊行「同志愛很大」	凱達格蘭大道→愛國西路→中華路→忠孝西路→新公園→常德街→凱達格蘭大道
2009.12		REDay 同志跨年派對	紅樓南廣場

本研究製表

第二節 重返紅樓：同志的經濟機會

上一節我們已指出同志運動在 1990 年代的集結契機與發展過程，民選精英馬英九跟陳水扁的競爭，同志與陳水扁決裂，馬英九市府團隊營造支持同志的形象，甚至引用了陳水扁「台北新故鄉」的政治訴求，要打造同志的故鄉。馬英九在同志或是公娼等陳水扁引發爭議的公共議題上進行相左的選擇，也累積了比民進黨更開放的形象資本。如此的政治機會，讓同志運動有著飛快的進展。在本節，將把視線拉回西門町紅樓，說明其最終成爲同志空間的具體過程。

紅樓戲院的更新是台北市政府重要的規劃案，尤其是文化局成立以後的代表作之一。而鄰近的西門市場更新則受到紅樓規劃案的影響，經濟結構受到衝擊。紅樓更新案的第一個轉變，是「文化」忽然成爲最具正當性的價值，拯救了西門町；第二個是隨之而來對原來西門市場原有生態的破壞，產生了經濟縫隙，也改變了權力關係。這一節將從紅樓再造形成的經濟條件開始，分析被排除的男同志如何在新的條件下重返紅樓。

一、重塑紅樓的文化計畫：經濟結構的轉變

張立本（2006）曾分析寶藏巖聚落保存運動，描繪出台北市 1990 年代中期以降的公共空間政策，她精確地指出了文化在這之中的優先性，成爲台北市追逐的資本。於是，過去充滿爭議的市政衝突，頓時都可以透過「文化」兩字得到解決。公共空間政策的「文化化」的現象，也影響了都市社會運動策略的發展。但是，張立本也寶藏巖爲例指出，如此「文化論述」雖然成功爭取寶藏巖社區做爲藝文聚落而保存下來，但是對於社區居民來說，原本運動的初衷，集體消費的需求，卻依然無法因爲文化政策而滿足。

紅樓的規劃案則比寶藏巖早了好幾年，在文化局成立之前，市政府便已經收

回進行調查¹⁰⁹，不過陳水扁時期所規劃的電影博物館方案，在台北市文化局成立以後做了更改，但綜觀兩者的規劃，與其說具備明顯的文化經濟政策，其實更像是處在藉文化政策進行歷史記憶鬥爭的階段，經濟效益只是附屬的。

(1)「文化」進場

西門市場在中華商場拆除後也面臨整建，依照原來規劃，紅樓戲院亦陷於拆除整建之列。1993年發生國民黨黨部拆除事件，引發外界對歷史建物的關注，這間接促成1994年由藝術界發起的拯救活動，為紅樓戲院保存而請命，並且期待以「文化特區」的方式保留再生，同時受到當時台北市長候選人的支持，趙少康提出蘇活區的政見。¹¹⁰

陳水扁上任後，將九零年代初期對紅樓戲院拆除或保留的爭論¹¹¹迅速拍版定案，不視保存歷史建物為西門町再發展的阻力，反認定保存下來的紅樓戲院在適當的規劃更新後，可以與西門町的再發展作結合。1997年，市政府民政局委託李乾朗進行研究，並進行修復工程，戰前的西門町市場才於焉現身。

紅樓電影博物館的空間重構，是「尋找西門電影空間」文化產業振興計畫的一部份，試圖用「空間改造」來重塑西門町意義並接合經濟再發展。1998年開辦「臺北電影節」¹¹²與西門町地方商家合作，在西門町打造「電影大街」、「新天堂樂園」等地景，來推動「台北的觀光價值」。¹¹³古蹟保存同時也是陳水扁跟國民黨政權進行區隔的政治宣示。¹¹⁴

1998年陳水扁敗選而馬英九上任，文化局於隔年十一月成立。首任文化局長龍應台變更電影博物館的規劃，選擇以戰後上海劇場的歷史做為紅樓的新主題，設置「紅樓劇場」，「文化局表示，紅樓的願景希望是藉由說唱藝術的引入，結合餐飲、茶館的經營方式，成為台北市有特色的餐廳戲院，容納多類型的藝術活動，也豐富西門町的文化生活。」¹¹⁵以「零預算」請紙風車劇團自負盈虧經營¹¹⁶。2002年9月，「紅樓劇場」的開幕是台北市的大事，

¹⁰⁹ 提報為三級古蹟後，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997年委託李乾朗教授進行調查，才把戰前紅樓的面貌重現。請見：李乾朗，1997，《臺北市西門紅樓調查研究》，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¹¹⁰ 民生報，1994/11/28，〈紅樓殘夢 西門留情 歷史縱深需要記憶空間 焦點邊緣想要文化特區〉。

¹¹¹ 聯合晚報，1991/4/16，〈紅樓戲院滾滾紅塵前途未卜 更新會建議作電影館；財局則恐影響西門活力〉。

¹¹² 由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文化基金會、電影圖書館合辦。

¹¹³ 參見：聯合報，1998/4/10，〈首屆台北電影節 中秋開映〉。

¹¹⁴ 聯合報，1998/11/30。

¹¹⁵ 聯合報，2001/9/16，〈展演說唱藝術 紅樓將委外經營〉。

¹¹⁶ 〈偉大的城市，必定是文化的城市〉，《台北畫刊》，第416期。

(2)「市場」退場

西門市場的改建案，在 2000 年七月發生火災後加速進行。原來的攤商應市府要求組成「新西門商場股份有限公司」，與市府簽約在改建後的西門市場經營。2000 年大火後十字樓修復，馬英九表示西門市場更新，將與古蹟活化和西門町商圈活化結合，規劃把西門市場改建為複合式的嘉年華市集，瞄準青少年次文化，開闢專賣青少年物品的賣店以及主題式的戶外開放空間¹¹⁷，2003 年七月十字樓部份開幕。

西門市場我們首要就是開放更多公共空間，讓不同使用者青少年老年都可在邊使用。第二，怎樣讓商圈活化，有個限制就是西門町太小了，所以希望讓他活化到西門市場這邊，所以基於這樣的角色來講，西門市場也是從商圈再發展的角色來作。所以我們引用像波士頓昆西市場，變成商場的規劃配合古蹟...

(徐燕興，引自《西門市場百年滄桑》，2002)

這個市場改建計畫是仿照美國波士頓昆西市場 (Quincy Market) 的再發展計畫(江宗霖, 2005)。Faneuil Hall Marketplace 是美國建築師 James Rouse 跟 Benjamin Thompson 的作品，他們把具有歷史的昆西市場轉型為複合型的零售商場，設計結合原有歷史意涵和迪士尼風格，使這個市集獲得巨大的成功，第一年開便吸引了一千萬的觀光客，跟迪士尼入場人數相當。不像傳統購物中心有大型的商店，昆西市場以販售獨特性商品的小商店為主，同時，市集強調「吃」與娛樂購物同樣重要。「形象是重要的，而且他們被藉著歷史或建築主題統一。不是瞄準一般大眾，他們瞄準特定的市場：有錢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的成人。」James Rouse 複製此經驗到巴爾的摩、紐約 South Street Seaport 和邁阿密等地。1985 年的〈都市規劃〉期刊稱其為「房地產的羅賓漢」¹¹⁸，亦被讚為「城市的 Rouse-ification」。(Hannigan, 1998: 53)

市政府的西門市場的再發展計畫，仿效波士頓的昆西市場的再生。嘉年華式的複合商場並不延續傳統市場的販售內容，而是接到西門町的青少年文化與商業文化。然而，西門市場更新案卻受到空間規劃不當，以及攤商轉型不成，而左右了其成敗。

修復過後的西門市場空間恢復至戰前的面貌。戰前西門市場原是十字樓為本

¹¹⁷ 參見：聯合報，2000/10/11，〈西門市場 浴火重生 發展局自辦規劃更新 嘉年華商場雛形具現〉；聯合報，2001/8/27，〈西門市場更新 開步走 將打造成複合式商場 明年五月完工〉。

¹¹⁸ *Planning* (1985, May)

體，八角紅樓是市場的入口，周圍廣場則由第一賣店、第二賣店與第三賣店所圍繞。然而，修復後紅樓劇場卻與十字樓分開經營，中間的通道也被擋死。因此，攤商既被納於十字樓內部，卻又無法自正門進入，空間動線規劃不良以及事權分離，讓西門市場的更新難以成功。

除了改建後的空間不利於攤商經營，更重要的是西門市場規劃案要求攤商轉型，卻不加以輔導而任其自生終而自滅。既無法有效吸引新顧客，亦失去原先綜合市場的販售內容，原來消費族群失卻了購買動機。一度以海產熱炒店的形式獲得經濟上的成功，卻又引來市場管理處認為不符合「文化廣場」的名稱，而在 2006 年遭市場處解約。解約後市府重新招商，由文化局在 2007 年接手十字樓，文化局變成西門市場最大的主管機關，市場管理處負責管理的僅剩臨內江街第一賣店。第一賣店留有堅守的原攤商，共五十六戶，嘗試過以辦活動的方式，如在南廣場舉辦簽唱會等方式希望吸引西門町的消費者，但因為第一賣店後方地點隱密，很難獨立於西門市場生存，也吸引不了成都路對面西門町的過路客，承租戶紛紛以「合作經營」的模式，將店面轉租，造就了 2003 年到 2006 年間，南廣場聚集各式各樣的創業的個體戶，手機店、創意商品、手工藝店、理髮店等等。¹¹⁹

「紅樓劇場」是西門市場改建後被著重凸顯的新象徵，也衝擊著西門市場的生態。紅樓本是西門市場的入口，獨立做為古蹟經營後，與後方隔離，十字樓的新西門商場難以獨立生存。

斷掉了，就在這一百年之後就把它切掉了，完全就不是市場，完全就用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古蹟來作定位了，完全沒有市場的功能。就是這一點我覺得最可惜的。因為一個地方你竟然沒有辦法延續，而且這個地方作傳統市場，不一定會失敗，因為你沒有讓他有機會作阿。政府應該鼓勵市場管理處或發展局，政府來輔導，你們這些人都還是繼續作，但是不要再做以前那些髒亂的方式，用比較現代的方式來處理。但是雞鴨魚肉看是要到別的地方租個廠房，來的都處理好，就是弄得很明亮很乾淨，媲美現在的超市，那超市是一個公司在主導，這裡是很多人在一起弄，那個氣氛是不一樣，你可以試著輔導他們。各式各樣，但是擺設、廚餘要進步，可以用個方式讓他們來，示範嘛，既然是第一個市場，就是要讓它，生鮮的、養生的，比較好的，現在講求養生、有機嘛，可以試著從這個方向來作。你來作作看阿，這個作不起來，真的是傳統市場轉變為比較棒的市場沒辦法作起來，那就認了，那就把它作古蹟、文化產業，這個OK的！他不是，他完完全全就是不想朝向那條路來走。

(H, 訪談稿2009/05/28, 粗體為本文強調)

¹¹⁹ 訪談稿：H，2009/6/11；B，2009/5/8；Ts，2009/5/21。

你有去看過你就知道，為什麼人家美國可以去接續那個部份，像波士頓昆西市場是沿用「市場」這兩個字，我們這邊居然是不要的，不要市場這兩個字，希望是西門商場這些很怪的名字。

(H, 訪談稿2009/06/11, 粗體為本文強調)

(3) 文化經濟

2007年，西門紅樓與紙風車合約到期以後，文化局決意讓西門市場整體都轉由文化基金會經營，對於西門市場空間的利用，也明確定位為文化產業空間。因此，在指定古蹟後，一連串向「文化」傾斜的政策後，最終讓原來的西門市場面貌消失，重現為戰前的空間，也中斷了市場的百年歷史。由文化基金會簽約經營的階段，從空間的文化化後也更進一步「空間文化商品化」，除了以文化產業為核心，發展為觀光商城，以文化商品取代了原本西門市場的商品種類。¹²⁰

文化局自96年5月3日起自台北市市場處接管十字樓及南北廣場，事權統一整合下的西門紅樓，96年11月正式委由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營運，並積極重塑西門紅樓的新定位，從營運前的閒置狀態到10月起北廣場之「kuso西門町創意市集」，再到固定周末辦理之「紅樓創意市集」活動，有效活絡十字樓成為西區文創產業基地。¹²¹



紅樓變成品牌

- 文化创意產業育成中心
- 十六工房，租給本國創意品牌進駐
- 紅樓廣場則舉辦假日創意市集。
- live house「河岸留言」

(4) 文化最大？

因為我剛提到文化最大嘛，她把文化帶進來，就把西門市場這個部份就壓縮下去了。那時候把它定位為紅樓劇場，後來要改成西門紅樓還打電話問我，會長我們現在想要改名字你認為改什麼比較好？西門市場他們打死不可能啦，後來改為西門紅樓。**據我瞭解他們不希望市場兩個字。**

(H, 訪談稿2009/06/11, 粗體為本文強調)

¹²⁰ 西門紅樓官方網站，<http://www.redhouse.org.tw>

¹²¹ 全文見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新聞稿，2008/11/4，〈「西門紅樓風華再現了嗎？」邀請市民朋友一探究竟〉。粗體為筆者所加。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文化如何逐漸成爲公共空間的正當性論述。西門市場早在戰後就開始醞釀等待公部門改建的計畫，直到 1980 年代國家對西區進行重大交通工程的再發展，西門市場在中華商場拆除後也準備拆遷。紅樓戲院在 1991 年還在爭論存廢問題，財政局依然持著其阻礙經濟發展的立場，然而，1993 年國民黨部拆除所引發的古蹟保存運動，提出以文化資產的概念保留紅樓戲院，被後來市長所採納。

陳水扁任內對於歷史空間的保存，在社區營造下的古蹟保存，擴增台北市非國族、非清朝的古蹟。例如北投溫泉、迪化街等。設置與在地歷史文化相關的博物館。文化局成立以後，負責古蹟空間活化。當時臺北故事館、台北之家，以及紅樓戲院。台北之家或是紅樓戲院的活化，生產歷史敘事，可以看到不同政權的選擇。馬英九認爲台北之家應強調戰後的美國大使館歷史，龍應台對於紅樓戲院也選擇了戰後 1949 年以後的劇場歷史。莊雅涵、王奕婷、吳偉立（2004）曾指出，馬英九與龍應台的文化空間政策是在歷史化被陳水扁抹除的外省人集體記憶，提供熟悉的慰藉。

文化資產最終成爲可以抗衡創造性破壞（改建）的正當性論述，特別在陳水扁政權以後，扁、馬競爭著台北市的歷史重寫與文化框架。從電影博物館或是紅樓劇場的規劃可以看到其思維，對「文化」的想像侷限於其欲連接的特定歷史敘事，不管是電影產業或是戰後中國移民歷史，卻忽略了被整頓的對象—西門市場—正是戰前所延續下來的百年歷史。「文化園區」的思維把「文化」當作藉由吸引非原使用族群的「其他台北市民」的工具，而達成淪爲都市邊緣的西門市場與紅樓戲院重回主流社會焦點的目標。

西門市場以「文化」取代「市場」，卻在意義上是搭建在新興文化經濟之上，以及兩個政權塑造台北市集體記憶與文化正當性的競爭，取代了活生生的人民歷史與生活方式。不管從戰前日本經營者手中接手店舖的台灣人，或是戰後移民到西門市場打造家園，六零年代以後城鄉移民到台北的討生活與居住，卻弔詭地在九零年代中期以文化之名保存歷史建物以後，無法納入官方所選定的歷史敘事，擠落一旁。

除了西門市場攤商以及附近的居民，紅樓戲院與西門市場的改建，還忽視了男同志這個使用族群。在第三章已提過，新南陽戲院結束營業後，同樣鄰近新公園與臺北車站而播放二輪片的紅樓戲院，便成爲男同志的新據點。1970 年代以後，西門町的核心地帶北移，西門市場與紅樓戲院成爲西門鬧區的邊緣地帶。對於主流社會來說，西門町的中心移往峨嵋街、武昌街，相較而成邊境的西門市場，卻是邊緣群體的中心。

西門市場保留火鍋店與老人茶室，紅樓戲院則是男同志的新中心。當國家要把西門市場更新活化，以及承租戶商家們所期待的，便是重回主流社會的中心。在國家的整頓想像中，這些老人與同性戀對於空間的使用權，阻礙了國家更期待與欲求的使用者（或消費者）來使用這個空間，透過對空間的整頓以及空間敘事的重構、空間活動的安排，國家排除了跟「沒落」、「邊緣」連在一起的使用群體。

原承租攤商殷切期盼的改建更新計畫，終而在 2003 年開幕，卻反而結束了市場的生命，終而排除了原承租攤商與居民。有趣的是，如此結果卻又成爲攤商與同志合作結盟的條件，結合的契機。

二、同志與紅樓相互轉化

剛剛我們從紅樓戲院的古蹟活用以及西門市場更新案，分析「文化」與「市場」兩個因素的相互消長，同時也說明了國家的文化發展計畫所偏好挪用的文化元素跟族群，然而攤商並未被消滅，堅持留下來的攤商擁有市場優先承租權¹²²，這個制度上的條件，對於之後的情勢發展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小熊村咖啡館，給被視爲全然失敗的西門市場更新案新的希望。因此，接下來我將具體指出，在西門市場既存的文化經濟結構，如何倒轉了同志跟攤商的關係。同志社群如何連結其，而在此結構條件下將文化資本變成經濟資本。

在 1990 年代以前，「同志」是被污名化的符號，但 1990 年代的同志運動，扭轉了污名效果，也積累了同志的文化資本。這些連結與累積，展現在西門市場的更新過程中，是同志連結全球的文化以及操弄再現的能力，其能符合文化局的需要，也藉此轉變了攤商形象。

(1) 同志進場：經濟結構的縫隙以及同志的文化需求

西門市場的改建失敗後，西門市場轉以整個以文化產業爲發展方向，剩下的第一賣店的攤商只好紛紛轉租，因此第一賣店也形成了一個經濟縫隙，在過渡時期有各式各樣的個體戶店家嘗試開店。其中也包括了男同志店家。

新西門商場跌跌撞撞，西門市場僅存第一賣店西門市場整個轉以文化經濟發展後，留下來的第一賣店也無法以原來的方式生存，紛紛轉租。如上述，無法獨立吸引過路客，因此即便經過努力掙扎，第一賣店的商業活動無法恢復熱絡。同志商家在第一賣店後段因爲西門市場轉型失敗的縫隙下進駐

¹²² 西門市場的產權是有爭議的。根據攤商表示，有些房屋是購買的也一直在繳稅，結果卻變成市政府所有。

根據小熊村 David 的訪談，2005 年他會選擇在南廣場開店是偶然，他發現紅樓南廣場有許多店家在出租。¹²³因為南廣場的地點，其他類型的個體戶生意並沒有太成功，反倒因為同志商家特殊的集客性質，也就是仰賴族群的口耳相傳或是社群網絡，而非依賴過路客，因此可以把同志族群的消費者吸引到南廣場來。其中位於角落的一家咖啡店「小熊村」在 2004 年開張，憑著同志的社群網絡，成為「熊族」的聚集地，又因此成為有名氣的同志空間，吸引更多同志前往紅樓南廣場，部份來訪的同志可能就跟著到此開店。同志來這裡開店最近的近因，是「小熊村咖啡館」在同志網路社群的名氣，原本是一般咖啡店形式的小熊村，因為在網路上宣傳吸引很多「熊族」同志光臨，當時在南廣場有另一家同志所開設的髮型屋，例如曾經開石頭藝品店的 Ts 就說會找到這個地方開店是因為：

朋友認識阿。我進去覺得這個地方不錯就問他，他這地方很熟，作頭髮的更久，比小熊村更久。...我就剛好我爸爸有一些石頭，...那時候我也沒賣飲料，那時候我就天天去看，那我很喜歡那個地方，我是先進去的，沒多久 Dalida 也找到了，他們就在我隔壁開，他們要開飲料店，後來 G 樂園，也在我隔壁，...

(Ts, 訪談稿 2009/5/21)

同樣的例子，現在「Dalida」的老板 S、T 也都是因為「小熊村」而找到店面：

其實就是小熊村，...當初市政府要規劃一個商場，還有蛋塔店阿什麼都有全部都倒，儼然就是蘭若寺，一些奇怪的店。之前我來的時候還有賣飯糰的阿、剪頭髮的，是有一些戶外咖啡廳，可是都沒生意。我們來也是因為聽說小熊村在這邊開一個茶店生意還不錯，也都是同志會來...

(S, 訪談稿 2009/11/16)

(那像一般的店生意作不起來，你們做的起來是因為...)

因為自己的人脈阿，同志人脈阿，外面人真的走不進來。這也是很殘酷的事實。

(S, 訪談稿 2009/11/16, 粗體為本文強調)

原先的空間破碎隱密而於攤商的生意，如今卻成了有利的隱密空間，對於不想要身份曝光的同志來說，是很適合碰面的社交場所，成為同志聚落的最佳條件 (T 訪談、B 訪談、Ts 訪談)。2006 年中秋，同時三家新的 gay bar 開幕，隔年夏天，已經人聲鼎沸。Gay bar 的形式也讓本來不來西門町的同志，會來西門町，開創不同於地下室內 gay bar 的空間形式，提供社交的空間，同志的社群網絡與其所需的隱蔽性克服 (或曰恰好接合上) 了南廣場不利於集客的性質。

¹²³ 網路廣播：真情酷兒—在紅樓看到小熊村，<http://www.im.tv/vlog/personal/459143/1794833>

在同志商家陸陸續續在紅樓開店之後，也漸漸意識到自己對紅樓的經濟生態重要性：

（問：那跟這邊不是 gay bar 的店家關係怎麼樣？）

很好阿。他們也因為我們生意變好。

（Li，2009/5/16）

我很多客人特別是剛開始，來找我的時候都會說，我好久沒來西門町了，他們就覺得西門町，他們就東區的。有次在路上遇到一個客人，他走過來，我說嗨好久不見，他說，「喔..喔我不是住西門町的，我住東區，我很少來這。」他趕快這樣撇清，我想說有必要這樣嗎，這還蠻妙的。

其實我現在發現一個很好玩的東西，特別是這個廣場店家這樣聚集出同志商圈之後，其實路上同志越來越多，特別是西門町，以前西門町都弟弟妹妹阿，可是其實西門町很多同志的店，包括我們商圈造就了這樣的人潮，他們會覺得習慣來西門町，其實對西門町也很大的助益。

（S，訪談稿2009/11/16，粗體為本文強調）

（2）攤商與同志的合作結盟

紅樓的攤商們受到同志店家的影響，跟著一起改變¹²⁴，H 亦有意識地體認到其不同於政府規劃的對象，自稱為「西門市場自治會」，而不願採用官方制度上指定的「西門商場管理委員會」。

因為有些地方會變他們政黨的競技場，這是最可悲的，會把他們當成比大比小比勢力的場所，這樣會影響地方的發展...。明天他們要來了，臺北市的教育委員會五六個議員要來視察，看文化基金會辦的怎麼樣，也有可能這邊有編經費需要議員的背書，要來看。目前現況看下來都很符合他們的需要，他們也不用付過多的租金，又可以很輕鬆的在這個地方做生意，生意做的越好當然會越線啦會有一些爭執難免的，都要一一去克服。其實我們對外很清楚是說原有的攤商跟經營者是用合作經營的關係，在這個地方作經營，我也很清楚告訴攤商我們這邊勢必要作一個轉型，你們租金方面希望給他們一些優惠，現在要做的是要怎麼樣可以共存共榮。

（H，訪談稿2009/06/11，粗體為本文強調）

¹²⁴ 變成說我們這一排也要隨著它而改變，我們就試著改變。（H，訪談稿 2009/05/18）

然而，攤商跟同志的合作，並不是沒有波折。除了經濟上的生存壓力，的確有攤商因為對同志的印象不好，不願意租給同志。但又因為同志開店以後，看到不同於原本有階級預設的同志印象，而改變意願。攤商們為了生存，必須與同志店家合作，因為只有同志店家做的起來：

（會因為這邊生意做起來了，對同志比較客氣一點嗎？）

這是真的，**以前房東不租給同志**，同志不租，你那邊介紹來的一定是同志，就這樣講。牡丹那邊本來開飯糰店，**非同志，就做不下去阿。才願意給同志。**

（Ts，訪談稿 2009/5/21，粗體為本文強調）

（剛進來的時候周圍都不是同志商家嘛，會不會有排斥的情況？）

其實一開始會的，就是因為大家會排斥會有一些意見，所以才促成他們同志想要進來的慾望。他們就是認為說我們進來之後，有些人認為你們進來了他們就要離開了，讓他們更有機會進來，慢慢就變成他們的圈子，他們就用這個方式，到後來也會變這樣，變成說後面全部都是GAY BAR還有附屬的，內衣褲阿、健身用品、寫真集，慢慢就會進來。**那這個區塊以後會變成他們的區塊。你假如不是同志，你在這個地方很難有生意，很難生存。**

（H，訪談稿2009/05/18，粗體為本文強調）

那是我們原來承租戶，它以前是理髮廳，幫男生理髮的，後來轉型...，但是她當初也跟GAY相處不好，之前還是會長，吵架，不太能夠認同。後來漸漸在說服他，漸漸就開始認同了。

不然沒生意阿，都GAY來嘛。他就很氣阿，GAY生意那麼好我都沒生意，就很排斥阿，吵架阿。GAY也不理她阿，所以相處不是很好。後來目前是她那家還有最後面那邊一家咖啡店不是GAY，其它都是。猴樓亭也不是，電梯旁邊也不是，暹羅隔壁那家也不是。這四家不是。

（H，訪談稿2009/05/18，粗體為本文強調）

當初就是很排斥阿。

（比如去年一起辦「紅樓謝謝你」活動的時候...）

不關燈，不配合。這個市場慢慢累積一些能量。她今天能有辦法在這地方生存第一她沒有租金的壓力，第二就是因為她開的比較早，有固定的客人。GAY把它營造成這樣的情形以後，**她多多少少也接了一點觀光客。她的營運狀況是成長的，所以後來就不堅持自己一些想法。**...她沒有辦法融入會影響到她後續的商業成長。

（H，訪談稿2009/05/18，粗體為本文強調）

也因為透過公部門對口的攤商自治會，得以聯合向文化局承租廣場使用¹²⁵，同志店家也取得攤商領導人的認同跟信任：

要把這個地方弄熱鬧很簡單，其實你就放手讓我們後面那些人去作就好，一下就搞起來，我們後面那些人才。你相不相信？...我昨天晚上想到一個問題，他們以後有可能辦世界性的同志大遊行，絕對有可能你相不相信，亞洲同步的話就不得了了喔。未來這邊一定是觀光客朝聖的地方。

(H, 訪談稿2009/05/18)

攤商自治會跟同志店家的關係，是在目前紅樓的政治與經濟情境下的合作，依賴彼此取得生存。西門市場自治會依賴同志店家在南廣場經濟成功的範例，免於文化局的政策消滅西門市場的歷史。而同志店家也需要依賴攤商自治會法令上的合法性與優先權，獲得同志空間維持的穩定。

更有趣的是我還當會長，那邊還歸我管，我不是同志阿。為什麼有辦法融入，這是策略阿，最重要是要瞭解公部門他們想要什麼、忌諱什麼，這是這個地方能不能成功最大的原因在這裡。

(H, 訪談稿2009/05/18)

三、同志轉化空間的再現

2006年，台北市政府因為新西門市場計畫失敗，已經決定由文化局統一事權。隔年，文化局極力把西門市場轉型為「西門紅樓」的「文化創意園區」，並納入新的台北市經濟發展計畫。如此奠基在文化經濟之上的開發計畫，其實與想像和論述能力有密切關係。西門市場的攤商，在這個文化經濟計畫下，因論述能力不足而無法保留其原有經營方式。相較之下，同志酒吧老闆的論述能力，其將同志酒吧連結到國際觀光旅遊的能力，甚至比文化局的想像規劃還要先一步，也因此在這個新文化經濟計畫，徹底翻轉了同志跟攤商的地位。

(1) 打造同志跨年派對

「五、四、三、二、一，新年快樂！」跨年夜同志不孤單，西門町紅樓廣場昨晚齊聚了上千名同志共同倒數迎新，新年第一秒鐘，上千顆繽紛彩色氣球隨即升空！

¹²⁵後面那個廣場跟政府租的阿，我一個月給他們五萬塊，跟文化局租的。跟他們承租南廣場。今天會長如果不是我也不會成功阿，你只要會長反對的話他們也很難啦，（我：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他們不是直接承租戶嘛？）政府直接對我，單一窗口。（H, 訪談稿 2009/05/18）

(聯合報，2008/1/1)



圖一 2009/2010年同志跨年派對海報

2006年下半年，紅樓南廣場已經聚集三家以上的同志酒吧，以及髮廊、服飾店各種同志個體戶商家。其中Dalida的老闆之一，有鑑於各家跨年活動分別舉辦有點可惜，沒有好好善用廣場的功能。由S發起，徵詢其他店家老闆，促成了2007年底第一次的跨年倒數派對。¹²⁶

其實第一年的時候，我並沒有給自己建立那麼大的...其實第一年我很擔心我很害怕，但我就是抱持著第一個就是場地這麼漂亮，捨我其誰？你去JUMP這種搖頭店或是FUNKY這種小部隆冬的店去跨年絕對沒有這邊爽，這邊是戶外，那個氣氛絕對是熱絡絕對是棒，我就是這樣的理念下去，我就是這麼棒的場地給妳看你們要不要來。當然我們也作宣傳，網路的宣傳，第一年的宣傳真的全部是自己來，還蠻可怕的。去年一直到十點的時候都還沒什麼人我都好緊張喔，後來十一點一到，人潮湧進，整個廣場塞滿，我就這樣子嚇死了。

(S，訪談稿2009/11/16)

在紅樓廣場的同志跨年派對，在西門紅樓這個台北市政府近年戮力經營的重要公共空間，同志商家自行設計、辦理，聚集同志們在此現身。大張旗鼓的跨年派對對比起 1980 年代同志在紅樓戲院的優幽暗影，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一年一度的同志跨年至今已經舉辦過三屆，成為紅樓例行的活動，也轉化了紅樓的意義。台北市文化局在 2006 年接手整體西門紅樓（含廣場）空間後，採取文化創意市集積極重塑紅樓的意義，然而在文化局紅樓的規劃與展示中，同志的

¹²⁶ S，訪談稿 2009/11/16。

歷史卻一再被忽視。甚至有同志店家探問承租紅樓空間（今「河岸留言」）也遭拒。¹²⁷直到同志店家們在南廣場的聚集引起對「同志經濟」的矚目¹²⁸，文化局把南廣場的同志商圈文化納為西門紅樓的「多元」意義之一，以這樣的說法做為政績。¹²⁹

紅樓的同志跨年活動，透過商家在同志網站或其他通路宣傳，「同志跨年」得以傳播出去同志跟紅樓的連結，也藉由每年一度的聖典，將全台甚至國外同志帶入紅樓，由跨年派對再度將紅樓轉化為 2000 年代的「同志聖地」。主辦的同志商家也很有意識要用跨年活動，累積同志對紅樓的認同感。

譬如說同志大遊行我們這五家店就有這共識阿，那其他店家就沒這共識阿，他們就覺得反正你們就是會來。那我覺得其實每年跨年，**為什麼跨年一定要辦？**跨年吃力不討好耶真的很可憐耶，經費那麼拮据，然後各家店我也沒有說多賺你一筆，我去年還賠錢。**重點是什麼，大家對紅樓每一年有新的認識，有新的歡樂的感覺，他們就對紅樓又多一份愛（笑）。**可是這個東西是只有我一個人再想，當然牡丹也很配合，是最配合的，澀谷步道、K house也OK蠻配合的，其他都..呵呵喝。就沒那個很窄，眼光很窄。

（應該說也是你這樣一次一次辦活動累積就會變成讓同志對這邊有認同感。）

多少阿一定會有阿，我都不希望只有辦一年一個跨年，我希望每個月都有一個活動，一個月一次滿月派對，希望能夠弄到這樣子，可是就是路還很長。

（S，訪談稿2009/11/16）

同志跨年活動被吸納為「西門紅樓」辦理的活動，並不減同志辦活動的自主性，反倒顯示了西門紅樓的經營發展上，依賴了同志群體對紅樓的意義塑造。

（2）連結了四海一家的同志社區想像

¹²⁷ 破報，2008/10/16，〈張燈結彩，異同尋歡—追溯一段紅樓同志聚落的脈絡〉：「當這裡沒什麼人的時候，它（文化局）也不管你，但是當生意好了就開始收場租費。」S提到去年再度舉辦跨年派對時文化局搶著分一杯羹的心態時，顯得有些無奈。「像河岸那塊地也是，...，我之前也有透過其他人接洽，但是他們害怕同志 pub 進入古蹟內所以被擋下來，官僚體系還是不能提到『同性戀』三個字。」小靖則提到一樓有間異國餐廳明明就靠同志作生意，遊行時請他贊助卻以「生意做不到那邊」拒絕，吃飽走人的態度讓人不敢恭維；對於異性戀價值觀充斥的公共空間來說，紅樓內廣場欣然成為同志們自在走出衣櫃的現身場所，那種夜幕低垂時霓虹燈五顏六色的歡愉與南區相比，頗有另一股彩虹社群之風味。只是對於政府文化單位還有吝嗇店家而言，一嘴油膩還不買單的吃相，實在是無禮數。

¹²⁸ 2000年起台北市每年六月有「同志驕傲月」各項活動，2007年媒體特別報導紅樓廣場形成的同志商圈，並且為文討論同志經濟。見：聯合報，2007/6/18，〈同志驕傲月 Hight 出 4000 萬元 台灣，同志酷男消費聖地 500 餘外國人來台 異想派對瘋狂夜 百貨跟著搶商機〉。

¹²⁹ 例如 2008 年為紀念西門紅樓一百年的台北市文化局出版的《西門紅樓百年故事書》，把同志酒吧聚落的風景，稱為紅樓的多元文化混雜用途。但如第二章引述 hm(2002)的讀者投書，文化局的規劃一直都沒有把同志納入其中。

2006年中秋節開幕，但是S他們在半年前就進去了，開幕的有G樂園還有 Dalida，我那時候叫做童頑石，賣石頭，那時候這一年其實做的不好，到2008年元旦完就沒作。我做了一年，然後一年以後2007年中秋就改作飲料，叫做「幸福の二丁目」。（我：是因為新宿那個嗎？）對阿。

（Ts，訪談稿2009/05/21，粗體爲本文強調）

同志大遊行與同玩節，一次一次的培力讓行動者獲取意義，還有全球同志旅遊的想像、泰國東京舊金山同志區的想像、同志旅遊做爲經濟基礎，大遊行也是觀光的基礎。

西門町本來就一些同志的三溫暖，就這個區塊，就少了一個 disco 啦，如果這邊有個同志 disco 的話這邊就是一個很棒的類似 SOHO，類似泰國的 Papon 啦，Papon 他們可能就同性戀 disco 區在這邊，然後酒吧區在另外一條街然後都在這個 area 裡面，我覺得蠻有趣的阿。而且我覺得西門町就是應該是個 SOHO 應該是個 Papon。有這個條件，但是西門町就是沒落嘛，但是現在有在起來，那我覺得西門町還是很多可能性。

（S，訪談稿 2009/11/16，粗體爲本文強調）

（3）與紅樓戲院的難言之隱

雖然從七零年代開始，紅樓戲院跟新公園都是主要的同志活動空間，即便在紅樓在市政府計畫下轉型爲古蹟，而終止了男同志在紅樓的活動歷史，但是從新公園抗爭事件，到孽子場外抗議，都斷斷續續在宣稱紅樓跟同志的歷史關係，紅樓在符號上，「同志精神」¹³⁰，西門町的三溫暖還有新公園依然是聖地，雖然主要的同志消費空間已經在東區的 gaybar，但是這個活動慣性，對空間的認同感，也還未消失。S 的回答，解釋了對於紅樓跟同志的關聯，對來開店的同志店家來說，有曖昧矛盾的態度：

以前紅樓戲院就是當年同志到處找地方認識人嘛，釣人嘛，紅樓戲院那時候放A片嘛，放A片的地方就容易會有這種人去躲阿（笑），所以當初紅樓戲院也是一個有這樣的歷史，同志釣人的地方，就像新公園的廁所一樣（笑）。（這邊會這樣會開在這邊或是說開起來，跟這個歷史是個偶然嗎？或是巧合？）我覺得是巧合，這只是巧合。有，有想到這個東西，可是不會去... 一個思考的主軸。

（S，訪談稿 2009/11/16，粗體爲本文強調）

¹³⁰ 聯合晚報，2003/2/16，〈回首紅樓 向資深同志致敬 劇場內 孽子首映 劇場外 同志團體復古秀風華〉。

因為那個東西我覺得是一個不好的歷史回憶。當然是一個歷史傳承，但那是
不好的回憶。第一個就是在放 A 片的電影院裡面認識朋友不覺得很可悲嗎？
就是老鼠嘛地洞裡面嘛，就是那個是個不好的回憶。今天我們在這邊看到的
是一片光明的廣場，不是黑暗的角落，我覺得那個東西不一樣。當然會讓人
家有那個聯想。我覺得這是好事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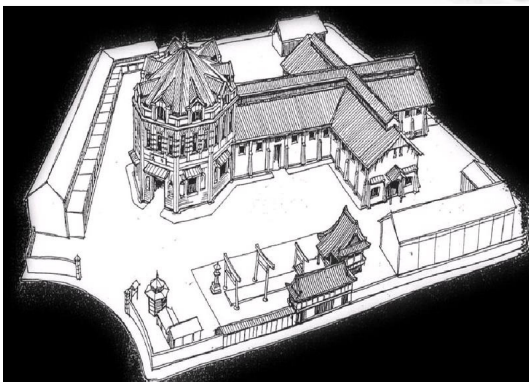
(S, 訪談稿 2009/11/16, 粗體為本文強調)

第三節 重塑公共性

Mitchell (1995) 在〈公共空間終結了嗎？〉一文中，以舊金山人民公園抗爭
的困難，指出在公共空間的公共性的消失，同時他也提出一個判準：公共空間是
否可以被各種群體透過使用該空間、宣稱該空間，對公眾展現自我，用來再現自
我 (for representation) ？來決定其是否有政治上的基進性？

我們從幾個面向來看紅樓南廣場在同志店家群體打造下，是否成爲一個同志
得以自我再現的空間：

一、南廣場的空間性質：半公共空間



圖二 這是戰前西門市場的空間透視圖，上方爲
南廣場，下方爲北廣場。北廣場是目前假日紅
樓創意市集的空間，除了左上方「第一賣店」
（北廣場側的賣店已拆，稻荷神社在美軍轟炸
時炸毀），其餘爲臺北市文化局所管轄。第一賣
店沿著漢中街、內江街則在 2004 年修復改建爲
二層樓商店，由市場處管轄。現在第一賣店除
了市場入口處幾家商店，幾乎轉租，後半段賣
店跟南廣場就是近幾年新興的臺北市男同志酒
吧聚落。

紅樓廣場在西門市場整建後重見天日，但是由於紅樓孤立於西門町之外，廣
場在 2005 年以前一片荒蕪。但是西門紅樓做爲台北市文化局重要的再發展歷史空
間，加上捷運站出口，其公共空間的地位實屬重要。南廣場地點隱蔽，做爲同志
社交的聚落提供了安全感，但是南廣場卻又緊鄰著紅樓文化創意市集，也緊鄰著
西門町熙攘的人潮。隨著紅樓的發展過路南廣場的人都可以接觸到這個公共空
間。也因此，同志在南廣場的聚集現身，沒有「入侵」原爲異性戀空間而遭受反

彈¹³¹，反倒可以自在自為地展現給公眾。

其次，一段時間以前，南廣場並非只有男同志酒吧，而也有女同志聽聞想要加入同志聚落的行列共襄盛舉，¹³²即便零落的女同志酒吧已經收攤，¹³³但是在南廣場，並非只有男客，女客為數不少，甚至其中夾雜的非同志商家（例如原來攤商所開設的咖啡簡餐店）也有固定的異性戀、家庭客人。

南廣場的商家們並未在廣場明顯告示「這裡是同志酒吧區」，但如受訪者 Li 所說，別人一看就知道，而不知道的也同樣會進來比鄰而坐，形成南廣場排他性並不是太高的氣氛。¹³⁴

我開在這個地方，大家都來，我覺得這樣很好阿。很融合。這邊的人在幹什麼，你在外面看的一清二楚，（意指很清楚是個同志空間）。同志文化在這裡。
（Li，訪談紀錄 2009/05/16）

不要去設定什麼，但是這裡當然同志會有歸屬感，是要作一個對同志友善的空間，但是這裡沒有人帶是不會知道的，連我也不會，這些女客，都是同志來的，都是同志的朋友。
（Li，訪談紀錄 2009/05/16）

受訪店家也會特別強調南廣場的同志酒吧聚落，形成的是「對同志友善」的空間氣氛，而非同志專屬的排他性飛地。這也跟南廣場位居西門町重要又便利的交通樞紐，以及台北市難得一見的廣場露天酒吧區有關。

這個空間定義我們當初當然是以自己客層來建立一個同志的環境，這是第一個，但是建立之後其實很多異性戀他們來，可能是朋友介紹，特別是老外他們特別喜歡戶外，因為台北就真的沒這種地方，他們就很嚮往，其實很多異

¹³¹ 除了對西門市場原來的攤商有這意味，但是同志是西門市場經濟解構的救星，並非以入侵者的姿態受到敵意。

¹³² 引自破報（2008/10/16）：Hitch Boite—小靖於今年八月開張的拉子酒吧—是這裡唯一一家專屬女性的小天地。「女生一直沒有進來很怪耶，...，之前是有聽說有一個 T 在二樓中間賣鹹酥雞，不過一兩個月之後這個鹹酥雞 T 就消失了。」戲稱這裡是「招待所」、只有朋友才知道的小靖辭掉幼稚園老師的工作，和樓下男性內褲專賣店頂了二樓的空間，大概是想釐清對於同志運動「負擔暨責任」的情緒，加上 Bistro 或八號等等幾家拉子酒吧不是關門大吉，就是在大環境壓力下不得已開放男性進入，矢志成為紅樓內第一家拉子 bar。「其實女同志（活動）是從南區開始，那時候的幾家酒吧現在只剩下搖滾（看守所），...，看到這裡就覺得要進來共襄盛舉。」之前才與其他拉子派對團體舉辦好好節的小靖，熱血沸騰地希望其他女同志趕緊進來。

¹³³ 已經聯絡不上曾在此開店的女同志店家，但根據男同志店家 S 的說法，是女同志老闆私人原因而收攤。這樣的個人因素的資訊並無法獲得更具結構性的解釋，本文的資料也無法加以分析論述。但是清一色由男同志商家存活下來，勢必是一項值得進一步探究的現象。

¹³⁴ 另外其他受訪者 S、Ts 也都表示同樣的觀察。女同志的參與是這家店家表示也很驚奇有趣之處。

性戀老外都會來，他們來都會覺得開心，因為這邊不像gay bar的環境那麼crusing，這邊就是很relax，你不必跟隔壁桌聊天阿，隔壁桌也不會來騷擾你，這樣其實是很舒服的。

(S, 訪談稿2009/11/16)

南廣場的公共開放空間特性，也不同於以往的同志空間。特別是同志以往總是被限制在公園的「黑暗王國」、地下室酒吧，南廣場是首度形成在被視為「正當」的公共空間的同志聚落。

對阿其實這邊開放公共空間對同志，特別是台北的同志，我覺得是一個..大家不用躲地下室，不用怕被警察抓，因為早年去新公園還要被抓。今天這邊就是一個這麼這麼正面的地方，我們就是一般人阿，我們可以在陽光下喝咖啡，為什麼不行，我們為什麼要躲在地下室，這邊有一個很正面的東西出來。

(S, 訪談稿2009/11/16)

(來這邊的同志會有這種感覺嗎?) 有歸屬感啦一定是有的阿。

(外人會知道是一個同志的地方，可是不是警察會去抄，一個很正當的地方?) 對阿就是這樣子阿，覺得就是很正面，我覺得我們也是慢慢的，這是亞洲獨一無二，這邊的條件，這種畫面到全世界，連巴黎都不見得做得到，還蠻棒的。

(S, 訪談稿2009/11/16)

二、以自我再現改變污名

我開在這個地方，大家都來，我覺得這樣很好阿。很融合。這邊的人在幹什麼，你在外面看的一清二楚，(意指很清楚是個同志空間)。同志文化在這裡。

(Li, 訪談紀錄 2009/05/16)

同志商圈整合進 2007 年以後「西門紅樓文化園區」的再發展計畫，形成文化局、攤商組織、同志商家三角關係。同志本是西門市場認為沒落的指標，同志與攤商兩個群體之間從衝突到合作，有改變同志污名的效果。同志有文化資本，在西門市場這個地方也因為其網絡而具有因為有挽救西門市場經濟的能力，所得到的權力。同志從 1980 年代、1990 年代做為沒落、陰暗角落的指標，在 2005 年紅樓轉型之後，變成恢復紅樓榮景的重要行動者。

對照 H 描述 1980 年代的同志聚集在紅樓戲院的情景，以及現在南廣場的景

象，同志在 1990 年代以後的確以消費力轉化了部份的污名¹³⁵。更關鍵的是，當西門市場攤商因為文化經濟的結構而遭淘汰，同志接合「西方」的消費形式更具競爭力更易於被追求國際化的城市政府所接受。對於因為接合全球化不及而慘遭淘汰的市場攤商而言，男同志在此經濟結構下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成為與 1990 年代以前互相對照下，改變污名的起點。

其實七八零年代的同志真是不堪入目，都是那些沒結過婚的男人，比較中低階層，廚師啦、在餐廳打工的啦，都是以此些作工的居多。

(H, 訪談稿2009/05/18)

那時候我記得一二十個有啦。後來就漸漸發展到三溫暖，互相看身體嘛，有休息的地方就發展出同性戀...。後來這個戲院沒有了他們就轉到板橋。**比較中下階層**的同性戀找戲院，找不清場的，**沒錢的**就聚集在那邊。漸漸的健身中心就成為另外一個屬於**中上階級**的領域。最重要是因為這批人都有到**國外去留學**，所以受到西方同志文化的影響，所以漸漸就把這個風氣帶進來。

(H, 訪談稿2009/05/18, 粗體為本文強調)

那時候都中下階級，還沒有中上階級，有也在地下啦這種事情本來就暴不了光。這幾年因為年輕人到國外留學，有gay bar阿，有同志生活圈阿，台灣人就**把風氣學回來了**。後面佈置營造也都跟國外gay bar學的阿。

(H, 訪談稿2009/05/18)

這個區塊是目前西門町發展的最迅速的，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沒有人想到的，我們這邊的朋友跟我們講說無心插柳柳成蔭阿。誰會想到他們在這裡，你不要小看他們喔，他們現在在找住的地方，假如讓他們找到的話，那個房子是最貴的喔平常人買不起的喔。

(H, 訪談稿2009/05/18)

但是除了階級的變化，對在地攤商來說改變既有的印象，更重要的是男同志商家與男同志族群，在南廣場上的符號佈置或是集體現身，就如同晶晶書庫、彩虹社區，主動地將男同志的身體姿態、社交文化對公眾展示，也不同于侷限在台大公館商圈的使用者屬性，而是在更加主流、更多人口匯集的西門町得以使用南廣場對外發聲。

透過在公共空間的存在，男同志不但在台北市民的視野裡變得可見，重要的是以自主的呈現方式被看見。在南廣場舉辦的慶典、跨年活動，也透過文宣品或是媒體的廣告，不再是被動地被媒體用暴露行蹤的方式對大眾呈現。

¹³⁵ 如賴正哲對晶晶書庫的論述。

三、對同志社群的責任與連結

從 S 的談話，抱怨破報以外的主流媒體，除了講同志經濟以外，只會報導負面的新聞，以及他把跨年這種盛事視為同志社群再現的成功（例如，可以在 FNAC 放上「同志派對」的 DM）而不單純只是經濟。¹³⁶

紅樓商圈也並非只是單純的消費空間。店家會組織起來參與每年一度的同志大遊行，也會受到外界同志群體的監督或壓力。也有店家自己認為有對社群回饋的責任。

可是他們今天就是忽略到今天同志大遊行單位跟我們之間互相的觀感，譬如說昨天阿哲過來找我，他說還好今年紅樓有你去拉DM，不然你們紅樓一個都沒參加，一家都沒來參加你們紅樓真的就是形象很差。一個是形象，一個就是那你賺gay的錢為什麼你不能回饋gay一些東西？這是很直接的，那同志大遊行是這麼簡單這麼明白直接的一個回饋同志的一個行為，他們都作不到。而且一個人才出幾千而已耶這麼少的錢都不願意。後來只有牡丹、我、澀谷步道、Alley Cat，就這五家，沒了。

（S，訪談稿2009/11/16）

（應該會一直延續下去吧？）

會阿，只要我還活著（笑）。特別是每年跨年的時候，連辦這兩年阿，每次都忙得焦頭爛額，可是就會覺得很開心。一來是成就感，二來是覺得自己人生做了一些事情，我的朋友常說你完蛋了，以後同志要出什麼歷史一定有你的名字，同志議員一定是你在選。最好玩的是，我在看自由大道的時候，我真覺得我好像他喔，卡斯楚街不就這邊嗎？辦活動好像快要變我了好可怕可是我不要（笑）。

（S，訪談稿2009/11/16）

本章小結

隨著 1990 年代晚期的「空間解嚴」，同志團體串連的抗爭，凸顯出國家「以

¹³⁶這個當然是我們希望有多方面的宣傳廣告，不要讓同志族群的地底下，譬如說我覺得說一個同志活動能夠在 FNAC 貼海報是很正面的事情，因為我們是作正面的活動，不是作搖頭、賣藥的。

（S，訪談稿 2009/11/16）

公共之名」的恢復空間公共性行動，卻是不公平的公共性。同志團體因而發展出同樣以「公共空間」做為主要戰場的反污名平權行動。除了 1998 年與原住民、公娼其他邊緣群體聯手反污名大遊行，接下來與接任的馬市府合作，透過同玩節、同志大遊行不斷翻轉 1980 年代被污名化的「同性戀」定義。1980 年代同志遭受透過對性主體以及空間的污名，1990 年代以後則是透過在公共空間的不斷自我再現，向公眾宣稱同志的存在，要求社會的平等對待。

同志族群一次又一次運動的累積，也不斷逼近紅樓。從同志大遊行的路線、同玩節舉辦地點到商圈的成型，同志商家在紅樓轉型過程的經濟縫隙，與被擠落邊緣的攤商形成合作關係。將紅樓南廣場「同志化」，形成與國家文化經濟計畫對紅樓意義重塑相抗衡。在國家戮力將「西門紅樓」定義為文化創意產業中心之際，同志也在黯然離場十五年後，風光重返紅樓。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關注的經驗現象，是台北市舊市中心西門町從戰後的發展到 1980 年代台北市結構變遷的變化，到 1990 年代晚期以後再發展，經濟再發展以及公共空間重塑兩種動力，形成青少年跟男同志聚集的重要空間。本文追溯西門町的歷史，發現青少年與男同志成爲要角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歷史根源；戰後的暗流在 1980 年代空間變遷時凸顯出來，而於 1990 年代受到國家再發展計畫跟資本投資產生互動。爲什麼青少年與男同志兩種邊緣群體的空間成爲西門町 1990 年代晚期以後重要的再發展現象？

要回答這個問題，本文將西門町 1994-2010 年的變化視爲都市再發展過程中公共空間的變遷，借用 Zukin 對都市更新過程房地產商挪用文化爲基礎的理論，來嘗試理解西門町地景的轉變。本文透過 Lefebvre 對空間本體論的三位一體的概念，尤其 Lefebvre 以「空間的再現」與「再現空間」的對立概念，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將空間當作生產工具而對各種差異群體的生活空間造成影響。這樣的理論架構，適用於處理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力量對文化的挪用跟穿透。Zukin 的研究展示了中間的機制，並且將行動者概念化爲生產者跟構設者的區分，批判性地理解「文化」在扮演當代公共空間變遷的角色（也就是空間的再現支配再現空間的機制）。而 Mitchell 對當代公共空間的重新概念化，提供了觀看當代公共空間的角度。Mitchell 凸顯在當代公共空間迪士尼化的趨勢下，各種群體關於吸納跟排除的鬥爭，是公共空間的動態發展，充滿差異互動跟安全娛樂的兩種公共空間思維也辯證地在生產著當代真實的公共空間。本文以 Mitchell 對當代公共空間的定義，差異的群體是否可以在公共空間組織政治行動、自我再現，檢視西門町青少年跟男同志這兩種邊緣群體角色濃厚的公共空間的改造後果，是文化經濟的運作或是有具有政治基進性的例子。在這樣的理論觀照下，本文認爲都市空間變遷除了政治經濟力量，特別關注邊緣群體的行動。也就是國家跟資本以外的行動者，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一、西門町特殊情境

本文首先回溯西門町戰後發展的歷史。從戰後市中心的建立，分析政治經濟的力量造成的影響。本文也指出移民的歷史跟戰後統治者區位的延續，政治經濟

的集中，塑造了西門町的中心性。西門町的中心性，如 Fischer 的次文化理論指出，也吸引了次文化群體的形成跟不斷加入。從次級資料跟報紙報導的分析，戰後的西門町在主流的看電影、逛百貨公司休閒活動以外，也是嬉皮、同性戀等「妖形人物」聚集、現身的空間。1980 年代，台北市的空間結構產生巨變，這也顯示了政治與經濟資本的來去會深刻的影響都市空間的轉變。西門町發展為市中心後幾十年，由於政治經濟力量在東區建立了新的中心，吸納更為全球流動的資本跟商品，也帶走都市中產階級。這樣的變遷，深刻地改變西門町的地景。西門町文化上的中心性被取代，轉變為以青少年、勞工階級、其他邊緣次文化群體的重要活動空間。在台北市主流朝向全球化的經濟發展的「邊緣化」，是西門町 1980 年代地景。本文也指出，1980 年代的西門町地景，正由單幫客組成的經濟所支撐。不甘西門町發展「停滯」，企業、小地主跟地方政治精英也在 1980 年代末期組織促進公部門進行都市更新。

1994 年的台北市政治變遷，是台北市特殊的都市動力。1994 年到 1998 年陳水扁市府以「空間解嚴」之名展開一系列公共空間的改造計畫。尤其在傳統政治象徵中心的首都核心圈、西門町，更是重塑新台北市民認同的重要空間範圍。這樣的政治結構條件，加上 1990 年代房地產資本相較東區的貧乏，西門町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的再發展，處於一個特殊的政治經濟條件下，讓都市邊緣群體有機會成為公共空間塑造的重要行動者。西門町在 1990 年代晚期獨特的情境，突顯出公共空間生產過程空間的再現與與邊緣群體再現空間兩股力量交鋒的機會。

二、公共空間迪士尼化的過程

在本文第三章指出了西門町從的幾個轉折。本文從陳水扁市府打造青少年主題城市的西門町改造計畫，指出青少年與飆舞是陳水扁進行空間解嚴重要的符號。陳水扁市府一系列在台北市公共空間的飆舞解嚴行動，最後在與社會團體導航基金會合作下，成為改造西門町的都市計畫。空間解嚴將過去的偽公共空間重新賦予主體的政治與文化行動，展示在國家支持青少年「反客為主」，為西門町街道的主角。陳水扁的政治選擇，有讓青少年「反客為主」的後果。

但是本文也指出，陳水扁的空間解嚴政策、塑造公共空間，實則在 Mitchell 所分類的迪士尼化的公共空間，也就是主要以公私合夥的形式提供安全、適於公眾的公共空間規制；透過對青少年的「馴化」，將差異性整頓為受控制的多樣性，並經由「誠品」為首的大小商業資本、媒體在將西門町舞台化的過程，將差異性轉為商品選擇與陳列。

Martin (2000) 分析以新公園的例子分析陳水扁的公共空間重塑政策，即指出

公共空間追求的是符合自由主義傳統的公民，亦即進行新的公／私區分的規制。本文同意這樣的觀點同樣適用於西門町徒步區的改造，即便青少年徒步區的確藉由青少年跳舞的政治象徵，做為空間解嚴後的新符號，但同時仍在劃一條新的規制界線，區分公共空間的新正當符號，跟需要排除掉的。在塑造公共空間在政治面向上，「跳舞」是陳水扁公共空間概念中反抗獨裁威權的象徵。因此，打造青少年城市空間活動，實際上是整頓了 1980 年代蓬勃的青少年次文化，凸顯西門町青少年文化歷史中跳舞/反威權的意象，而清除色情、電玩等其他青少年次文化元素。

本文也指出另一個公共空間的面向，將街道乾淨、安全、明亮，舞台化也是具體由新的資本來提供。西門町的「舞台化」實質上是整頓西門町空間，在舞台化的過程，青少年只是舞台上的主角，西門町的公共空間卻逐步由陸續加入的商業資本掌控，配合搭建公共空間舞台的商業資本，也反客為主的成為塑造西門町再現的主要構設者。陳水扁的公共空間重塑，留下伏筆，也是西門町文化經濟的雛型。空間解嚴將青少年賦予主體性的行動，扭轉西門町衰敗形象的效果。舞台化也是公共工程投資，吸引後續房地產跟進的經濟因素。2000 年商圈計畫，原本社區營造的公共空間交給地方組織認養、管理的概念，成為地方商圈組織，相對於青少年組織在這階段的失能 (de-power)，沒有強力的組織繼續賦權，西門町 1995 至 1999 年的公共空間重塑，結果是轉化為一個新的青少年消費基礎的商圈。原本提供給青少年聚集、互動、跳舞的徒步區中心廣場，也因為阻礙商業活動遭到座椅拆除，以及活動的禁止，成為反公共的空間管理。

三、另一條打造公共空間的路徑

在青少年徒步區的例子，本文指出歷史上逐步發生的將西門町「公共空間化」的後果，卻是造成由商業資本接收維持一個可消費、受控制的多樣性的消費空間，也就是公共空間迪士尼化的展現。本文第四章用男同志在紅樓的例子，討論另一條邊緣群體爭取空間使用跟自我再現的路線，是否比較有可能打造一個政治性的公共空間。

本文指出 1990 年代臺灣的同志運動擴大集結，並且在 1996 年台北市政府新公園規劃案的爭議中，形成串連並且現身的同志空間運動。與台北市政府以空間解嚴的政策進行公共空間改造，同志群體也在空間的場域上，爭取平等的公民權。公共空間成為重要的戰場。本文指出同志組織在新公園運動上發展公共空間近用權利的論述以外，同時也由彩虹社區發展社區的路線，提供以公共空間的消費空間策略爭取同志與主流社會的對話。同時由同陣發展的同志公民陣線、以及後續同志大遊行，都是同志群體透過各種公共空間戰鬥，逐步自我再現。

同志群體跟青少年類似有同樣的政治機會，同志群體與陳水扁市府決裂後，在接任的馬英九市府受到支持，利用馬英九與陳水扁的競爭，得到同志新故鄉的政治承諾。同志組織也具體介入台北市政府的預算，促成官辦同玩節跟大遊行。在 1990 年代晚期紅樓戲院規劃被忽視的同志歷史，也在同志運動的累積下逐步逼近。不同於青少年的組織，同志運動的組織，並且結合公民運動，在公共空間中的現身以及歷史被承認。

此外，同志運動跟台北市經濟結構的變遷，西門市場在全球化過程失落，同志大遊行在 2007 年以後的經濟效應，也因為紅樓以文化經濟的政策，因此在經濟縫隙中與攤商合作進駐的同志商家，不但因為社群連結跟同志社交需求得以在南廣場存活，更成為紅樓文化經濟政策率先成功的例子。經濟結構的機會，西門市場的地權結構，攤商跟同志得以結盟。不同與上一章西門町徒步區由大型財團加入，目前紅樓在空間管理上私人力量由三百多攤減為五十六攤的小承租戶所構成，這些承租戶在抵抗文化局對西門市場的計畫，必須透過男同志對空間的再現與之抗衡，男同志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中扮演關鍵行動者的角色。

從這兩個例子，台北市西門町在政治變遷跟缺少大型房地產投資的情況下，「文化」突出成為公共空間改造的重要力量。在青少年跟男同志兩個例子，可以看到空間解嚴，邊緣主體爭取在公共空間被納入或承認的過程。然而從本文的研究，邊緣主體鬥爭的後果，可能被商業資本或房地產資本收編為符號，也有可能維持住政治動員性。一方面土地產權的經濟結構是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在徒步區跟西門市場兩者就看到明顯的比較，經濟的結構導致不同行動者的權力程度的差異。相對於青少年，男同志比較不受到大型財團接收地景生產的威脅。組織動員是另一項重要的因素，在第三章我們看到國家組織動員了 1970、1980 年代便在西門町活動的青少年，支持為西門町街道的主角，但是青少年團體並未形成持續的組織，一旦政策方向改變，或是地方利益組織興起，青少年在公共空間的近用權就受到損傷。男同志則是有持續的組織間的連結以及同志空間運動的傳統，雖然是以高度消費形式在紅樓南廣場形成社區，但也受到同志組織的牽制與支持，同時男同志在南廣場的經濟成就，也得到攤商組織支持，而有越來越強的發言權。

第二節 對公共空間理論的一些思考

Mitchell (1995) 從舊金山人民公園的抗爭過程，指出公共空間事實上是兩種對於公共空間的想像相互辯證地生產出來的。一個是認為公共空間是自由互動、免於壓迫的政治性場所；另一種公共空間的想像，是來自於提供景觀、娛樂跟安全的開放空間 (115)。從對公共空間理論的回顧，Mitchell 指出從希臘到當代美國

的土地公/私地權的區別，公共領域一直都是建立在排除之上。因此，對被吸納的奮鬥，一直都是公民運動的主要核心（117）。

當代公共空間的政治性弱化，而以消費娛樂性取代，同時差異被轉化為受到控制的多樣性（119-20）。在這樣的情況下，公共空間是否能夠被邊緣群體所接收去宣稱他們的權利（117），也就是在這個空間裡，公眾的概念是否擴及到最弱勢者——也就是沒有私人財產、被排除在公共政治視野之外的遊民——就成為當代公共空間重要的意含。也因此 Mitchell 才會認為，在當代情境裡，公共空間是否具有被排除群體的政治可能性，是最重要的判準。

在本文研究的時空範圍（起點）內，台北市是座落在公共空間的整頓以及從「偽公共空間」恢復平反兩項主要的動力中。空間解嚴後，要賦予什麼符號？要賦予什麼樣的主體？是 1990 年代晚期以後的重要空間政治議題。然而解除威權的偽公共空間，並不必然指向一條人人皆可使用的公共空間。塑造公共空間的過程，不但同樣經歷排除吸納過程，企業資本介入的公共空間迪士尼化現象也同樣在發生。

然而在 1990 年代晚期，如本文的研究發現所述，在西門町的情境裡，經濟力量並非壟斷性的力量。這個經濟縫隙，給了邊緣群體爭取主體性的機會。這個特殊的條件，也正是如此，在西門町的例子，對於公共空間的議題，有更豐富、複雜的力量在參與。因此，本文採取了 Mitchell 提出的檢視角度，既然公共空間是國家、資本與不同群體之間對於吸納／排除的政治經濟社會過程不斷的在變化著，本文由特定群體對於公共空間近用爭取的行動策略跟歷史軌跡，從青少年與男同志在西門町公共空間歷史過程的分析，提供兩種不同走向的例子。本文的研究結果指出邊緣群體近用公共空間的過程，可能被商業資本或房地產資本整編為經濟發展的符號而受到控制，並無法有高度的自我再現機會或是基進的政治行動發生的機會；但是如果有適當的政治機會、經濟機會，邊緣群體的自我組織的支援下，是有機會在生產出一個具有差異之間可以對話、互動意含下的公共空間的。

要檢視一個公共空間的非公共性可以從事件來檢驗，但是抗爭事件的成敗也無法用來檢視一個公共空間是不是就是具有高度的公共性。本文在一個國家重塑公共空間、經濟資本力量也開始介入的過程、社會力量迸發三種力量相抗衡的特殊條件下，從兩個例子去分析公共空間塑造的過程，其中不同行動者的結盟或衝突、合作，造成相異的後果。也正說明 Mitchell 所言，公共空間的生產其實就是兩種公共空間概念不斷辯證地生產出來的。關於吸納／排除的鬥爭也不會止息。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文選定了兩個特定的邊緣群體—青少年與男同志，從他們如何宣稱、使用西門町公共空間的歷史過程，分析邊緣群體在政治經濟機會下，維持再現空間的可能性。這樣的研究方式用來回答公共空間的概念，上面已經有所解釋。但是光以本文的資料，並不足夠檢視公共空間的品質。也就是說，本文只能夠從特定群體為主體的角度，指出邊緣群體近用都市公共空間的實例，但是這些群體近用的過程，改變什麼新的吸納/排除作用？是否對其他更弱勢、更邊緣的群體進行排除？或是造成新的階層化？

在青少年徒步區研究的時空範圍（1994-2010）年，從歷史過程的變化，可以看到不同行動者在不同歷史階段上場，可以看到一個政治空間工程，變成國家帶領資本進行縉紳化的轉變。在男同志重返紅樓的例子，到研究停止的時間點，看到的是原本被排除的男同志，夾帶著攤商需要的文化資本，在經濟機會下互相合作，而在文化局的西門紅樓計畫之外開創另類的男同志可以自我再現的紅樓。時間停在這裡，本文只能夠提供紅樓這個公共空間不斷變動的生產過程一個初步的階段性評價。相對於本來被市政府拆除、沒有人用，到目前為止攤商與同志店家的合作，不能說是同志排除了其他群體，應該說是公共化的第一步。同志空間對整個紅樓對於台北市政府的西門紅樓計畫，的確是增加空間的差異性，將此視為公共空間一個階段性的成果是合理的。

但是例如 Binnie（2004）、Knopp（1995）對同志空間提出批判性的分析架構，指出晚近全球同志空間在都市觀光、都市再發展政策上被地方政府所重視，可能帶來的是對異質情慾正常化的保守作用。在紅樓南廣場會不會有進一步縉紳化的現象出現？會不會排除同志內部異質性再現的政治機會？或是壓制其他邊緣群體的機會？由於本文側重同志店家與西門市場攤商之間合作的過程，在資料上並未深入到南廣場的男同志使用群體進行南廣場形成以後，生產的認同與同志文化，希望本文在同志重返紅樓過程的各種結構條件與歷史路徑依賴的分析，可以提供將來進一步深入研究紅樓男同志空間的階段性理解。

參考文獻

- Bell, David and Binnie, Jon (2004) "Authenticating Queer Space: Citizenship, Urbanism and Governance." *Urban Studies*, Vol. 41, No. 9.
- Bell, David and Gill Valentine, eds. *Mapping Desire: Geographies of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Binnie, Jon (1995) "Trading places: consumption, sexual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queer space." Bell, David and Gill Valentine, eds. *Mapping Desire: Geographies of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Breitbart, Myrna Margulies. (1998). "'Dana's Mystical Tunnel': Young Peoples Designs for Survival and Change in the City". Skelton and Valentine(eds.) *Cool Spaces: Geographies of Youth Cultures*. Routledge, New York.
- Dick Hebdige 著，蔡宜剛譯；國立編譯館主譯（2005）《次文化：風格的意義》，台北市：巨流。
- Fischer, Claud (1984) *The Urban Experience*. San Diego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Hannigan, John (1998) *Fantasy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 hm , 2002 , 〈又到紅樓〉, 刊載於《同位素電子報》, 2002/9/14 。
- Huang, Li-Ling(2005) "Urban Politics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Kwok, Yin Wang. 2005,ed. *Globalizing Taipe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atial Development*. Pp.78-98. Routledge.
- Knopp, Larry (1992) "Sexuality and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capital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6) 651 – 669
- Knopp, Larry (1995) "Sexuality and Urban Space: A Frame Work for Analysis." In
- Knopp, Larry (1997) "Gentrification and gay neighborhood formation in New Orleans: a case study." In A Gluckman, B Reed eds. *Homo Economics: Capitalism, Community and Lesbian and G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rasil Blackwell.
- Martin, Fran(2000) "From Citizenship to Queer Counterpublic: Reading Taipei's New

Park," *Communal/ Plural* 8:1 (April 2000): 81 - 94.

Massey, Doreen (1998)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youth cultures," in Tracey Skelton and Gill Valentine (eds), *Cool Places: Geographies of Youth Cultures*. (pp. 121-129). London: Routledge.

Mele, Christopher (2000) *Selling the Lower East Side. Culture, Real Estate, and Resistance in New York, 1880-2000*.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tchell, Don (1995)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People's Park, Definitions of the Public, and Democra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ers*, 85(1).

Nylund, Katarina (2001) "Cultural Analyses in Urban Theory of the 1990s." In *Acta Sociologica*, Vol. 44, No. 3.

Smith, Neil(1996)"Is Gentrification a Dirty Word?" in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T. C. Chang (2000) "Theming Cities, Taming Places: Insights from Singapore." In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Vol. 82, No. 1.

Valentine, Skelton and Chambers(1998)"Introduction." Skelton and Valentine(eds.) *Cool Spaces: Geographies of Youth Cultures*. Routledge, New York.

Wilson, Elizabeth (1991) *The sphinx in the city: urban life, the control of disorder, and women*. London, Eng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Yoshimi, Shunya(吉見俊哉)(2000) 'Consuming "America" : from Symbol to System', in Chua Beng-Huat ed. *Consumption in Asia*. Routledge. Pp. 202-224.

Zukin, Sharon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Cambridge, MA : Blackwell.

Zukin, Sharon (1998) "Urban Lifestyles: Diversity and Standardisation in Spaces of Consumption." *Urban Studies*. Vol. 35.

Zukin, Sharon (2010)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王志弘，1996，〈台北新公園的情慾地理學：空間再現與男同性戀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95-218。

王志弘，2003，〈台北市文化治理的性質與轉變，1967-2002〉，《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2期。

台北市西門商業中心更新促進會，1990，《台北市西門商業中心更新促進會會務報導》。

-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1986)《台北市西門商業區(中華路一段)再發展構想》，台北：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處委託。
- 朱偉誠，2003，〈同志·台灣：性公民、國族建構或公民社會〉，《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115-151。
- 江宗霖，2005，《歷史性場所的地景變遷與空間再結構過程- 台北市西門市場更新再利用案》，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文煜，2003，《河邊春夢：台灣高雄愛河畔男性間性慾地景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台灣大學城鄉所碩士論文。
- 吳佳原，1998，《城市荒漠中的綠洲：台北市男同志酒吧經驗分析》，台大城鄉所碩士論文。
- 吳芳瑜，2009，《臺北市西門紅樓特區行銷策略之研究》，台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 吳芳瑜，2009，《臺北市西門紅樓特區行銷策略之研究》，台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 吳瑞元，1998，《孽子的印記—臺灣近代男性「同性戀」的浮現》，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呂錦媛，2003，《金錢與探戈：台灣女同志酒吧之研究》，臺灣大學社會系碩士論文。
- 李尚仁，1986，〈要不要調整航向？我看目前的青少年次文化〉，刊載於聯合報，1986/3/29。
- 李明璁，2010，〈去／再領域化的西門町：「擬東京」消費地景的想像與建構〉，《文化研究》期刊，No.9。
- 汪季參，2005〈發展社區居民參與少年犯罪預防之歷程與成效研究—以台北市西門町區域防治工作為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秀姿，2002，〈重讀 1970 以後的台北：文學再現與台北東區〉，台大城鄉所博士論文。
- 林懷民，1978，《蟬》，台北：大地。
- 邱珍瑤，2004，《消費空間與同志身份之研究—以彩虹社區活動為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柯瑞明，1991，《臺灣風月》，台北市：自立晚報。

- 夏鑄九，1987，〈一個都市中心的興起—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的個案研究〉，《當代》第 15 期。
- 夏鑄九，1994，〈(重)建構公共空間—理論的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6 期。
- 夏鑄九，2000，〈殖民的現代性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的歷史〉，《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0 期，頁 47-82。
- 徐裕健，1993，《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台北為個案》，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翁臺生，1976，《西門町的故事》，台北：龍年出版社。
- 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1996，《台北市地區環境改造計畫—西門町青少年文化創造集表達活動之推動》，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編，2003，《青少年文化素描：街舞與同人誌》，台北：巨流。
- 高文峰，訪談稿 2009/12/16
- 張大春，1992，〈囚城交通黑暗期—「青少年哪吒」裡的西門町〉。刊載於 1992/11/11 《聯合報》副刊。
- 張曉婷，2004，《西門町的年齡政治》，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符耀湘，2003，〈城市、文化、青少年—1995 年青少年街舞文化工作的省思〉研討會發言紀錄，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編，《青少年文化素描：街舞與同人誌》，台北：巨流。
- 莊雅涵、吳偉立、王奕婷，2004，〈我們活在不同的台北？—台北政治暨文化性格：1994-2002〉，《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一期。
- 許雯娟，2007，《台北非常同志：台北同玩節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台灣大學城鄉所碩士論文。
- 陳宏銘，2003，《一種另類運動的文化地景-以都市滑板族的運動空間為例》，台灣大學園藝系碩士論文。
- 陳坤宏、王鴻楷，1996，〈都市消費空間結構之形成及其意義：台北市六個商業區的經驗研究〉，《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8：1-34。
- 陳明竺，1992，《台北市西門市中心區暨萬華車站地區再發展規劃》，台北：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
- 陳倩菱，2004，《青少年娛樂次文化與公共空間之對話—以西門町為例》，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懿欣，2000，《不可見的城市--探尋西門町的精神性》，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 章英華，1995，《臺灣都市的內部結構：社會生態的與歷史的探討》，台北市：巨流。
- 章英華，1995，《臺灣都市的內部結構：社會生態的與歷史的探討》，台北市：巨流。
- 彭揚凱，1998，《綠色之城：台北市都市政權之統治分析 1994-1998》，台大城鄉所碩士論文。
- 曾旭正，1994，《戰後台北的都市過程與意識形構之研究》，台灣大學城鄉所博士論文。
- 森正人，2006，〈消費と都市空間—都市再開発と排除、監視の景観〉，加藤政洋、大城直樹編，《都市空間の地理学》，133-149，京都市：ミネルヴァ書房。
- 黃仁志，2005，消費社會中的古蹟再利用—台北市的案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柏堯，2006，《街頭塗鴉的日常生活研究：以台北市西門町為例》，政治大學新聞系碩士論文。
- 黃孫權，1997，《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台大城鄉所碩士論文。
- 楊文全，1999，《都市政策即選舉文宣/選舉文宣即都市政策：民主政治在媒體政治中之異化過程-1994年市長選戰中陳水扁"台北市政白皮書"建構之政治過程》，台大城鄉所碩士論文。
- 葉龍彥，1997，《臺北西門町電影史 1896-1997》。台北：文建會電影資料館發行。
- 葉龍彥，1999，《紅樓尋星夢：西門町的故事》，台北縣：博揚文化。
- 詹宏志，1989，〈西門町的死與生〉，收於詹宏志，1989，《城市人》。台北市：遠流出版社。
- 詹宏志，1989a，〈新商品與新特質〉。收於《城市人》，台北市：遠流出版社。
- 雷柏爾（1954），全漢昇，陳紹馨同編，《臺灣之城市與工業》，臺北：美國國外業務總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國立臺灣大學。
- 漢寶德，〈劃給青少年一個文化圈〉，刊載於聯合報，1986/4/7。
- 趙彥寧，2000，〈台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臺灣

社會研究季刊》，38：207-244。

劉偉彥，1988，《台北東區之空間文化形成：一個初步的社會分析》，台大土木所碩士論文。

潘瑾怡，2001，《西門文化空間轉化、國家與社會》，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

蔣文德，2000，《閱讀誠品：全球化中的誠品書店之空間文化形式》，台大城鄉所碩士論文。

鄭建科，2003，《都市公共開放空間之環境品質與社會生產——台北西門町地區之個案》，臺灣大學城鄉所碩士論文。

鄧宗德，1991，《八十年代台北市支配性都市地景形成之研究》，台大建城所碩士論文。

蕭民岳，2008，《跳出「中」心，吃進中「華」：北市官辦大眾節慶的文化政治（1994-2006）》，台灣大學社會系碩士論文。

賴正哲，1998，《在公司上班：新公園作為男同志演出地景之研究》，淡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

遲恆昌，2001，《從殖民城市到「哈日之城」：台北西門町的消費地景》，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遲恆昌，2004，〈「哈日」與都市空間的文化研究——「哈日之城」西門町〉，文化研究月報，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14/journal_park92.htm。

謝佩娟，1998，《台北新公園同志運動--情慾主體的社會實踐》，台灣大學城鄉所碩士論文。

懷寧傳播公司製作，公共電視台監製，2008，《西門市場百年滄桑》。台北市：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蘇淑冠，2005，《愉悅/逾越的身體：從社會階級觀點來看西門 T、婆的情慾實踐》，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報紙報導

聯合報，1969/9/22，〈警方執法森嚴 奇裝異服斂跡〉。

聯合報，1970/7/2，〈警伯伏妖·鎮懾惡少 墮落邊緣·拯救青年〉。

聯合報，1974/6/9，〈電動玩具場兼營賭博 問題青少年流連忘返〉。

聯合報，1980/4/23，〈警方掃蕩斷袖癖 月來查獲六十幾 調查同性戀者生理心理變態 沉淪外道邪門罹染惡疾拉客〉。

聯合報，1981/4/13，〈髮姐命案再度暴露髮廳藏污納垢 色情黃牛騷擾路人〉。

經濟日報，1985/9/29，〈商業園地 以消費者心理需求為經營方針 現代商店應迎合市場變化〉。

經濟日報，1985/9/29，〈以消費者心理需求為經營方針 現代商店應迎合市場變化〉。

民生報，1987/1/10，〈讓青春飛躍西門町! 塑造新形象.引導正確觀念 青少年活動策劃應更落實〉。

聯合報，1987/1/16，〈莫讓西門町·淪為風化區 色情黃牛拉客·民眾視為畏途〉

聯合報，1987/4/6，〈西門鬧區·漸成都市黑街 色情充斥·亮起治安紅燈〉。

經濟日報，1988/2/14，〈為北市西門鬧區創造「第二春」商店與住戶成立「更新促進會」〉。

經濟日報，1988/3/10，〈拯救西門町!西門町推陳出新 將再與東區爭霸〉。

民生報，1988/6/26，〈走過龐克系列(三) 龐克打扮 自成一格 衣著有派頭 髮式如招牌〉。

聯合晚報，1991/5/1，〈當代省思筆記 斷袖之痛〉。

聯合報，1993/7/26，〈八十五載榮枯互見 紅樓看盡夢人生〉。

聯合報，1994/12/25，〈市府昨夜沸騰 萬人與阿扁共舞〉。

聯合報，1995/1/16，〈台北新象 告別冷衙門 迎接新市府〉。

聯合報，1995/4/22，〈挽救偏差青少年 需要更多關懷〉。

聯合報，1995/4/26，〈校方增設輔導老師 警方取締涉足不良場所 加強輔導青少年 雙管齊下〉。

聯合晚報，1995/7/6，〈西門町名產：老色狼！他們 平均 60~80 歲 獵物 躑家女和少年郎 群聚 嚴重影響治安〉。

聯合報，1996/2/6，〈更新西門徒步區 看法分歧〉。

中國時報，1997/02/24，〈同志們大串聯希望被認同 廿一個同性戀團體昨晚成立「同志公民行動陣線」表達心聲〉。

中國時報，1998/1/7，〈西門町大反撲 大型服飾店進駐吸引人潮 誠品開幕 添人文氣息〉。

聯合晚報，1998/8/30，〈西門町的秘密武器 '第三代百貨公司'明年見〉。

中國時報，1998/9/8，〈打造青春國 西門徒步區換妝〉

中國時報，1998/09/26，〈台北電影節熱鬧開幕〉。

中國時報，1998/09/26，〈西門町吃喝玩樂好去處〉。

中國時報，1999/05/23，〈「復活西門町 台北·西門·慶」系列報導—實踐大學創意王 頒獎晚會歌舞揚〉

中國時報，2000/9/4，〈馬英九承諾明年續辦台北同玩節 表示多元社會應相互尊重、包容要讓台北成為同志的新故鄉〉。

聯合報，2008/1/1，〈紅樓夜未眠 同志迎新年〉。

訪談稿

W，訪談稿 2009/6/8

Li，訪談稿 2009/5/16

Ts，訪談稿 2009/5/21

Ls，訪談稿 2009/12/29

L，訪談稿 2009/6/4

G，訪談稿 2009/12/16

H，訪談稿 2009/06/11

H，訪談稿 2009/5/18

H，訪談稿 2009/6/19

S，訪談稿 2009/11/16

